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民 國 野 史

許金城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朝野秘辛
歷史掌故
許金城輯

民國野史

卷首三言兩語

野史也者；爲正史所不記的，拉拉雜雜，花花飄飄。好比一盤葷素炒什錦，一碟豬肝、牛舌、皮蛋、海蜆……十七八樣冷拼盆，實惠抵食有味也。

本冊搜集資料和文字——

有四要：（一）要有趣味的，要讀者仰天哈哈大笑；捧腹呵呵笑；甚至噁的一笑，皮笑肉不笑，作會心的微笑。（二）要有刺激的，要讀者洞悉其奸，拍桌瞪腳，「腦海起火」，有所猛醒，國亂民困，或有補救乎？（三）要政壇趣事，民間怪事；例如張勳復辟趣劇，以及民國一隻奇異毒虫，均特別記述。（四）要民國人海中可歌可泣有生動事蹟，記之；有三分鹹濕妙味，好比我們挖臭腳趾，另有一種味道，非一嗅不可的，記之。平平淡淡，均非本冊着眼點也。

有三不錄：（一）「爲國爲民」「自由」「解放」等魔術作用的不錄。（二）歌功頌德，「我們的領袖」，「英雄」「偉大」，肉麻當有趣的不錄。（三）官冕堂皇的，假仁假義的屁話，不錄。

文以達意爲主，文言白話不論，文筆優拙不計。切忌咬文嚼字，嚕哩嚕噠，廢話連篇。

茶餘酒後，寬衣解帶，一榻橫陳，讀本冊最得！

許肇基、許金城於港。

目次

卷首三言兩語·····	一
興中會秘辛·····	一
吳繼爲革命犧牲·····	二
紅花崗上忠魂碑·····	四
記女鬥士徐宗漢·····	六
民呼日報與民吁日報·····	七
民立日報人升官·····	九
黃興在革命中戀愛·····	〇
絳衣將軍愚忠·····	三
辛亥預言與辦子革命·····	五
雲南起義蘇松坡唐繼堯·····	七
唐繼堯逃雲南起義·····	〇
辛亥杭州起義火車頭撞城門·····	一
蔡元培製造炸彈·····	四
民國製痕憶六月·····	六

小站練兵與北洋軍閥·····	二八
袁世凱智獲國人物·····	二九
袁世凱買弄部下手法·····	三一
筆桿勝鎗桿的一例·····	三五
洪憲機史秘聞·····	三七
袁世凱求醫·····	三九
籌安六君子·····	三九
八三繁華一夢消·····	四四
保國會變了保皇黨·····	四五
馮國璋——烏龍王·····	四七
趙爾巽與東三省新軍·····	四八
徐世昌被嚇辭總統·····	四八
張勳復辟趣劇·····	五一
棺材店出售新貴衣冠·····	五七
張勳又完蛋了·····	五八
民初都督羣象·····	六一
民初北洋軍閥笑話·····	六二

上海兵工廠之沿革·····	六四
汽車物語·····	六七
上海郵話·····	六九
民初改革幣制史·····	七三
五四以前一頁內閣變遷錄·····	八二
日本廿一條痛史·····	八五
五四與巴黎和會·····	八九
軍閥時代的嫖賭·····	九二
張宗昌求雨法·····	九四
徐樹錚之大胆·····	九五
黎元洪和總統印·····	九六
漢口蔣景翼慘案·····	九八
民國內戰的一頁·····	九九
馮玉祥趙宣統出官記·····	一一一
革命軍德安戰役定大局·····	一一四
記褚民誼陳公博之死·····	一二六
劉鎮華妾死案·····	一二〇

孟恩遠轍囊……	一二一
宋哲元點名笑話……	一二二
一盒雪茄烟故事……	一二三
民國第一個飛機製造人朱家仁……	一二四
初次飛機失事案在廣州……	一二八
第一次飛機作戰笑話……	一二九
申報與粵乃武王韜……	一三〇
中華一屆內閣僅存王寵惠……	一三四
梁士詒以牛自比……	一三五
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	一三七
大世界野鷗委員……	一三八
陳濟棠盛氣倡讀經……	一四〇
朱五小姐之父朱啓鈴……	一四一
談陳樹人元旦詩……	一四三
怪儒畢鴻銘……	一四四
大漢閣主章太炎……	一四六
章太炎「在萬錄」……	一四九

章太炎龍泉寺縱酒罵袁	一五二
章太炎二三軼事	一五三
郁建夫的「快短命」	一五五
蔣元培的婚姻	一五六
林森典守印信	一五七
江東才子楊雲史賣花瓶	一五九
戴季陶信佛	一六一
王湘綺的周媽	一六三
畢倚虹生財大道	一六四
蘇曼殊非日本種	一六四
蘇曼殊醉臥道中	一六五
國人在公教最高地位的趨微祥	一六八
潘光旦與葉德輝	一六九
張國淦棄官	一七〇
近代怪傑黃侃	一七一
吳稚暉「偷來人身」	一七四
吳稚暉爲友報喪笑話	一七七

吳稚暉掃「落葉」	一七九
徐志摩與林長民	一八一
徐志摩陸小曼戀愛軼聞	一八二
梁啟超證婚掃興辭	一八四
羅文幹二三事	一八五
羅文幹之風骨	一八八
羅文幹嗜啤酒	一八九
羅文幹幽靈顯現	一九〇
吳趼人專寫黑幕小說	一九二
叔本華「暗殺」王國維	一九三
平江不肖生趣事	一九四
王一亭	一九五
汪兆銘窮汪兆銘	一九六
刺死孫傳芳的施劍翹女士	一九七
韓復榘之死	一九九
李宗吾之「厚黑學」	二〇二
李宗吾「怕老婆哲學」	二〇四

李宗吾之懸勳	一二〇六
張丹斧滿身古玉	一二〇七
王同愈不收壽禮	一二〇八
「馬騮」胡懷琛	一二〇九
崔百越做獨孫王	一二一〇
李汝謙招搖	一二一一
曾紀芬愛勞動	一二一二
齊白石的三知己	一二一三
「哲人其萎」爲女人李石岑重曼恬之戀	一二一四
胡適趣事	一二一八
蔣夢麟閒話「教育出產品」	一二二一
徐柏園「笑煞日本小學生」	一二二三
張自忠僞裝孝子脫險	一二二五
鄒容死後嚇到徐世昌	一二二六
陳雷以糞治流氓	一二二六
軍長放屁失妻	一二二七
熊希齡與張敬堯算賬	一二二八

熊希齡在此「一舉」	一二九
樊樊山撞板	一三〇
鹿鍾麟驅逐溥儀	一三一
譚延闓發還余誠格財物	一三一
將百里廁所逃生	一三二
康同壁印度尋父	一三三
模型李泥人張倒鈎廢	一三四
黑景寫「爾化記」	一三七
天台山農賣蜜橘	一三八
洋博士柯鳳蓀	一三九
楊增華精內功	一四〇
喬大壯刻印葬妻	一四一

興中會秘辛

興中會是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最初組織之革命團體，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即清光緒二十年）孫先生北遊京津，窺清廷虛實，深知清政腐敗，已到無可救藥之田地，非徹底改革，不足挽中國危亡，因即赴檀香山，與友人會商，實行革命，復得其兄之助，開第一次會議于當地卑涉銀行之經理何寬家，此一會議中，決定設立革命團體，并定名為興中會，舉孫先生為會長，是為興中會誕生之始。

計當日誕生興中會之會議出席人為孫先生，何寬，李昌，李祿，劉祥，劉壽，劉卓，曹彩，黃亮，鄧金，程蔚南，鄧蔭南，鍾木賢，黃恢華，宋居仁等十五人。翌年春二月，于香港之士丹頓街設立幹部，新加盟者有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等。

加入興中會者，須要宣誓，其誓詞曰：

「驅除韃虜，恢復中原，創立合衆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

其後同盟會之入會者，亦要宣誓，但其誓詞，已不同興中會時代，已修正為：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大抵興中會時代所標者僅為民族主義，到了同盟會時代，已兼及民權民生，所以其入會誓詞，亦一併加之修改也。

興中會於檀香山組織成立，并推孫先生爲會長後，即發表宣言，此一宣言，孫先生自己執筆起草，宣言之首段有句曰：「堂堂華國，不齒于外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宣言中釐定章程十項，臚列爲：

一，會名宜正也。二，宗旨宜明也。三，志向宜定也。四，人員宜得也。五，交友宜擇也。六，在會宜堅也。七，人才宜集也。八，款項宜籌也。九，公所宜設也。十，變通宜善也。

光緒二十六年北京拳亂之際，孫先生及一羣興中會同志，談廣東獨立，并托第三者勸李鴻章參與及玉成此事，李鴻章亦意動，派劉學詢與孫先生會晤，惟李終未有決心，只以滑頭之手段及口吻週旋，答覆謂北京未陷前，未可遽言獨立，請稍候云云。此事乃中變，孫先生因此囑告興中會同志，準備宣言行動，蓋已有悟于革命之成果，須于火花與血中培養出來，不能希冀清廷大臣如李鴻章等協助，坐享其成也。

吳樾爲革命犧牲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六月，清廷爲想消弭革命與收攬人心起見，下詔命令載澤，載瀅，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人，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作爲準備立憲的表示。吳樾當時深恐清廷真的立憲，影響了革命，於是決計暗殺上述五人。當他們自北京乘火車赴天津，取道放羊時，吳樾携

炸彈登火車，企圖把他們炸斃，不料炸彈因車廂碰撞而爆發，吳氏本人遭受重傷而殉難。這是光緒乙巳八月間的事。

吳樾號孟俠，安徽人，爲銅城名家子。少年時曾習舉業，後入京師大學肄業，大概就在這個時期，讀了不少革命排滿的書籍，遂醉心民族主義，很羨慕孫中山和章太炎，頗想結交他們，但沒法得其門徑。癸卯（光緒廿九年）這年，萬國華在上海狙擊王之春，（當時人們指王之春親俄）事雖不成，但吳樾聽聞這事後，大爲興奮，認爲這是對付賣國賊的最好方法。從此之後，他就想藉用暗殺手段，來對待清廷要人。他曾著有一文長萬餘言，題爲「暗殺時代」，內裡縷述他初想暗殺慈禧，後來又以鐵良爲對象，（鐵良時任清廷戶部侍郎，奉命南下搜刮民財。）正在這時候，清廷忽又有派遣上述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於是又轉而計劃暗殺他們。他初時從日本購得短槍，後以短槍火力微弱，斷不能把載澤等五人一舉盡殲，於是改用炸彈，費了許多精神，學會製造炸彈和配置炸藥方法，他便寫下了遺書，把所抱志願，詳告他的未婚妻，然後才來實行他的計劃。

八月二十六這天，載澤等自北京赴天津放洋，當他們在車站登車時，京中王公大臣送行的極爲擁擠，吳樾和他的同學張榕（山東歷城人），同到車上來行事，由張氏僞飾僕人裝，吳氏則自懷炸彈登車。登車後，因人衆多，尙未能把炸彈拋擲，詎料機關車和列車相拍合時，全車突然倒退，車上人多爲之傾側身軀。吳樾的炸彈是撞針式的，這一來，撞針受了壓迫，未及拋擲，便告爆裂。轟然一聲，

吳樾下身被炸成肉醬，登時重傷身死，其旁三人傷斃。五大臣中，載澤、紹英皆受微傷。伍廷芳這時來送行，兩耳亦被震傷。張榕因為站立得很遠，未被波及，他逃歸寓所，把吳樾遺物盡毀，易姓名爲余本強，但後來卒被偵者探獲，置之於獄，一獄吏感其俠義，與之偕逃。當時事發之後，清廷大震，下令嚴爲查究，但無人知吳樾爲阿誰。據說，當時曾用藥水浸着吳樾屍體，放在玻璃匣裡，陳列車站內，招求認識他的人，可是始終無應者，沒奈何，只好把他埋葬了。直到後來同盟會把吳樾的遺書，在東京刊登出來，世人始知企圖暗殺五大臣的刺客是吳樾，他的名稱，才大顯於世，因首先起來反對清廷的僞立憲就是他。

吳樾在致未婚妻的遺書上，會說「願子（指其未婚妻）爲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等語。他的未婚妻是否成爲了「羅蘭夫人」？這可不論，他願望立銅像也是未有實現哩！我們真是太對不起吳樾了！然而，從來所謂「烈士」，他們所得到世人的報答，大多數恐怕都是如此。只有聰明的才會享受到革命的福，愚蠢的往往是要爲革命而犧牲的，而且是犧牲了而無報償的！

紅花崗上忠魂碑

廣州東郊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外，尚有紅花崗四烈士墓，其殉國的壯烈事蹟，可謂先後輝映。四烈士爲溫生才，鍾明光，林冠慈，陳敬岳。溫生才炸滿清官吏李琦將軍，被執遇害；鍾明光炸粵督

龍濟光，被執以火油焚體，及剖腹裂屍。他們行徑的英勇，國人皆知，史冊詳載。

鍾明光字遠標，廣東興寧人，經商南洋，清末投身革命，炸龍濟光被執殉難前，獄中有遺詩云：「一念酬恩願尙遠，卅年心事總堪悲。不才敢擬擎天柱，無處能容立地錐；破國亡家徒有恨，赴湯蹈火義難辭。料應化作啼鵲去，欲報慈烏再世期。」

溫生才烈士的平生，可由矗立在紅花崗上的忠魂碑得知其詳。該碑係民國二十二年，廣東當局爲溫烈士撰事畧，勒石以垂永久，碑文由林直勉所撰。遊紅花崗的人士，以此碑文有革命文獻的價值，多拓取之。茲錄該碑原文如下，以供關心革命歷史者的參考。

「古所謂游俠者，其志行固堪欽重，然只慷慨急人之難，夫奚與于國運，若夫舍生命，除國賊，以促成革命大業，方諸俠者之所爲，個乎遠矣。溫烈士生才，籍粵梅縣之丙村，少年降身儕謀役，尋習藝於南洋怡保，勞瘁不辭，惟深恨清廷無道，疊召帝國主義之壓迫，冀者總理籌倡革命，宜揚主義，有志之士，心焉嚮往，烈士亦其儔也。民國紀元前一年，吾黨再將大舉，惟梗於清吏，而粵水師提督李準，尤其著焉者，吾黨人屢圖殲之，彼輒倖免，烈士憾焉。是歲三月十日，飛機演於燕塘，清吏羣焉往觀，烈士乃懷手槍，俟於東門外茶肆，蓋是地清吏進城所必由也。薄暮騶從至，烈士拔槍前撲，衛卒辟易，即向與中連擊三槍，詎斃者非李準，而爲清將軍孚琦，烈士乃向積厚坊從容去，巡警呼侶跡之，遂就擒。浙督張鳴岐鞠之，輒侃侃陳革命大義，初非與讎虜有私仇，抑非爲人所役使，信乎！

斯所以異於嘖嘖流俗之游俠歟？烈士繫獄七日，就義於手戮乎瑯處，越二旬，而七十二烈士隨之喋血殉國，又五閱月，而武昌首義，遐邇風從，民國於焉肇造。昔人于博浪一椎，深致惋歎，惟烈士一舉即成不世之功。嗚呼，可以瞑目矣，後死者追維前烈，低徊無已，直勉撰文勒石，以詔來茲！」

四烈士殉難之時日不同，黨人爲彰先烈功勳，使後人有所敬仰紀念，乃合葬於紅花崗。又四烈士的遺像，當局以不可復得，乃搜集他們當日在獄中的照片，放而大之，懸掛於觀音山五層樓博物館中，凡遊斯館者，均獲瞻仰四烈士的遺容，雖鐵索鐐鑕，而其忠貞爲國之精神，令人追懷而致崇高的景仰！

記女烈士徐宗漢

青年節，即四十五年前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黨人謀攻督署事敗，七十二烈士殉難黃花崗之日也。關於是役史實，記載極多，人皆知之，予今所記，則爲躬與是役之徐宗漢女鬥士也。

宗漢，廣東香山縣人，幼隨父在滬讀書，年十八，適海豐李晉一，生子女各一，結婚數年，李以病去世，宗漢教養遺孤，辛勤備至。民前四五年間，宗漢次姊佩瑤，執教於南洋檳榔嶼華僑學校，約宗漢往助，宗漢因是有南洋之遊。時檳榔嶼初設同盟分會，日宣揚革命主義，宗漢聞而善之，因加入爲會員，助黨人擴張黨務，深資得力。清光緒三十四年回粵，即與港穗同志設機關，運軍械，往來香港

廣州之間，清吏以其女子也，故不之疑。辛亥三月，廣州黨人將舉事，宗漢於河南溪峽，設一機關，頻頻由香港密運槍械炸彈至是處，分發各同志，並於門外張貼大紅對聯，偽飾喜事，故無疑之者。及二十九日晚，攻督署事敗，黃克強指受槍傷，尋至溪峽機關，宗漢爲之裹傷。至四月一日，乃爲克強改裝，親送至哈德安夜輪，相偕赴港。抵港後，克強以指傷過劇，入雅麗氏醫院割治，照例割症，須有親族簽名，宗漢遂從權以妻室名義行之。未幾傷癒出院，即正式與克強結婚，虛名夫婦，竟成事實矣。是後相隨克強革命，無役不從。先後得二子，民五克強逝世，宗漢撫養遺孤，至於成人。

抗戰後，移居重慶，於三十三年三月病逝，享年六十有八。

民呼日報與民吁日報

清末上海報紙，鋒芒最露，讀者最多，而出版時間最短者，爲民呼日報與民吁日報，此兩報皆爲于右任所創辦，今先言民呼日報。先是右任於光緒卅三年與楊篤生等創辦上海神州日報，刊行未及一載，因鄰居失火，全館付之一炬，遂於光緒三十四年秋間，籌辦民呼日報，助之者，有張人傑周柏年諸人。當時右任在上海各報登載啓事云：「鄙人去歲創辦神州報，因火後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發起此報，以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開淫邪而振民氣，亦初創神州之志也。股額定十萬，每股百元，現已招足六萬元。俟機器運到，即宣佈出版日期。」惟以籌措資金不易，至宣統元

年三月二十六日始宣告出版。除右任任社長外，執筆者有戴天仇、吳宗慈、王无生、范光啓、周錫三諸人，對於時政之得失，官僚之腐敗，皆有嚴格批評，名言諷諭，大受世人歡迎。一出版即日銷數萬份，以是招官廳嫉視、遭同業妬忌，日思有以挫折之。於是而有甘肅賑款案之發生，未幾又有安徽鐵路公司朱紫錦指控謾謗名譽，及已故上海道蔡鈞之子國楨指控毀壞其父生前名譽案，相繼而來。租界會審公廨循清吏之請，將右任羈押捕房月餘，至七月二十四日，遂胡亂判決將右任逐出租界。並取消民呼日報之發行權。計自出版至封閉，僅三個月而已。

民呼日報既被封閉，右任志不少懈。是年八月十六日上海各報又載有民呼日報出世廣告，畧謂「本社近將民呼日報機器生財等一律過盤，改名民呼日報。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請求實學爲宗旨。仍設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號內，即日出版。內容外觀，均擅海內獨一無二之聲價」云云。是報創辦人仍爲右任，助之者有范光啓、景耀月、朱葆康、王无生、周錫三諸人。惟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爲發行人，范光啓爲社長，且爲避免會審公廨蹂躪故，特在法國領事署註冊，以備不虞。出版後，崇論宏議，可與民呼日報相伯仲。時日人侵畧滿蒙，至爲急迫，舉國人士，靡不痛心疾首，海上各報以攝於威力，咸噤若寒蟬，獨民呼日報不畏強禦，日以危言警惕國人，早爲之備。詎因是爲日人所忌，於是年九月下旬，由駐滬日領事松岡照會蘇松太道蔡乃煌，謂民呼日報言論多臆測煽惑，有碍中日二國邦交，請將該報懲辦，以戒將來。蔡即札飭會審公廨將該報封

禁，並商請駐滬領事團承認。至十月初六日，捕房遂奉命派警將民吁日報封閉，並將主筆范光啓傳訊到案。計自出版至被封，爲時僅五十餘日而已。民吁民吁之被封，實爲蘇報以後清吏勾結租界當局摧殘輿論之另一頁痛史！

民立日報人升官

再談于右任創辦之民立日報。民立日報誕生於清宣統二年九月初九日，即民吁日報被封後一周年。內容以喚起國民責任心爲宗旨，編輯分論說、批評、紀事、雜錄、圖書五部。先後主筆政者，有景耀月、宋教仁、呂志伊、談善吾、范光啓、王无生、徐血兒等，人才濟濟，堪稱一時之盛。時清廷正倡言預備立憲，國內言論，較爲自由，革命黨人乘此時機，紛赴長江沿岸活動。辛亥黃花崗之役前後，譚人鳳、宋教仁、呂志伊、居正、陳其美、楊玉如等往來滬滬漢各地，均以民立日報爲東道主，是歲中部同盟會成立，參加者亦以民立日報關係人物爲特盛。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失敗後，民立日報藉此宣傳民族主義，鼓盪革命精神，迭載殉難烈士之嘉言軼事，以激勵國人，遂使全國革命思潮，如火如荼，不可遏止。

自武昌起義成功，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民立日報諸賢，多出任要職，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長，陳其美任滬軍都督，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長，呂志伊任司法部次長，宋教仁任法制局長，范光啓任安徽鎮壓軍

司令，龍育城、沈綬雲均任司長，社中樞要，爲之一空。迄民二討袁軍失敗，民黨勢力衰微，該報以不勝袁氏壓迫，遂自動停版。

黃興在革命中戀愛

辛亥革命後，黃興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聯云：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當日「三·二九」廣州起義，總指揮就是黃興。斯役，是他一生事業最可歌可泣之頁，也是最可喜之頁——他親率黨人，冒死舉事，竭力槍戰，斷了手指，却也因此戀愛，結婚。

昔年同盟會中，黃興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他的氣概和儀表相似，魁梧奇偉。從其壯年詠鷹之詩，可以窺見。詠鷹詩云：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鷹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空，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

黃氏原名軫，字蓮午。第一次長沙舉義失敗，滿清政府懸賞通緝甚緊，因是改名「興」，字克強。早年，他在兩湖書院讀書，後來，到日本東京，進弘文書院。同寓一位好朋友，便是後來擁戴袁

世凱稱帝「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楊字哲子，文墨口才，都很來得，中舉人，赴日留學，和梁啟超等，同爲「立憲派」台柱，與黃興、胡漢民等「革命派」常常筆戰。黃楊同寓，更朝夕舌戰。辯論國事，與激太好的時候，面紅耳赤，終夜不眠。可是，翌日還是好朋友，大家喝酒去也。

中山先生最初的革命團體是興中會，黃興則與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先有華興會的組織。後來兩者合流，成同盟會。

同盟會最動人的傑作，要推「三·二九」廣州之役了。是役策劃良久，統籌部設在香港跑馬地，部長黃興，胡漢民爲秘書課長。

黃興率同志，分批由香港到廣州。起義之時，四路進攻！胡毅生趨大南門，姚雨平攻軍械局，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而黃興親領一隊，攻最主要之總督衙門。

革命神史，述當日詳況，何等勇猛。大意：「黃興攻督署中彈，右手斷兩指，途遇防營軍數百，黃且戰且前，以肩撞破一洋貨店門板，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却。時指傷血積痛極，乃以凉水沖積血，血水流數丈，沖後自縛以止血。顛沛迷至溪峽機關，各同志悉外出，時已夜九時矣。無何，女同志徐宗漢歸，見狀大驚，而黃指血猶流未止，乃爲再裹。次日趙聲來相見，痛事未成而同志犧牲者累累，抱頭大哭，黃暈厥，飲以葡萄酒始甦。翌日，黃乘輪赴港，由徐宗漢護送，輪已無房，坐廳中沙發裝睡，徐以身障之。到港，指傷痛不減，日有一指將斷未斷，乃入雅麗氏

醫院割治，照例須親族簽字，而實徐之因緣由是結——在革命中戀愛，在戰鬥中戀愛，在苦難中戀愛。

時黃氏三十八歲。

指愈後，赴美洲。武昌革命前，在舊金山籌款，趕返上海。武昌起義，任民軍總指揮，登壇拜將，十分隆重。

當日起義，衆推黎元洪爲都督，因軍心浮動，民心未堅，欲效韓信故事，在武昌閱馬廠築壇，以印信令箭授黃興，軍民觀禮者數千，歡聲如雷。這時，黃氏嚮望，如日月中天。

不過事情并不很如意，民軍守漢陽失利，被迫棄城，黃氏離武漢，赴南京，頗受責難。

各省代表集議南京，組織軍政府，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副之。他担當大局，那裡有應付軍隊糧餉？寢食俱廢，苦無辦法。倒是兩淮鹽政總理張謇想出個濟急之道，以大生紗廠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

不久，清帝遜位，根據約法之政府成立。中山先生被推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副之，黃興任陸軍總長。

又不久，袁世凱做總統，不肯南下就職，邀中山先生、黃興上北京。黃不信袁的誠意，中山先生說：「不要緊，他不致害我。」到了北京，見袁似乎有心國事，遂致函黃氏，責他也去，黃始上京。

這是他到故都的第一次。都門人士，慕名已久，看看這位魁梧雄健穿西裝戴禮帽的偉人，十分敬重，也十分有禮。

袁世凱解散國會，革命黨人討袁失敗，黃氏遊歐洲。旋返上海。民國五年十月卅一日逝世。享壽僅四十四歲。

時袁世凱雖已死，惟北洋軍人，仍然跋扈。黃氏遺書其子說：「一厥愛兒，努力殺賊。」當其隨中山先生卸南京臨時政府職務返湘途中，在漢口賦詩贈友，哀感之中，微有傷感：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向落暉。

入夜魚龍空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絳衣將軍愚忠

辛亥歲武昌既入革命軍手，南中志士謀響應，時駐南京之軍事領袖三，一新軍統制徐固卿，本同盟會同志，一江防軍統制張勳，一江寧將軍鐵良，均同床而異夢者。江蘇諮議局中立，冀先脫清廷羈絆，議案付表決，僅句容蔣近垣、高淳王家寶兩先生持異議，案以多數通過，特與兩江總督張人駿商行止，張謂蘇政應由蘇人決之，有自退意，而鐵良雖旗人，因所部族營至疲弱也，不敢出一詞，寧人土方私自幸。

迨九月十五日，滬、蘇相繼反正，十六日官紳復集議，仍以獨立爲詞，蓋官紳無寸鐵，不敢倡言效滬、蘇也。忽張勳偕江北緝私營統領王有宏來，王厲聲謂：「敢言獨立者，吾必手刃之！」事遂止。次日督署衛隊起義，張調江防軍擊之，衆寡不敵，義軍多死，而徐固卿攻城之軍，亦初戰失利，旋連令蘇、滬各軍圍攻之，王死張走，後張且爲降將軍，惟不去辦，以承眷眷故君之意。

癸丑江寧之役，張率項城命南來，心存私憾，出死力以擊民黨，且縱軍大掠，寧人士至今恨之，迨病死，柯鳳蓀輓以詩云：「可憐廊廡奇男子，百戰終全關下身」。蓋譏其首鼠兩端，進退失據也。王有宏，字錦官，河北天津人，少無賴，俗所謂混混者也。既入營時忽奮志上達，治軍有律，較張軍不可同日語，江寧人士獨立之謀，雖志向不同，但其言殊凜凜，九月十五日，督署衛隊起義未成，城外客軍遂進戰，十七夜，徐寶山軍攻雨花台，王親登陣，命台兵炮擊之，死數百人，徐軍退，而徐固卿之軍亦被張軍擊走，相對旬日，聯軍大包圍之勢成，張懼，乃閉城堅守，惟王有宏畧，仍時出城襲之。

一日駐馬高橋門，（在中華門外）正指揮前進，忽爲飛彈所中，傷甚劇，緣王衣絳袍馬褂，爲揚軍官董門基所識，遙擊之，竟傷重不治死。張孤立無助，乃退守徐山，董以是役功升團長，不數日，張狼狽渡江，董在浦口截擊之，張部衆，董竟殉國，揚人士爲徐寶山鑄銅像，其傍立者，即董也。蔣近垣先生與王係舊識，曾於其談近錄中爲之傳。並詠之云：「獨有錢槍能血戰，最高橋下絕冠纓。」

辛亥預言與辦子革命

當清末宣統初年的時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謠云：「清受天命，十傳而亡」。查清廷由順治而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爲十傳。又有宣統拆字謠曰：「日宣三德，歷算三統。」解云：「宣統二字，皆暗合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果真宣統三年而革命興了。

按武昌起義之日，當時革命黨人，原約定辛亥年八月十五夜發難，後展期至廿五日，而十七日已事洩，不得已遂於十九日夜起事，是日爲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卒之義旗一舉，各省次第響應，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宣統果三年而絕！就是在最古典的預言文獻推背圖上，第三十七象庚子益卦，也寫下了這麼的讖語，說：「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真奇怪，這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結果竟然如他所料，南北共和告成。

讀者你看，所謂「漢水茫茫」，是指武昌首義之地，「倒戈八月」，是指首義之時。「無王」者，就是帝制廢除之謂。半凶似個「山」字，半吉似個「袁」字，是指孫中山先生以臨時總統繼承宣統之位，又以臨時總統讓與袁氏，故有「不統繼統」之語。這時、地、人三者，不是說得很巧合的嗎？

又宋邵雍梅丘詩第八首有句云：「漫天一白漢江秋，憔悴黃花總帶愁」。按此二句指武昌秋季起義時，民軍旗幟多尙白色布旗，內寫「還我自由」等字樣，故曰：「漫天一白漢江秋」。是役首義民軍推定黃興（字克強）爲臨時總司令，與清軍血戰一月，甚爲勞苦，是次乃繼廣州三月廿九之役而發難，故云「憔悴黃花總帶愁」，却也暗切事實，不亦異哉！

及至武昌首義成功以後，第一件與民更始的事，就是剪去豚尾的辮子了。溯自清軍入關，強迫漢人剃頭留辮，那就是前腦袋剃光二寸，後腦袋留長辮子，當時的命令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不少人因此反抗而喪命。漢人迫於無奈，有一首剃頭詩曰：「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不但幽了自己的默，抑且幽了滿清人之默。

却不料在二百六十八年之後，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滿清統治終於給推翻了，無數的漢人，都興高彩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議來慶祝的。偏有不少遺老們不肯完全剪去辮子，頭上四圍光光，中間祇留下一二寸長的辮根，說是沒有辮根好像沒有耳朵一樣的難看，後來張勳帥復辟，果然弄出了辮子兵的把戲來。

如今清朝垮台已久，連遺老遺少的辮子也沒有遺留的，辛亥革命的成功，總算基本上革掉了辮子

的命，報復了滿人之仇。有一首民謠云：「中華民國，大家拿得。中華民國，大家吃得」。

雲南起義蔡松坡唐繼堯

雲南起義的中心人物，實爲唐繼堯、蔡鐸，次則李烈鈞、羅佩金、黃毓成、趙亦新、顧品珍等亦與有力焉。

蔡松坡智勇出衆，機警過人，與李烈鈞之才氣縱橫，不可一世相伯仲。故能逃出虎穴，再到雲南。其與唐繼堯的關係有同學（日本士官），同事（前清十九鎮），同官（滇黔都督）之誼，精神很相契合，蔡離滇前，特薦唐以自代，更有相知之雅，故能不避艱險，慷慨赴義。唐氏對之，不但遠道相迎，而保護亦極周到，見面之日，蔡對唐以下各將領沖口即說：

「真使我喜出望外，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待我如此優禮！」

起義之日，唐即再三以至誠坦白之態度，將「軍都督」一職相讓，而自願出川北征，使蔡感動，至於涕下，而謂：

「我此次來滇，協同羣義，完全爲討袁、爲救國，並非爭權，亦非奪利，若果喧賓奪主，不論理論事實如何，總不足以示天下後世，更何以對滇中父老，深望冀廣（唐字冀廣），鑒此苦衷，無再固辭，並盼總攬全局，統一軍政，勿存客氣，不辭勞怨，獨爲其難，以赴事功。」

唐不得已，乃聘蔡爲第一軍總司令，將所部精兵十分之七屬之於蔡，且約定非有必要，均以咨文行之，唐蔡公忠體國，雍容揖讓，實爲近代軍人之楷模。而外間人士，因真像不明，且受梁啓超及進步黨之宣傳，竟謂唐氏非雲南起義之主動者、甚至上海牟利書賈所編之教科書，亦只言蔡錕在雲南起義，竟將唐繼堯一筆抹煞。究其原因，實以護國當軸，只重事實，不尚宣傳，蓋人本質，更爲木訥，專心苦幹，不事鋪張。消息隔絕，儼如世外，同志方面，多未真知。全國民衆，更屬茫然。

或謂蔡氏至雲南後，憑其威望，足以脅唐，其實唐果對蔡絲毫游移，若論交情，則可拒之於國軍之外。當時雲南所有軍隊，完全爲唐氏清一色之心腹部屬，且因蔡離滇後，所有重要將領，自營長以上，幾全更易，與蔡均不發生關係，似無制唐之可能。

或謂蔡氏遺愛在民，有舉足輕重之勢，爲唐所不及，其實蔡氏在滇，雖勤政廉明確有遺愛，然離滇省將近三年，唐氏繼之，勵精圖治，不惟深得衆心，且已主客異勢，蔡之不能爲主管，與李牧之不能爲趙相，如出一轍。更無反唐之可言！其與唐稍有不洽者，不過大洲驛之一二小事，假使蔡氏當年不死，自可水落石出，片言立斷。

當蔡氏在日本病故之後，唐氏曾對雲南各界講話：

「松坡爲國盡瘁，病歿於日本福岡醫院，實爲國家一大損失！……雲南起義，自由雲南人自主之，外間不察，有謂蔡松坡爲主動，余謂被動者，全滇軍民，深抱不平，余與松坡夙共患難，誓同

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松坡果然主動，余亦當然主動，余果被勸，蔡松坡亦當然被勸，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吾滇對松坡之死，應表示非常之哀悼，是非自有公論，一時之毀譽，不足憑也。」

總之，唐蔡兩氏，胸懷磊落，心地光明，非蔡不能見唐之偉大，非唐不能成蔡氏之豐功。進一步說：欲了解唐繼堯與雲南起義之真相，必先明白唐繼堯在雲南與革命之淵源。

癸丑革命以後，在贛、粵、皖、粵失敗之黨人，無所歸宿，此時滇督爲唐繼堯。皆收容至滇或任要職，或參內幕，或派至講武堂任教官，下級幹部，則設訓練班，革命勢力，已潛滋暗長。

民四秋間，籌安會發生，袁世凱野心暴露，國父曾派呂志伊赴雲南，運動討袁工作。呂志伊至滇後，即爲袁派偵探所悉，經唐氏授意鄧泰中，楊巖加以保護。呂即住在鄧公館內。鄧、楊均爲民黨同志，時方手掘精兵，而袁於稱帝前後，即對唐氏極盡籠絡之能事，曾封唐氏爲一等開武侯，復派其侍從何佩文入滇爲授勳特使。

唐氏沉機應變，態度雍容，內則下最大決心，外則虛與委蛇。十一月三日，曾在其介弟唐繼虞之警衛團本部，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出師之計劃。十二月九日，鄧泰中、楊巖兩支隊，即藉剿匪爲名，逕向川邊移動。

未幾，蔡鈞、李烈鈞已秘密到海防，香港，即將應邀抵滇。袁世凱聞訊後，密電蒙自道尹周杭（通步黨人），阿迷縣長張一鵬，相繼暗殺。唐偵知此事，立派其弟繼虞率兵往迎。以資保護，並下令

逮捕，周逃脫，張爲唐氏所殺。十九日蔡鐸乃由唐繼虞迎護至滇，二十一日遂由唐氏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舉義日期。

二十二日夜會由唐氏在光復會主盟宣誓，到會者除蔡鐸外，有李烈鈞、任可澄、羅佩金、張子貞、顧品珍、戴戡、戴翼翹、唐繼虞。王伯羣等三十餘人，歃血宣誓，三呼民國萬歲，其文曰：

「擁護共和，吾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同休戚，萬苦千辛，捨命不渝，凡我同人，堅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共鑒！」

由此可知當時起義的中心人物，如唐，如蔡，如李烈鈞等，皆激昂慷慨，忠義憤發，且凡屬宗旨相同來歸者，不問其爲何黨何派，皆兼收並容，一視同仁，故能集中力量，而收衆志成城之效。

唐繼堯述雲南起義

國民黨於二次革命失敗後，領導者國父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在贛、寧、皖、粵的黨員，無所歸宿，於是均先後赴滇，隸屬雲南都督唐繼堯麾下。民國四年秋間，北洋政府乃有籌安會之設，袁世凱的勸國陰謀，已暴露無遺。是年十一月十日，在籌安會導演下的國民代表大會開會，推舉袁世凱爲大總統，將中華民國改爲帝國，以民國五年改爲洪憲元年，此事公佈後，全國譁然，於是激發了十二月廿五日的雲南起義，通電聲討袁世凱。

當時在滬的領導人物唐繼堯，於通電發出後，而派李宗黃代表赴滬，與國民黨策動全局的代表陳英士接洽討袁的步驟，並廣函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報告起義的經過云：「君主肆虐，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轉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助。革除專制，還我民族，方謂永享共和，與歐美各先進國並駕齊驅，胥世界於文明之域。乃梟雄竊柄，大盜移國，會設藩安，實行帝制，舉國靡靡，誰敢抗顏，繼堯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灌輸，始終無二。寧忍以先烈志士艱難締造之共和國斷送於袁逆之手？用是厲兵秣馬，決與周旋。雲南全省人民，亦復憤慨填膺，誓不與此獠共茲視息。然而地僻民貧，兵單餉薄，雖如長沙子弟，能仗劍以先來，究嫌潮水師干，等孤注之一擲。所幸四方豪傑，雲集響應。先聲所至，鼓舞歡欣。我公澤天一柱，領袖羣倫，翕盼登高一呼，俾衆山之皆應。片言仗義，重九鼎以何殊，除已密函海內外一致進行外，並派李君宗黃駐滬，密與各方面同志相機接洽，或爲楚材之借，或爲蜀鑪之應，或拔戟以共鋤采魁，或解囊而樂輸義粟。總期早除袁逆之大慝，復我民族之自由……」

辛亥杭州起義火車頭撞進城門

辛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參加起義的人，現在還有不少生存的。前上海「神州日報」記者鍾璽玉，是杭州人，他以新聞記者資格，參加了杭州起義。在起義期間的前後，他已經躬親其事了。鍾先生本來在他的日記裡有詳記此事的，後來整理過，發表於「神州日報」。老一輩的報人，大概都讀過

鍾先生述杭州起義的日記的。袁世凱搞帝制時，收買報館，「神州日報」也自毀前途，被收買了，鍾先生反對無效，偕一二同志辭職返杭州。現在鍾先生已七十多歲，前幾年他曾親口對友人某君講過他和一班同志用火車頭撞開杭州城門的壯烈而又有趣味的故事。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播後，鍾先生和各同志在「神州日報」（在上海山東路）集會，認為浙江在此時起義最適合不過，但是杭州各同志的軍火不足，恐怕起事時不夠應用。因為杭州的駐防將軍，參領，巡撫等已畧有風聲，對新軍大加防備。每一新軍只許配備子彈三枚，這是不夠的。鍾先生和黃興等會商後，便派人向滬軍政府請求撥給在製造局獲得的長槍若干，子彈十五萬發，香烟罐裝炸彈（香烟罐裝炸彈，係上海黨人所製，藏烟罐內，以避人耳目。這種炸彈，因為原料和製造時不充分配合，故施放時爆炸聲很大，可以發火燃燒家屋，不能摧毀堅固的防禦工事；能傷人，但不能立即致人於死。）結果，滬軍政府都督陳英士答應撥給各種短槍，手槍三十支，槍彈九萬發，香烟罐炸彈三百枚。何以發得這麼少呢？原來滬軍政府攻下製造局後，雖然得到大批武器，但其他各地區也急於要用，實在不能盡量供應，只得照所求的數量打個七折八扣了。至於長槍一項，因為上海的軍隊尚不敷用，不能撥發。

鍾先生等人領到軍火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把它運到杭州。會議結果，於九月十四日開駛專車，計火車頭一輛，蓬車二輛，午夜在南車站待運。運輸人員推定鍾豐玉，王伯南，汪達安，而以高

爾登爲領導，高爾登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曾在雲南講武堂任教，富有軍事學識，由他領導最爲適合。

是夜十二時十五分專車開行，清晨三時五十五分，專車已經駛近杭州了。火車要開入清泰門才能到達關王閣總站的。車將及門，燈光照見城門關閉，但沒有人防守。清泰門很是堅固，門包以鐵皮，不容易把它打開的，各人見此情形，無法可施，但又不能把車駛回上海，更無善法可以把軍火搬入城中。高爾登主張用火車頭猛撞城門，就是全體同志犧牲了也是壯烈的，衆人個個都贊成，絕無一點貪生怕死的心理存在，於是他們找着火車頭駕駛員趙某（忘其名，只知道是南京人，滬杭路局的人叫他做老趙），問他火車的力量能撞開此門否？他是駕車的人，首當其衝，他怕危險否？

趙同志慷慨激昂地說：「我也是黃帝的子孫，今日爲我漢族驅逐胡人的好機會，我區區一命，有何可惜！不過要讓我去看看城門，看它到底是怎樣堅固的。」說後，他下車走向城門一看。不到十分鐘，他回來了。他說：「好得很，我的車頭包你可以打開城門！不過有一層要顧慮的，車頭撞過去，震動力很大，城門的回力當然也猛烈的，車上的炸彈恐怕會爆炸，那時全車的人難免受到傷害了。」衆人一聽不錯，個個都想犧牲，但人人都死光了，炸彈、槍支、子彈已成灰燼，就是城門開了，有何用處？後來還是趙同志有見識，他說：「我得一妙法，把連車二輛的詹天佑鈞解開，單用火車頭去撞，車頭倒退三里，疾馳向城門一撞，必見功效。第一次不行，又來二次，三次，到第四五

次，城門也就開了。」

衆人拍手叫好。趙同志馬上如法泡製。他加足火力，親駕車頭猛向城門衝撞過去。城門發出鉅聲，雙扉受損，但還未到開闢的程度，第二次又倒退二里撞過去，左面一扇門已裂開，可以望見城內的軌道了。撞到第四次，城門洞開，火車可以進去了。趙同志再把車倒開，鈎套了兩輛蓬車，聯同了諸同志歡天喜地的進入城中，把軍火交給臨時司令部的總統周赤忱，杭州軍民得到了軍火接濟，才能把滿洲兵打垮，完成起義的大業。

蔡元培製造炸彈

蔡元培熱誠革命，自從加入同盟會後，也曾參與暗殺組織。顧當時對製造炸彈一事，最感爲難，知其友人鍾憲曾，素研化學，因介之入會，拼合炸藥。炸藥成後，又無彈殼裝盛，適值黃克強氏自東京返滬，秘携彈殼十餘枚，既造就，至南京雨花台，僻處試驗，竟不能爆炸，爲此決心改良，與其介弟元康等廢寢忘食的研究，造成了一枚炸出洋致察憲政的清廷五大臣的炸彈，投彈者爲吳樸。

及癸卯冬，帝俄進兵奉天，舉國騷然，是時適任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因與同志陳去病，林懈，劉光漢，王季同諸氏發起「對俄同志會」，又刊行日報一種，名曰：「俄事駢聞」，專錄載俄人侵中國消息，及抨擊清廷外交政策的失敗，藉以喚起國人的注意。旋更擴大篇幅，改名「警鐘日報」，由蔡

氏與柳棄疾，劉光漢，陳去病，孫寶鏡等同住撰述，言論益見精彩，實繼承「蘇報」和「國民日報」的傳統。出版數月，行銷日廣，後因批評清廷的失地，持論過於激猛，遂被俄國領事照會當道強行封禁，并出票拘捕主筆，劉光漢逃而免，蔡氏則得同志的援助，於發生前一日避往青島，得以免禍。

長北京教育部時，蔡氏主張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爲國家的教育宗旨。其任大學院長時（民十六——十七。）曾籌設藝術學院於杭（後改爲藝專。）籌設音樂學院于滬（後改爲音專。）且自兼院長，而於文藝、詩歌、書畫、建築、雕刻及音樂等之有關於美育的，亦多好之，故對美育曾下過很清楚的解釋：「……因爲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脫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界，應特別注重。」又說：「精純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尙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滅。」由此可知其對於美育，有着極深湛的研究也。

民國五年，元培方在法國，教育部要他回國担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北大的風氣很壞，旅法的友人，都勸他不要嘗試，恐怕整頓不了。彼則獨排衆議，毅然回國。就職後，第一次對學校訓話。就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爲天職，不當以大學爲升官發財之階梯。」把北大的病根，一語道破。他的整頓北大，是從文科開始，一面淘汰不負責任的教授，一面延聘積極的學者，舊教授而有新思想的，如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等。元培皆熱心延攬，另聘陳獨秀，周豫才，劉半農，周覺明等，

構成了整齊的陣容。胡適以一留學生新進，亦被聘任該校教授，即出彼一手提携。胡氏既與陳獨秀提倡新文學，領導學生創辦「新潮」及「新青年」雜誌，對於舊學的抨擊，不遺餘力。時長廬林琴南亦在該校教授，力加反對。彼則對胡林二人，兼收并容，不作左右袒，於二人的爭論，以不問不問的態度出之。而「怪人」辜鴻銘，（亦在該校任英文系教授）以爲元培的提倡新文學，實別有用意，因以「冬烘先生」筆名，撰成一文，于蔡氏頗有微詞。元培見而一笑置之，由此可見其氣度的寬大。

民國裂痕憶六月

辛亥革命成功，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辭臨時大總統職，以讓北洋渠魁袁世凱，其目的原在於澄清國內戰雲，使國家能循正軌發展。孰意袁氏果雄自肆，驕心包藏，奪利爭權，陰謀迭出，至民二年，即有刺殺宋教仁案件，且又進行二千五百萬鎊善後借款，藉作誅鋤異己用途。因而惹起反對聲喧，國家重墜險境情況。而六月九日明令免江西都督李烈鈞職，十四日免廣東都督胡漢民職，十八日准川粵漢鐵路督辦岑春煊辭職，三十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職，因而此酷陽如火之六月，亦使國家重墜酷陽如火之煎熬。一部民國史之回憶，未嘗不嘆民二年之六月，實開民國而後內戰之先河。而袁氏一意孤行，並不悔改，復且明令撤銷孫中山督辦全國鐵路全權，悍然無所顧慮。其有負於國家，有負於國民，可謂甚矣。孫中山先生曾於其時，親電袁氏：電文畧云：「文去年北上，與公握手言歡，聞公諄諄以人民

國家爲念，以一日在職爲苦，文謂國民期望於公，不僅在臨時政府，十年以內，總統非公莫屬……何圖宋案發生，證據宣佈，愕然出於意外。……而公更違法借款，以作戰費。無故調兵，以速戰禍，異已脫去，兵燹仍挑。以致東南民軍，荷戈而起，衆口一詞，集於公之一身。意公此時，必以平亂爲言。無論東南軍民，未叛國家，未擾秩序，不得云亂，即使曰亂，而釀亂者誰？公於天下後世，亦無以自解。……文當日辭職，推薦公於國民。固有人責言。謂文知徇北軍之意，而不知顧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文於彼時，迄不爲動。……爲公僕者受國民反對，猶當引退，況於國民以死相拼。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猶不可爲。況流天下之血以從一己之欲？公今日捨辭職外，決無他策，昔日爲任天下之重以來，今日爲息天下之禍而去。以處光明，于公何憾？……若公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入，文必以前此反對專制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惟公裁之。」詞意嚴正明晰，文章鏗鏘可誦，顧陳琳之極，未愈頭風。袁氏梟雄自恃，畧未瞻顧，更成立所謂段祺瑞之戰鬥內閣，悍然對南用兵。以北洋軍潛勢之雄，益以善後借款巨額資財用爲軍費，復加挑釁利誘，乃能使蘇督程德全，閩督蘇德仁取銷獨立，粵督陳炯明被逐，龍濟光入粵肆虐，凡此種種，均有助於袁氏當時所謂「戡亂」之成功。然袁氏背民自逞，雖軍事奏效一時，而禍胎已潛伏萬世，後此內戰頻興，此仆彼起，積數十年未絕，且引致日閥侵凌，飽受千秋恥辱。袁氏之罪，固擢髮難數，而此酷陽之六月，首裂創痕，撫今追昔，未嘗不使人撫膺長嘆，認爲一子錯，全局由而變色也。

小站練兵與

和袁世凱同在朝野共事的王國十年才逝世），他在「蠅」盧知兵，只以姜桂題，宋慶等老練些都叫做新軍，後來他們藉此

戊戌政變後，世凱以任山東時，便屢次上奏西太后，請統練兵處，以獎勵爲大臣，而世凱手下的幹部到練兵處，以漢軍祺瑞（時爲副都統銜直隸補用）大臣的則有鐵良，徐世昌二人練兵的計劃，定全國練新兵，以世凱的表弟張銀芳（天津，良見世凱的權日大，深恐對滿

雖已放逐，但北洋軍界，仍暗奉世凱爲宗主，到辛亥革命，清廷手足無措，不得不起用世凱來指揮北洋軍隊，世凱遂得利用這一副本錢，一舉而取滿清代之。

世凱既藉北洋兵力取得大總統之位，於是北洋派軍人，分踞中國要津，在民國初年，這班北洋軍閥握各省民政軍政大權者，計有：段芝貴，倪嗣冲，龍濟光，朱瑞，李純，陸榮廷，趙倜，陳宦，王占元，閻錫山（今尚存），湯梯銘（改名住心，爲今日民社黨中心人物之一），國建章，孟恩遠，張作霖，張懷芝，段祺瑞，盧永祥，齊燮元，田文烈，曹錕，王揖唐等數十人。其中雖有幾個人與老袁沒有甚麼香火緣，但其憑藉以出身的階梯，仍是在北洋。到世凱死後，北洋派（有文有武）分裂，但北洋軍閥仍爲中國政治上有勢力的人物，幾個總統都是其中的幹部。一直到前幾年閻錫山沒有了兵力，北洋軍閥才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上溯光緒丙申年世凱練兵小站，到今日恰一周甲矣。

袁世凱智囊團人物

在辛亥革命時期，真正的稱得上爲袁氏左右的不過是下列這幾個人：

第一名是趙秉鈞，他的身世是怪有趣的：他的姓是百家姓第一個；名是皇帝脚第一人（「秉國之鈞」之意）；排行第一；生庚是歲首第一時，（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時出世）這顯然是他自己偽造的。他的父母已不可考，幼時曾在河南臨汝縣做書童，由於富於機謀，長大後，就在縣裡做了一個小官，

於是由曲史而聞知，而道台，而侍郎，而尙書，一路扶搖直上。他有一個號，叫做智庵，袁世凱也因賞識他的智謀，認他爲心腹。所以在辛亥時期起，他就一直在袁氏的左右，做了兩任內務總長，又做內閣總理，又做直隸省督軍。他爲要替袁世凱做第五縱隊，佯作加入同盟會來欺騙黨人，所以袁與宋教仁都上了他的大當。後來又甘冒不韙，替袁世凱策動暗殺了宋教仁。一天，突然五孔流血死去。

第二名是楊士琦。他是安徽泗州人，已故直隸總督楊士驤的弟弟。當袁世凱還未給清廷放逐時，他們兄弟二人均以袁黨著名，他和袁氏有着悠久歷史和深感情，是袁左右中最懂得袁氏脾氣的，可說是袁氏的首席智囊。但他的命運不好，因爲以「袁黨」出了名，所以不能大用。辛亥革命，他奉命南下，監視唐紹儀的行動，不在北京。

第三名是楊度，當時也是奉命南下，替袁氏做第五縱隊，收買民黨中的動搖份子和做宣傳工作，所以也不在北京。

第四名是梁士詒了。他在辛亥時在袁氏左右担任工作。

此外，當時還有誰够得上稱爲袁氏「左右」呢？徐世昌是「尊而不親」，正如當時馮國璋雖在北京，但他因受一個男爵的封典，主力對南方打仗，袁氏特地調他北返任禁衛軍總統官，所以彼此間的情感也不和諧。替袁氏南下武昌向黎元洪運動停戰的蔡廷幹，雖也可算是當時參預機要的人物，但他只是梁士詒援引的，祇是第二流人物而已。由此看來，當時在北京够得上稱爲袁氏左右的，實際祇有趙秉

鈞和梁士貽二人，而趙秉鈞是佐式出身的，雖詭計多端，做間諜，組織暗殺團，是其特長，弄文筆却非所宜的。

梁士貽中指出「詔末三語爲天津某鉅公所擬」。這「某鉅公」可能是徐世昌。但這「三語」是添上去，所以說「擬」，而不是修改，更不是把「着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協商辦理」改成爲「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啊！這完全是爲清室着想，和袁氏絕無關係的。

袁世凱買弄部下手法

從來談袁世凱「發達」史的，都說他是从小站練兵而起家，其意大抵是謂他挾武力以自重，把清廷的軍隊作爲了私人的武力，因此而扶搖直上，爲所欲爲，最後，終於成了窃國的大盜。可是，袁世凱究竟怎樣把清廷的軍隊化爲個人的武力？怎樣使其部屬知有他而不知有清廷的呢？清末曾經督練過軍隊，掌握過軍權的漢人不少，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會和袁氏一樣編練過新軍，爲什麼他們却不能像袁氏一樣使其部屬祇忠於他個人而不知其它的呢？袁世凱小站練兵的特殊意義就是在這一點，這才是致令他「發達」的主要因素。

袁世凱怎樣使其部屬祇忠於他個人呢？我們在其所編訂的所謂新建陸軍（即其在小站所訓練的軍隊）的章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按當年袁世凱於奉派接統胡燏棻所督練的定武軍，改編爲新建陸

軍後，曾擬訂有全部計劃，全文洋洋幾達萬言，對該新軍的營制餉章，開列得很清楚，就表面來看，似乎這樣的創造軍制是很新穎而又合理化的，可是骨子裡却有無限弊端，簡直是把往昔軍隊裡頭營私舞弊的陋習，公然使之成爲合法之舉！茲試指出若干較爲重要點於下：

據袁氏在「爲練新建陸軍上督辦稟」裡有云：「……所擬餉數，例之湘淮餉制，未免嫌優。但餉薄則衆各懷私，叢生弊竇，餉厚則人無紛念，悉力從公。且威著於知恩，則行於信賞。每屆關餉，並簡派委員，核實點發，營員不得經手。則上無侵蝕，下免紛紜，積習頹風，可冀力挽。」話是說得很動聽，但實際情形却不然。按清末湘淮軍的餉章，每千人月支不准過五千八百兩，而袁氏所訂新建軍餉章，砲隊每營（千人）月餉一萬二千零一十八兩；步隊每營（千人）月餉八千六百九十兩；馬隊每營（五百人）月餉七千三百零六兩；工程隊每營（五百人）月餉三千九百九十六兩。支出的餉項確是比前大增了，但所增加祇是軍官——尤其是上級軍官的薪俸，士兵的待遇卻沒有改變過。因爲湘淮軍的士兵的月餉是四兩五錢（張國傑的營勇且是每月五兩四錢），而袁氏新建軍的餉章，待遇較優的砲隊月餉不過四兩八錢，步隊的月餉仍舊也是四兩五錢罷了！但是軍官的待遇呢？湘淮軍的營官（即營長）月薪五十兩，辦公費一百五十兩。新建軍的砲隊統帶（即營長）則爲月薪一百五十兩，辦公費一百兩；步隊統帶月薪一百兩，辦公費三百兩；馬隊及工程營統帶薪水公費合計均爲三百兩。這真是比從前大增了。不特此也，湘淮軍營官的辦公費，按章註明是包括「幫辦及管賬目軍裝，書記，醫

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補各費在內」的。而新建軍則不然，餉章上每營裡另設有幫統，領官，文案，醫生，醫藥等員弁，都是另行支給薪俸，並不是在辦公費內開支的。所以湘淮軍的辦公費，長官是不敢全部中飽的，有贏餘的話就積存了起來；但新建軍的辦公費却不同，長官大可以「袋袋平安」，中飽私囊的。所以袁氏標榜新建軍餉優，實在祇是對軍官而言，大兵却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因為袁氏祇要軍官對他「知恩」就够了；士兵是不需要的，這是袁世凱收買其部屬方法之一。

袁世凱又在新建軍章制上，訂立了一種所謂「兼充」的制度「……一軍分爲兩翼，設統領二人管轄。每步隊兩千，砲隊兩千，馬隊一千，更各設分統一人，分領訓練。每步砲工程隊一千，馬隊五百，各設統帶一人，專轄約束。統領以各分統兼充，分統以各營統帶兼充，真可省官節費。」這辦法，表面上是爲政府節省公帑，但事實上袁氏却是藉此來控制其部屬，凡是順從他已結他的便擢升兼充分統或統領。因爲按照新建軍章制，營統帶兼任分統後，就可增加薪水辦公費以及各種雜項開銷，每月共二百八十四兩，擢升兼充統領的亦可增加二百六十兩。這是袁世凱控制其部屬的一張王牌，是很靈效的。（據說：袁世凱曾對段祺瑞玩弄過這一種手法，段氏後來果然常常對人談着這樣的話：「小站練兵初期，有一次，分統一員出缺，應由考試合格的補授，不料却被馮國璋考中了，宮保（指袁氏）對我和華甫（指馮國璋）本來無分軒輊的，但却對我引爲憐然。後來又有一分統出缺，那回他深怕我考不中，特先向我通關節，這是我終身不能遺忘的一件事。」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還有，中國舊式的軍隊，按例是設有長夫的，這是因為往昔交通不便，行軍多走旱路，如果自行配置有長夫，行軍定必許多窒礙。尤其是在戰時，長夫更是必需的。所以湘淮軍的章制，曾訂定軍中所有長夫的人數：「……軍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太多。今立定限制，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百六十名，凡帶百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十六名。」湘淮軍是在戰時成立的，置有長夫是應該的。但袁世凱的新建軍，一方面既規定：「各營遇有徵調，每步砲工程隊一營，須置隨軍糧械官車四十輛，馬隊減半。如征途較遠，所有後路轉運車輛，仍須另支添價。」一方面各營隊裡又配置有大量的長夫，計步隊一營置長夫二百八十二名，砲隊一營置長夫二百七十二名，馬隊一營置長夫一百九十四名……全軍七千人，竟配置有長夫二千一百四十人之衆！事實上，這些長夫是沒有的，其餉銀（按舊會長夫每月工資費三兩）全部盡爲官長所侵吞。袁氏這種做法，實在是開了後來北洋軍閥浮報軍額，侵吞缺餉的先端。此無他，他不過藉此來對其部屬市恩，使他們樂爲己用而已。

清末統帶軍隊，本已是發大財的捷徑，湘淮軍的軍官，經已是很多扒錢的門路了。曾國藩曾在上海奏清廷時說過：「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廩餘，以養將領之廉，而振軍士之氣。」所以湘軍一個營官（營長），帶兵不過三年，家中已成「素封」，（見曾文正家書）；李續賓號廉將，常以廉俸救濟他軍，死時尚餘款數萬兩；彭玉麟常對傷亡卹賞特多，但也積存了六十多萬賂私費。其他可想

而知了。袁世凱這樣來爲其部屬廣闢扒錢的門路，把營私舞弊成爲了合法化，他們所得當然更多，當然對於袁氏，感激流涕，爲命是聽了。所以袁氏後來在光緒末年，被迫交出了大部份的軍權；宣統時被放逐返老家去，但「小站系」的北洋將領仍和他維持着密切的關係，終於藉賴着此班嘍囉的勢力而再起，無非都是得力於所謂「使食」的手法罷了。

筆桿勝鎗桿的一例

民國四年，袁世凱之錫國稱帝，其初表反對者，除國民黨要員外，皆爲當時執筆之名記者，章太炎、梁任公、李大釗、高一涵之輩。全國輿論靡不反對，影響所及，握有軍權之武夫，知民心之向背，均起而倒袁，各省響應，袁氏亦憤懣敗死矣。

民國二年，世凱使賊暗殺宋教仁於滬，旋貸四國款二千五百萬元，解散東南救國之師。章太炎乃見世凱，力斥其非，世凱竟幽之，太炎憤不食，自分以爲必死。時高一涵致書刊載甲寅雜誌，以救太炎！其書曰：

「記者足下：有友自京師來，道及太炎先生近境，窮餓囚拘，間日一粥，輾轉塵榻，形若槁木。直言之曰無形殘殺而已！先生之學，總綱玄妙，超絕人天，雖在婦孺，亦逆料其不能容於世。不幸而遭不測，於先生性分固無絲毫損益；特國華消喪，民質就亡，存形體而喪精神，是俗儒而非絕學，固有

之精蘊行捐，而輸入文明，復非咄咄所能融貫，神魂悵悵，其何能國之云？矧方今大總統在上，聖神文武，明析秋毫，排讓盛儀，繼隆古昔。黃巾猶拜鄭公，阿瞞尙容名士；而亡清末季，文字禍興，樂先生於上海，海內激昂，猶得不死。今先生所履之罪，與擊鼓罵罵者奚若？大總統之爲人行事，與黃巾阿瞞奚若？民國興亡清又奚若？凡有血氣，雖不敢宣之于口，類能識之于心。乃鋤戮文豪，獨見于盛世，余竊爲盛世惜之。夫當道視先生其重如此，要皆左右親近游揚之功也。積毀銷骨，衆口鑠金，理有固然，無足深責。獨惜海內正人君子，亦拊口而莫之救視，一若先生之死爲有當，而大總統之生殺可以好惡出之也。嗚呼！文王明夷，卽時主可知矣；仲尼厄毀，則人心可知矣。此其問題，固不關先生一身之事也。在視革命若蛇蠍之滿清時代，清議猶能生先生於獄中；謂當共和大成之秋，而不能救先生於龍泉寺，又以何說爲辭？先生，吾國之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此其義，凡讀先生書者，類能道之，又不假余一一談也。所可怪者，海內噤口不道先生事，雖雅知敬憚先生者，亦多作仗馬寒蟬。氣餒可然正義，其信然歟。余有某君（按：指李大釗），於先生初無一面緣，徒以激於公憤，今已驅車返去，尚以營救先生爲事。今先生如得釋，當與偕隱；否則非常豫測也，以實行自任，以鼓舞公論相援助任余。此余友之決心，臨行涕泗縱橫爲余言之如此。余交寡能薄，未能如約，心滋慚焉。然正義所在，不敢負吾友耆負先生，并負後世，聞貴報影響於社會頗大，敢爲言之。儻能加以鼓吹。隨成輿論，得救先生，使當道者知人心不死，公論終不能屈於威權之下也，則非特二三小子

之福矣。高一涵白。」

高氏此書刊登甲寅雜誌後，輿論益不佐袁氏，以世凱之奸雄，亦知公論之可畏，竟釋太炎，一面此文，人比之孔文舉之救盛孝章，當時所謂甲寅派文章，舉國爲之震動者也。

洪憲穢史秘聞

袁項城新華宮八十二日皇帝夢，不特成爲民國一頁穢史，且貽羞萬邦，引爲笑話。

項城父子，深信青龍白虎之說，有堪輿家郭某，紹興人，奉召入京，甚爲信重，欲試其術，袁氏家人，陪往項城故鄉，驗看祖墓，那一穴發迹皇帝。歷閱墓地十處，第七冢者，則項城生母之佳城也。測看畢，問皇帝昭靈，應在何塚？郭曰：「大發在第七塚」。衆問何以證明？郭曰：「此境外形，來脈雄長，經九疊而結穴。每疊山上加冕，應九五之象。加冕者，大山上加一小山也。左右迎迓護衛，羅列諸侯，層層拱立，眞帝王肇陵之形勢，鳳陽有此氣象，如欲驗予言確否，請查內形。此墳四面包圍，以流泉爲階沙，匯於明塘，此龍源也。葬曰：『相彼陰陽，觀其流泉。』建都尙重流泉，墓地更爲重要，諸公不信，請試驗之。據墓地周圍五丈，必有龍源伏流，而後知應在當今，予言不謬也。」於是據墓外地，掘一小孔，泉源流出，衆論翕然。歸謁項城，項城問曰：「龍興之運，年數幾何？」郭對曰：「八十二之數」。項城曰：「八百二十年乎？八十二年乎？抑八年零二個月乎？」郭對曰：「天機不

可洩漏，久後自知。」項城曰：「即八十二年，亦已綿延三世，予願足矣。」郭對曰：「天子萬年」。項城甚滿意。洪憲敗亡，人詢郭某究竟。郭曰：「墓地形勢甚佳，但即令大發亦不過曇花一現。」問何謂八二之數？郭笑曰：「當時項城下問，會卒幾無以對，忽憶八卦陰陽二氣，乃隨口答以八二之數，不圖竟應在八十二天也。」

洪憲年號，民國四年十二月卅一日除夕前，方議決頒行。初擬用「中華帝國元年」，後以「中華民國洪憲元年」比較妥善，可免引起外國的誤會。時京中各報，均已上版，忽接「大典籌備處」通知，已上版用黑口者，加印紅邊，未上版者則印紅字，所定格式爲「中華民國洪憲元年」。於是各報書元，別爲四種：薛大可主編的亞細亞報，大書「中國帝國洪憲元年」，袁氏政府報也。其他各報，有遵令書「中華民國洪憲元年」者；有不書「中華民國」，而僅書「洪憲元年」者；獨順天時報，爲日本人資本，向護帝制，則大書「中華民國五年元月元日」。洪憲朝廷，竟莫如之何。有醒華報更是滑稽，洪憲元年之洪字三點水旁，畧呈黑痕，驟視之則爲「共憲元年」，意謂洪憲已爲水洗去，仍存共和憲政也；主報者爲汪瑞麟，吳宗慈，覃壽堃云。後項城爪牙，藉他故將該報封閉。滬上各報，僅項城政府創辦之亞細亞報，及用金錢收買的神州報，鋪張揚厲，歌頌帝國，慶祝洪憲。二報主筆政者，皆一時重要名流，貧識若是，足見利令智昏，滋可嘆矣。

袁世凱求醫

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跛腳，他是騎馬跌跛了的，他的老子爲他一共醫去了二十多萬元。美國一個外科醫生薩潑博士所著的自傳裡說：袁克定那條小命還是他救回的，這一開刀袁世凱就送了十萬元。

袁克定在滿清時會到德國留學，還會講英語。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他在彰德騎馬，傷了腳。那還不算嚴重，最糟的是一跌之後，他的腦受傷，手脚都不能動彈，變成半身不遂了。袁世凱當然着急，他刮來的民脂民膏很多，便出重價求名醫，醫了好久還探不出病源。後來有人介紹蘇州一家教會辦的醫院一個外科主任薩潑博士，世凱便派人去請他，從上海坐專輪到青島轉車入北京，然後再去河南袁氏的養壽園。薩博士給他開了後腰一刀，刮出很多瘀血，半個月後，他的手脚才能動，但左腳跛了。醫好後，薩醫生又再入北京，老袁歡喜非常，認爲他有起死回生之術，要留他在身邊當「御醫」，他不肯，老袁就當面送了一個白信封給他，說是診金。他回到六國飯店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張十萬元銀圓的支票。

籌安六君子

民國是承受幾千年的專制餘毒，一旦革命成功，人民民主政治的真諦，可以說是陌生的，袁世凱

所起用的人，都是滿清遺下的舊官僚，這批人對於「俯伏稱臣」的奴才修養，已是爐火純青，大都戀戀不忘於帝制時代的封妻蔭子，耀祖光宗的殊榮，所以當民國二三年間，北京就流傳着「共和不適合國情」的謠言，滿清遺老榮乃宣，宋育德藉此鼓吹清帝復辟，旋被查禁。不過，這種謠言袁世凱是聽來悅耳的，他雖不願清帝復辟，但他自己却願「證實民論」來做皇帝的。不久，總統府的美國顧問古德諾這位先生，在他要轉回美國的時候，心血來潮，寫了一篇「共和不適於中國」的論文，在他無非是商榷的意思，可是，袁氏下面一班利祿小人可就有了藉口了。

頂起勁的是楊度，心想自古開國元勳，都是汗馬功勞換來的，我這文弱書生，不能衝鋒陷陣去爲袁總統打天下，何不從此促成帝制，將來分茅列土，世襲罔替，真是千載一時好機會，於是聯絡劉師培，孫毓筠，嚴復，李燾和，胡瑛等成立籌安會，當時稱他們爲「籌安六君子」。一方面由楊度撰了一篇「君憲救國論」，劉師培又作了一篇「君憲論」爲之申論引證；同時，通電各省，請派代表來京，討論國體問題。

提到這裡，幾乎把一個帝制運動中最重要的角色遺漏了，那就是袁世凱的寶貝兒子袁克定。

袁克定爲了想作東宮太子，將來好繼承萬世一系的大統，自然一力促他父親的帝制運動。因此，就與楊度等日夜計議。

他們那種掩耳盜鈴的辦法，說來實在可笑，當時署理湖北將軍的段芝貴，原是袁世凱的乾兒子，

由他領銜聯合各省將軍向中央請願改行君主立憲，同時推戴袁總統接皇帝位，但光是幾個軍政官僚請願，不足以代表民心，故又由各省袁系人物，發動紳商請願，天下滔滔，有的是勢利小人，果然不到幾天，各處請願團風起雲湧，請願書像雪片似的向北京呈遞。上海商會總理周晉銘，還親自晉京上書，這一片「忠君愛國」的思想，却也「難得」！北京城內更鬧得烏煙瘴氣，什麼教育會請願團，商民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乃至乞丐，娼妓都成立請願團，似乎「天與人歸」，袁總統再不出來讓位，就要「其如蒼生何」了！

此外，宣傳工作也有他們的一套，北京城的報章，當然不敢說話反對帝制，上海租界內的報紙，却把袁世凱罵得狗血噴頭，於是派人在上海望平街出版亞細亞報，專門鼓吹帝制，可惜這張報紙在上海是沒有人看的，報販也不肯叫賣，不過這是沒關係的，反正宣傳對象是袁世凱一個人，只要他看到有上海發行字樣的報紙，輿論是傾向帝制，使他認為這運動是「順天應人」的，便達到辦宣傳者的目的了。所以，這張報紙，每天只須印出一張送到京城總統府進呈賜覽，就可以領到整個報館的經費。只是這個報館，不久吃了在上海革命黨人的一個炸彈，人雖未受傷，但某公却嚇得屎滾屁流，逃回北京向袁大公子去哭訴，要太子去另請高明。

人民儘管反對，袁世凱的帝制還是要行的，在他想，各省的軍政首長，大部份是他提拔出來的人，看來個個都對他是効忠的，那還怕甚麼呢！外國方面歐戰正殷，列強無暇過問，與日本又訂了廿

一條的賣國條約，當然對於袁氏的帝制予以贊助，在一種內外均處有利的形勢下，不幹更待何時？於是由朱啓鈴負責「大典籌備處」，準備一切登極的工作。

說來也奇怪，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對於乃父的帝制運動，頗不謂然，尤其看到其兄克定那樣助長他父親之惡，更爲痛恨，可是舉目盡是熱中利祿之徒，他又有什麼方法阻止呢！所以他只好縱情詩酒沉湎詞章，和一般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文人相往來，別人談起帝制的事情來，他總是「掩耳疾行」然而，克定仍然不放心，深恐其弟黨羽日增，將來演出李世民剪殺建成元吉的故事，故時常對克文借故挑剔，克文雖感慨地念着「煮豆燃豆其」的詩句諷刺他，克文大怒，兩人竟口角起來，克文說：「你要做曹丕，難道不許我做曹植嗎？」這事給他的老子聽到了，就把他們兩人叫進去大罵道：「你們這兩個畜生，怪不得外面人罵我是篡位的曹操，你們兩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嗎？有你這兩個寶貝兒子這一鬧，我這個名正言順的曹操，還用來分辯嗎？」這也是當時袁氏內府的一幕笑話。

袁克文這個人能出污泥而不染，的確是「榮國府門前的石獅子」，洪憲濁流中的乾淨人，「幹父之壘」，「亢宗之子」，這八個字，寒雲（克文）足以當之！

話題不要扯遠了，且說帝制運動，是民國四年八月中旬開始發動，十一月就投票決定袁世凱爲皇帝，十二月下令承認接受帝位，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這年元旦登極，總統府改爲新華宮，袁氏公

然穿起「大典籌備處」諸公斟酌今所設計的皇袍皇冕，並接受那些洪憲開國元勳的朝賀，所謂「六君子」，「十三太保」之流，自然是袍笏冠冕，感恩零涕。一共只四個月的時間，就把國體變更了，其神速滑稽，令人嘆爲觀止！

那知道袁世凱那班人防範不嚴，陳蔡鎬逃出京門，跑到了雲南，就與唐繼堯，李烈鈞等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組織護國軍，首倡獨立。由蔡、李分統一二兩軍，向川桂進發。袁氏聞訊，一面免除蔡、唐、李三人職務，一面下令出兵討伐，接着，貴州的劉世顯，廣西的陸榮廷首先響應。廣東的龍濟光起先曾受過「洪憲皇帝」所賜的五等勳位，及梁任公到廣州策動反袁，龍濟光此時以環境所迫，也只得宣告獨立，不久浙江方面呂公望繼屈映光爲都督，袁氏羽毛又去一個。

各省獨立既多，討袁方面爲求軍事統一起見，於民國五年五月在肇慶成立「軍務院」，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副之，遣戴黎元洪爲大總統，對內對外一切以軍務院名義行之。政府既成立，護國軍之聲勢大振。陝西的陳樹藩獨立於三原，進取西安，驅逐了袁系的陝督陸建章，與滇、粵軍遙爲策應，山東方面，吳大洲、居正各據一部獨立，護國軍之勢，遂由滇池，珠江，長江而伸入黃河流域了。

江蘇都督馮國璋，湖北都督王占元，雖未公然反袁，却宣佈嚴守中立，嗣又勸告袁氏取銷帝號。

八三繁華一夢消

當護國軍初起，袁氏以爲可以武力鎮服，旋知大事已去，爲保全總統職位計，申令撤銷帝制，那一道撤銷帝制的命令，是出自王式通的手筆，這命令一開頭就說：「民國肇造，變故紛乘，薄德如予，躬膺艱鉅，憂國之士，怵於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這種措詞文句，也聽他說得出來。又說：「當隨民意爲從違，責備彌周，已至無可諉避，始以籌備爲詞，藉塞衆望，並未實行。」如此這般輕輕卸責，又想重溫總統的舊夢。

無奈，護國軍方面，堅持非袁氏退位不足以息衆怒，五月下旬，連袁的私人湯翰銘和陳宦，也在湖南和四川兩處宣佈獨立，袁氏至此，憂憤成疾，竟至不起，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暴斃於新華宮。可憐他改元稱帝，一共祇有八十三天，就「天運」告終了。於是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務，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恢復約法，重開國會，西南各省相繼取銷獨立，中華民國復活。

最可笑的是，當這幕醜劇快要完場的時候，一班洪憲要人，有如乞丐失去了糊鉢，紛紛逃走，各奔前程，而其中逃得最快的，正是那個帝制的原始發動者楊哲子（度），這時他再也不管「袁皇帝」的死活，跑到上海租界去當杜月笙的清客去了。

這八十三日的皇帝夢，爲時雖說短暫，但對中國的影響，却非常重大。

第一：袁世凱爲擴充實力，以便實行其帝制陰謀，分佈其私人於各省。袁氏雖死，而其爪牙未盡肅除，成爲以後北洋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

第二：袁氏爲謀帝制運動速成，甘心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燃起日寇侵華的野心，我們抗戰八年苦果，那都是袁氏一手種下來的禍根。

第三：袁氏玩弄權術，效法曹操的貪殘詭詐，羅致利祿小人，充塞要津，風氣所播，使中國官吏人格破產，以後一般官僚政客，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一切腐化惡化的政風，不能不說是由袁氏所遺留。

第四：西南各省因討袁以後，北洋政府仍未徹底革新，「軍務院」之名義雖除，而精神仍在，爲此後南北分裂的嚆矢。

保國會變了保皇黨

康有爲以組「保皇黨」蜚聲當時，人們的印象，却不知康南海未組保皇黨以前，他曾組織過一個「保國會」的政黨機構，保國會組織，成立時間甚暫，原因是受當時在朝大夫的排擠，在慈禧的政治壓力下，便無疾而終。左舜生編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序保國會的經過云：「保國會發起於戊戌三月，以是月二十七日開第一次會議於粵東會館，後再會議於崧雲草堂，三會於貴州館，到會者二百餘人或

百餘人不等。初御史李盛鐸，本與康有爲同爲此會之發起人，後以江西人洪嘉與康有爲有隙，慫恿湖人孫毓智書駁會，展轉傳聞，一唱百和，於是謗議大興，李恐被禍，亦上疏劾會。繼李而起者，更有御史潘慶綱，禮部尚書許應瑑，而以御史文悌長摺糾劾康有爲謂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計之說爲尤詎而厲，此摺實後來興大獄之張本也。」

所謂大獄之張本，却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運動，構成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楊銳，康廣仁，楊深秀等六君子的被戮，和大臣李端棻等二十人的革職，圈禁，下獄，停差，逮捕家屬，查抄家產，和康有爲、梁啟超的逃亡，實末朝敗亡之先兆。

保國會的成立時間，與興中會不相上下，其組織章程，不若興中會所樹的宗旨鮮明乾脆。全文共三十條，宗旨內容，多屬抽象，修詞疊句，不失爲八股遺風。定名一則云：「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拒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爲保國會。」宗旨一項，佔章程條文九項，空洞無物，不離官樣文章，其內容云：「一，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諭，臥薪嘗胆，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爲保國家之政權土地。四，爲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五，爲保聖教之不失。六，爲講內治變法之宜。七，爲講外交之故。八，爲仰體朝旨，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九，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爲議論宗旨。十，凡來會者，激厲憤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其餘的組織制度及會員入會辦法等，則更薄地，疏於嚴密。在六十年前的

封建社會，康有爲能在當時明白把握羣衆，仰事領袖以欲達成其掌握政權的手段，他實不愧爲搞政治的先知先覺者，但可惜不善運用滲透的方法，却無怪保國會在那時，僅曇花一現耳。

馮國璋——烏龍王

馮國璋夫人周道如女士爲袁世凱做間諜，後來她死在新華宮裡。

她死後，因爲點主，却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時候，夏同龢在公府做秘書，馮國璋的頭腦非常封建，認爲非請個「狀元宰相」（即狀元出身而拜相）來主點，不見風光。但清朝最後一個狀元宰相陸潤庠早在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死去了，那裡還有多一個。那麼，就是找個翰林而拜相的還算將就。翰林拜相的還有好幾個，不過他們都是亡清的「忠貞之士」，怎肯屈身來給民國總統已死的夫人點主？徐世昌就是翰林拜相的人，他又和馮不大要好的。馮國璋退而思其次，只好找個狀元也算足夠架勢了。手邊的狀元有夏同龢、王壽彭、劉春霖三人（都在北京），而夏的科分最早（夏光緒廿四年、王廿九、劉三十），便請夏同龢點主，夏同龢樂得賺一封大利是。

點主時，夏同龢發覺本主上寫的是：「大總統夫人周夫人神主」。他覺得不妥。到底周夫人是屬於那一個大總統的呢？無名無氏，是孫大總統的，還是黎大總統的呢？須知馮大總統不是「天下一人」呀。他對典禮官說了，但因爲那班軍閥都是迷信的，不肯另易本主，烏烏龍龍就算數了。

趙爾巽與東三省新軍

趙爾巽，在清末督撫中，尚不失爲勵精圖治之一員。光緒三十一年，趙任盛京將軍時，鬻匪縱橫爲患，趙乃收撫張作霖馮德麟兩股，因獲粗安。三十三年趙內調爲四川總督。盛京將軍改制爲東三省總督，由徐世昌任首任總督。宣統三年，趙回任東三省總督，見舊軍驕悍，不易統馭，乃銳意訓練新軍，以士官畢業生爲基幹，如饗滿中外之蔣百里，卽當時之訓練總監。所練新軍，概依鎮協編制，其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皆士官出身，陣容壯盛，煥然一新！且不獨配備新，思想亦新。迨辛亥武昌起義，張紹曾調駐灤州，會通電迫清廷立憲，吳祿貞調駐正太線，曾與革命軍通好，藍天蔚則在東北起義，稱爲關東都督，此皆趙爾巽所選拔之嶄新人物也。惜新軍入關後，因調編改隸，漸至星散，而此數人均不獲善終。吳祿貞則於辛亥被人刺殺。張紹曾雖擢升至陸軍總長國務總理，下野後，亦在津被刺殞命，藍天蔚入川後，爲但懋辛所執，憤以手槍自戕。此皆可惋惜事也。

徐世昌被嚇辭總統

五四運動，確是我國現代史上表現民意的最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蓋在五四（民八，五月四日）那

天，在北平爆發了趙家樓事件（曹汝霖私宅在北平東城趙家樓，被示威羣衆焚燬一部分，並把駐日公使章宗祥毆傷。）之後，全國各地相繼發生示威運動，如火如荼，層出不已，輿論一致主張拒簽和約，抵制日貨焚燬日貨事件延蔓全國。中國官吏，從來沒有聽見過民氣這樣激昂澎湃的，不禁害怕起來，紛紛提出辭職。首先，成爲衆矢之的親日份子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先後提出辭職；繼而教育總長傅增湘也引咎辭職。最足令人駭異的，就是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也爲之咨行國會，通電各省，提出辭職！……無怪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也毅然不敢接受政府的訓令，而拒絕簽署和約了！

總統辭職，在世界各國已是罕見的事。民初的軍閥政客們，無不熱中富貴的，當他們爬上了所謂一國元首的總統大位後，自然更是本着清代官場裡遺兩句話：「苟有可留之處，斷無求去之心」來做的，所以無論袁世凱也好，黎元洪也好，馮國璋也好，他們在不如意時，口頭上雖會說着「不幹了」的話，但實際却是想盡方法來懸棧不去的。祇有徐世昌，却當真辭過一次職，那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了！按徐氏提出辭職時，正當五四運動最劇烈的時候，亦即我國輿論力主拒簽和約的時候，大抵他本是主張簽約的，但對全國輿論却有點害怕。於無可奈何之際，遂於這年六月十日，咨行參衆兩院辭職，翌日並通電各省文武長官，說明他經已向國會辭職，叫他們負責保衛地方。他在致國會的咨文上曾有這樣的話：「……此時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惟有重視英美法日各國之意見，毅然全約簽字，以維持我國國際之地位。惟我國內輿論，堅拒簽字，如出一轍。在人民昧於外交情形，固亦在意料之中。而

共和國象，民爲主體，總統以下，同屬公僕。欲徑情指理，既非服從民意之初衷；欲以民意爲牽連，而熱籌利害，又不忍坐視國步之顛覆。此自對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可是，徐氏的咨文送達國會後，却被參衆兩院所退還，因爲根據當時中國的約法係採責任內閣制度，總統是無引咎辭職的規定的。各省也照例紛電挽留。所以徐世昌還是辭職不成，結果祇有國務總理錢能訓暨全體閣員辭職，另由譚心湛代理國務總理，才算了結這件總統辭職的公案。

徐世昌是一個很滑頭，城府甚深，蛇鼠兩端，最善爲自己打算的人物。辛亥以後，袁世凱祇利用他的虛名，不肯假以事權，而他對袁却祇內懷怨恚而不外露。張勳密謀復辟時，他秘密派代表參與進行，到了段祺瑞要起兵打張勳時，他又急急派人私段氏接洽。馮國璋和段祺瑞爭鬥得十分激烈時，他却兩不得罪，結果他就被選舉爲總統。總而言之，他老是以爲手腕高明，富有雄才大略，很好玩弄手段的。所以他這次的正式提出辭職，有人以爲，他並不是擺了烏龍，不曉得責任內閣制度總統是用不着辭職的，祇是故意這樣「整色水一下」，讓參衆兩院來代他聲明：這是不關他的事，好使他安安逸逸來做其大總統而已。這說法也有可能的。但徐世昌是一個胆小的人，清光緒末年，曾派了五個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徐氏當時是其中之一，但被吳樾的炸彈一嚇，徐氏便不敢成行；所以徐氏真的被嚇而辭職亦有可能的。

張勳復辟趣劇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被撲滅後一年，封建餘孽的陰魂未散，又有張勳的復辟醜劇，接膺上演，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污辱而譏笑國際的一頁。

先述張勳這個人。

他是江西奉新縣赤田村人，幼年時家道貧寒，無以為生，在距他家不遠的江際頭村許家充當書僮，主人翁是當時任聯兩江總督的許振偉。他當了幾年書僮，覺得那樣役廝一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靈機一動，假造了一封許振偉的一封信，偷蓋了許的圖章，投効江南大營，長官看見許大人的介紹信，當即准其入營，既而，見他忠勇可靠，更是另眼看待，就憑這一點關係，一帆風順的升上去，後來張勳得了志，許振偉也就只好承認這回事。

其人之愚忠頑固，亦屬可哂，他對滿清是忠貞到底，民國以後，他和他的部隊始終留著一條「尾巴」不肯剪，所以他的部隊被稱為「辮子軍」，他自己也就被人尊稱「張辮帥」。

他職位當到長江巡閱使，衙門設在江北之徐州，官位是「定武上將軍」，他的部隊因之也稱之為「定武軍」，那時他管轄長江流域七省軍政大權，真是顯赫一時，炙手可熱。

他的二弟本來在鄉間偷竊山上松毛皮日的一個小賊，弟以兄貴，此時彬彬然做起大鄉紳來了，大

家當面叫他「二大人」，背後則呼之爲「松毛大人」。

像他這類忠耿頑固的人，對滿清的舊恩，是不會忘記的，他的道德知識，是在個人恩怨裡打圈子，這也用不着稀奇，由於這種秉性，所以他念舊交，重鄉土觀念，凡是江西老表，他就特別關照，如果是奉新小老鄉的人，那簡直視同兄弟子侄一般，只說每年舊曆正月初一，江西同鄉——尤其是奉新人，都還從北京或故鄉趕去徐州向他拜年，除夕那天，津浦鐵路局，例備專車作賀年老表乘坐之用，他在徐州衙門裡一定大擺筵席三天，隆重款待，客人行前，大帥除每人各贈以土產外，更每人送壓歲錢大洋一百元，在當年生活程度低賤的時候，這筆錢就够窮人半歲糧了。

奴才張辦帥

同鄉要向他求事或請求介紹工作者，從沒有拒絕過，單說奉新一縣，常縣知事的一時就有四十七人之多，其他外縣的江西老表，受他提拔更是不少。

赤田村那一個村子，由他整個翻造，每戶送屋一所，古人所謂「一人有福，遮蓋滿屋」的成語，張勳在赤田村，真是名符其實做到了。

北京有名的宣武門外大街的江西會館，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偉大堂皇的西式建築，內面有花園，戲台，自購電流發電，每房陳列新式飯俵，可說是十分豪華，那就是他私人捐修的，南昌府館亦由他購，奉新縣會館在北京有五個之多，東南西北中各方雄峙，江西人在北京的居留問題，真是不成問

題，建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同鄉盡歡顏，辦館是值得江西人懷念的。

對故鄉青年的培植，更是不遺餘力，在家鄉創辦學校，那不用說了，就是在北京讀書的學生，他都給予獎學金，奉新縣在京讀書的子弟，更以各會館空房租出所得之租金，按月攤給作補助費用。

他那矮胖的個子，一副忠實的臉型，配上兩撇鬍子，這印象直到如今還活在四十以上的奉新人的腦海裡。他之所以鬧出「復辟」這一幕，其野心基因於「徐州會議」。

且說自從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的重心就落在段祺瑞的身上，北洋軍事實力，由他掌握。黎元洪的總統，只是個「虛君」，世人稱之為「黎菩薩」，那有力量制服老段呢！故而黎氏只有藉國會以自重。

黎，段二人的政治關係，本來就無淵源；彼此性情不同，黎性和緩寬大，段則狹隘專斷，每每與黎以不滿。

同時，內務總長孫洪伊，為黎所信任，凡事皆與總統密議行之，雖然是府中的決策者，而國務院的秘書兼陸軍部次長徐樹錚，又為段之門人，段一切唯徐意是聽，儼然是總理第二，孫、徐各恃背景，兩不相下，形同水火，造成府院磨擦，以致總統與總理之間，意見益深。

民國六年歐戰正酣，段氏主張對德宣戰，向國會提出議案請求通過，但國會方面，主張從緩宣戰者佔大多數，段案遭擱置，又造成院、會對立之狀。

段氏以爲國會掣肘，實由黎總統的指使，故亦示意段系的督軍們發出通電，謂國會無益於國，徒增紛擾，脅迫總統下令解散，同時，由安徽督軍倪嗣冲電達各省督軍，集議徐州，向張辦帥移樽就教，各省即派出代表赴會，這就是所謂「督軍團」。

這一會議，雖未討論出具體有效的方案，但張辦帥却成爲那時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以扶助滿清爲職志的保皇黨首領康有爲，此時亦來徐州，他以辦帥的效忠清室，同出一氣，於是密議復辟的進行辦法。

既而，黎元洪徇國會之主張，下令免段祺瑞職，段氏即赴天津發出通電。

段氏下野的消息一傳，安徽倪嗣冲首先獨立，奉天張作霖，浙江楊善德，河南趙倜，山東張懷芝，陝西陳樹藩，直隸曹錕，山西閻錫山等相繼響應。

而且，督軍團準備以兵逼京師，民國六年六月二日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以雷震春爲處長，宣言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

黎元洪着了慌，此時北京陷於政治真空狀態，段去後，令伍廷芳爲總理，伍辭不就職，由江朝宗暫代，黎氏想起了北洋老前輩李經羲，他是李鴻章的胞姪，借他的名望，或者可以收拾殘局，故又下令任李爲總理，李對於這一榮位，未曾不怦然心動，怎奈自己毫無實力，不敢冒昧登台，他就向黎元洪建議，請張辦帥入京作調人，以解決時局。黎從其議。

辦帥奉到黎元洪的電召，當施其復辟密計，欣然就道。

他一到天津，故意遲遲其行，表面上是藉絡段祺瑞，對黎氏要求解散國會，方肯晉京。黎從其請，遂於六月十三日發表解散國會的命令。

張見黎氏接納其要求，以爲段祺瑞必衷心感激，一時物物自喜，就在天津英租界松樹里私開軍事會議，與部屬密議一切，會後，帶着不足一團的護衛，坐着路局代備專車由津晉京。

他從天津到北京去，那番盛況還了得，從租界交界處經金剛橋至車站，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駐在中州會館的「督軍團總參謀處」，搭着綵樓，高懸五色國旗，歡迎張大帥入京，歡迎人員都須先期憑公函核准發給之證券，否則一律不准進站，隨行人員，除了新國務總理李經羲外，另有張鎮芳，雷震霖，段芝貴等軍事大員，濟濟衣冠，盛極一時。

北京方面，正陽門京奉鐵路車站早已懸燈結綵，各機關首長或代表先期到達車站，恭候大帥駕車入站，站內的警衛，是他的定武軍先頭衛隊担任，外面是京師警衛部隊担任，一個個持槍佩刀，雁行排列，總有上千的人數。

專車進站後，總統的代表丁鈺芳最先登車晉見，其次是代理國務總理江朝宗，陸軍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警察總監吳炳湘，交通，財政，外交部次長李思浩，高而謙等魚貫登車致敬，到了次長以下，那只能老遠望望辦帥顏色而已！

北京政府如其隆重的迎接，想不到接來的不是調解時局的人物，而是請黎元洪下台，扶廢帝宣統重登龍廷的封建餘孽，這話從何說起！

辦帥下車後，先回其南河沿私邸休息，第二天才由王士珍，李經羲，江朝宗三人陪同入府晉謁總統，會商善後事宜，黎總統少不得設宴款待，第三天他却又頭戴紅頂花翎，身著紗馬褂，入清宮向廢帝宣統請安去了。事隔一天，演出兩朝角色，其滑稽真不可方物。

他在北京城內神出鬼沒的搗弄着，提出什麼實行責任內閣制，另訂憲法，國會改一院制，清室優待條件等等，總統尤交國務院分別辦理，詎不知他另一面却把康有為請晉京了。

孤兒寡婦小朝廷

據說康有為爲了避人耳目，他是化裝成一個鄉下老頭，坐着小車子進北京城的。康在上海早把一切皇朝制誥都擬好，躲在北京宣

武門外西磚胡同法源寺等候動作。

這時，一般滿清遺老，宗室王公，個個樂不可支，但，張辦帥仍不動聲色。六月卅日清廷召集御前會議，那些元老重臣，正彈冠相慶，只有瑾太妃認爲這事不吉利，哭聲說：「康、張這種擺法，會葬送孤兒寡婦這個小朝廷。」可是清室行見日月重光，誰肯聽信婦人言呢！

這天晚上南河沿張公館堂會過後，辦帥才當衆宣佈他要扶宣統重登皇位的話，李經羲，王士珍，江朝宗等面面相覷，一時答不出話來。張勳又說：「你們都受過滿清厚恩，應該竭力贊成，成就此千

古不磨之勳業，今到此地的人，非簽名認可，不許出大門。」大家傾於他的威勢，只好各自簽名。

棺材店出售新貴衣冠

他即時又要江朝宗用電話知照各城門開放，調所部定武軍進城。然後，張勳坐着轎子，由辦子軍雲擁着進入清宮，請宣統御中和殿，由張勳帥爲首和數十個遺老，恭行慶賀，俯伏山呼。再由張拿出康慶人擬好的復位上諭，請宣統御覽，蓋璽頒發，當改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爲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一切官制朝儀，皆復清舊。

七月一日北京城內到處掛着龍旗，老百姓莫名其妙，難道「真命天子」又出來了？可是總統府還是掛着五色旗，黎黃坡却不因張的武力而屈服。

張勳旋派王士珍，江朝宗爲國民代表，梁鼎芬爲清室代表，李慶璋爲張勳代表，到總統府勸黎元洪退位，黎總統當時不作肯定答覆，等代表走後，他深恐發生意外危險，國體有關，當邀日本青木中將入府保護，當時携同侍從人員投入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因爲時候已晚，且無院長簽可，院方不敢收容，乃改往日本使館住下。於是通電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及各省軍政長官，表明心跡。

大約是滿清王還有幾天剩餘的氣數，一般遺老留得幾天未過完的官癮，前門外那些冷落了多年的冠帶舖，願繡舖，一時顧客如雲，把陳年堆積的翎頂補褂，搜售一空，尙書，侍郎，郎中，左丞，右

丞，以及將要外放的巡撫，水陸提督等等新貴，人人衣冠袞袞，一時求過於供，到那裡去搜這數多的古董服裝呢？有些舖子，只好到棺材舖裡去買舊衣，薄帽來應市，這真是二十世紀一大怪現象。

最得意的是張勳，先授內閣議政大臣，又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還內定授爲忠勇親王，並賞賜紫禁城騎馬！

可惜好景太短，七月二日段祺瑞偕梁啟超在津南馬廠誓師，段任討逆軍總司令，將軍段芝貴爲東路司令，直隸督軍曹錕爲西路軍司令，由駐馬廠之第八師李長泰部任主力，分由京漢，京津兩路進迫北京。

七月四日由京津線進攻之主力，當晚進抵楊村，張勳此時大起恐慌，他帶到北京的衛隊，不足一團，只得勉強派出一營兵力去應戰，七月七日兩軍相遇於廊房——津京線，段部以泰山壓卵之勢，猛烈攻擊，辦兵不支敗退，段部繼續節節進逼。

張勳又完蛋了

張勳此時知寡不敵衆，大勢已去，即疏請開去各項差缺，並請清廷降旨，催促徐世昌晉京，建立責任內閣，以爲自己卸責之地步。徐世昌不肯上國書，托病不行，張爲急得走投無路。

十日討逆軍已將辦帥圍困京城，南河沿張公館附近亦發現槍聲，在此情形急迫時，乃由外交團出

面調停，請討逆軍承認張勳爲國事犯，任其逃入使館界，辦兵則繳械。王士珍，江朝宗把這些條件告張勳，勸他令定武軍放下武器，他頑強地說：「我不離兵，兵不離械，我從那裡來，還要從那裡去！」言下之意，仍是想回去徐州，當他的長江巡閱使呢。

討逆軍那裡會聽他這一套，在此情勢下進攻益急，少數的定武軍，實在死傷得差不多了，張勳無法逃出北京，在南河沿寓所捏着腦後那條大辮子沒主意，十二日晚上由外交團開來一部汽車，這才把他接到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托庇，那位講孔子托古改制的康聖人，知道復辟無望了，也就逃入日本使館去了。

七月十三日討逆軍進城，安撫地方，恢復秩序，由段祺瑞再任總理，馮國璋早於六月七日在南京宣佈代理總統，旋即還都。

段祺瑞馬廠誓師，爲其一生最大勳名，實則得來太輕易了。張勳帥只有那不足一團的兵力，要打垮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當定武軍快要完結的時候，滿清若干遺老涕泗交流的問張勳，對於「皇上」和清室如何善後？張憤然說道：「你們個個聰明，只有我是個傻瓜，復辟成功，大家加官晉爵，敗了我一人受罪。好，不用你們乾着急，這事與清廷無關，是我張少軒（張勳別號）一人幹出來的，成功了，皇上老子坐龍廷，現在失敗了，由我一人負責，要殺，要砍都可以，怕甚麼！」的確，張勳這次也優待可以了。而

且，既是要發動如此的大事，只帶那麼少數的部隊，貿然入京，而後方又毫無部署，簡直是等同兒戲一般，這種人不敗，也就豈有此理了！

據伍憲子先生記「丁巳復辟真相」，則說康南海事前曾告張勳：「復辟宜行虛君共和制，政權當歸內閣。」「更不宜恢復大清朝號」。「佈置要嚴密，徐州現有兵力三萬，宜調一萬入京，其餘分扼津浦鐵路，再調馮麟閣一師入關扼京奉鐵路。」如果此事屬實，張勳依計而行，段祺瑞之入京，當然不會如此的順利，不過，復辟總是反潮流，逆人心，失敗是注定的，最多是多苟延一個時間而已。

張勳可以說是一個急功近利的人，曾記得他當年大軍下江南，諭告部屬，祇要兄弟們大家如期攻克南京，准許三天便宜行事，軍法不予干涉。

他自從復辟失敗後，自知一着之錯，恨鑄千古，再也不想出來和一般軍閥混了。隱居在天津英租界松樹里私宅，不怨天，不尤人，不作任何非非之想的過着晚年。對同鄉故舊還是有求必應，他那種魯莽衝動的復辟運動，雖說幼稚可哂，然那是一個無計劃，無城府的人的表現。也可說太相信人，以致這幕醜劇演來也快，敗去也速，牽線的康南海和溥儀同樣是受愚弄的可憐虫。

民國十四年，他活到七十多歲，病逝天津寓所。

民初都督羣象

民國以前的地方軍政民事，由總督巡撫分治。總督掌軍政，巡撫主民事。總督兼治兩省，巡撫管治一省。故廿二行省中，除直隸，四川，甘肅專設總督兼理民事，河南，山東，山西僅置巡撫不設總督，稍有特殊以外，真是涇渭有分，文武有別。

清咸豐同治間，因太平天國之亂，清廷爲權宜事功計，各省巡撫，有節制武職，總督也兼轄民事，無形中造成總督權位，儼如藩屬。同治光緒以後，年年用兵，軍人的跋扈縱橫，實潛機於此。

辛亥革命後，各省響應，擁兵者高樹義旗，黎元洪起於鄂，爲湘北都督，譚延闓爲湖南都督，李烈鈞爲江西都督，尹昌衡爲四川都督，程德全爲江蘇都督，柏文蔚爲安徽都督，朱瑞爲浙江都督，孫道仁爲福建都督，胡漢民爲廣東都督，陸榮廷爲廣西都督，唐繼堯爲貴州都督，蔡鍔爲雲南都督，馮國璋爲直隸都督，張鎮芳爲河南都督，張鳳翔爲陝西都督，閻錫山爲山西都督，趙惟熙爲甘肅都督，楊增新爲新疆都督，趙爾巽爲奉天都督，陳昭常爲吉林都督，宋小濂爲黑龍江都督。陳英士起於上海，申江雖彈丸地亦爲都督。均見於民國元年七月廿日的總統任命。

各省的都督以下，又設省長，一如前朝的巡撫職位。都督以總攬全省軍政，民事，財政大權，而所謂中央者，竟如空心「老倌」，徒具虛名而已。民國以來，內戰頻年，實造因在此。綜上數十員的都

督中，碩果僅存者乃閻錫山一人，餘均作古矣。

民初北洋軍閥笑話

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壟斷了政權，他們頭腦既胡塗，又復任意妄爲，故常把政制官職，弄成糟糕一團，笑話百出。現回顧一下他們當日胡鬧的情形，真是要令人忍俊不住的。試述兩事於下，以博一粲。

民初的副總統，常有兼任地方軍政首長職務的，像黎元洪以副總統兼任湖北督軍，馮國璋以副總統兼任江蘇督軍，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副總統不特兼任地方軍政首長，且又再兼任中央軍事機構首長，甚至又再兼任立法機關首長的，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但是事實確是如此，並非故意杜撰的！話說當民元清室退位唐紹儀組織內閣時，民黨會要求以陸軍總長俾予黃興，但袁世凱認爲這一席非用自己的心腹不可，祇允予黃興以有名無實的參謀總長位置，黃氏不願就任，袁氏爲敷衍各方計，力言以參謀總長一席給予南方，擬請徐紹楨出任此缺，無奈徐氏亦表不幹。袁氏遂以之予黎元洪，黎元洪因此，遂以湖北督軍（駐在武昌）遙領副總統和參謀總長兩職，一方面在武昌成立了「中華民國副總統府」，一方面在北京由參謀次長陳宦代行總長職權。民二，黎氏被逼入京，辭去了湖北督軍，仍以副總統兼任參謀總長，但仍不理參謀部事情。民三，袁世凱改訂新約法，毀了國會，設立所謂「

參政院」代行立法職權，特任黎元洪爲院長。這樣，黎元洪又以副總統兼參謀總長，且兼任參政院長了！副總統的設置，本是準備當總統不能行使職權時由他來代理，地位是很崇高的，如要他兼任地方軍政首長或軍事機構首長，經已是不倫不類了，如再以他兼任立法機構首長，即不啻以最高元首來兼任立法機構首長，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奇怪得很！袁世凱稱帝時，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黎氏便辭去參謀總長和參政院長，袁氏當時擬用調虎離山計來擺佈馮國璋，調他爲參謀總長，馮氏沒有上當，稱病不入京，於是他也像黎元洪一樣，在南京遙領參謀總長。後來黎元洪繼袁氏爲總統時，馮氏又以江蘇督軍遙領副總統。前後如出一轍，真是太巧合了！）

更可笑的是：馮國璋於辛亥革命時，曾由袁世凱調他爲禁衛軍（清皇族內閣時所訓練，初時名義上由載灃統率，實際上由載濤管轄）總統官，這支軍隊的節制權，於是永遠落在馮國璋手上，甚至他做了總統，做了總統而又下了野的時候，也是一樣！爲什麼會這樣呢？其中當然是大有原因的！原來清室當日的禁衛軍，所定軍餉是特別優厚的，普通軍隊每師年餉約一百三十萬左右，禁衛軍却每師二百萬，這支軍隊共有一師一旅，每年軍餉共三百萬，但實際支出的軍餉是和普通相同，故每年多出了一百萬以上，都是入了統帥的腰包裡去的。這支軍隊入了民國後仍歸馮國璋指揮，民二戰寧之役，馮氏率領着它到南京來，名稱仍爲禁衛軍！待遇亦仍舊！直到民國六年，馮國璋繼黎元洪爲總統了，才把它改編爲陸軍第十五（師長劉詢），第十六（師長王廷楨）兩師，軍餉比例照舊，且增加餉銀每

年六十萬元，即共三百六十萬元，且仍由馮氏直接節制，他特地在總統府軍事處設立了糧餉局。到了七年十月，馮氏下野，該兩師名義雖歸陸軍部直轄，但軍餉仍由馮氏轉發，直到了八年十月，陸軍部才下令要撤銷馮氏這種特權。馮國璋聽了，很是生氣，他特地從天津跑到北京，向徐世昌交涉，要爭回該兩師的管轄權，徐氏也聽從了他的話，下令陸軍部：「十五，十六兩師，仍歸馮前總統節制」。總統親自管轄兩師軍隊，固已是奇聞；下了野的總統，仍是這樣，不是奇之又奇嗎！無他，因為每年有百萬以上的外快罷了！

上海兵工廠之沿革

辛亥九月十二（公元一九一一——宣統三年）上海民軍起義，當晚佔領上海製造局，公舉在局提調李鍾鈺（平晉）為滬軍都督民政總長，兼理局務。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北平政府成立，上海製造局直轄陸軍部，李鍾鈺呈報情形：計地一千零二十九畝，廠屋三千零四十二間；槍砲、槍彈、砲彈、鍊鋼、鑄鋼、翻砂、機械七廠，機器三千九百二十部；其他物料、輪船、譯印、圖書、學堂總值銀財產一千四百二十萬兩。時材料儲存尙富，而工資缺乏，由滬軍都督向招商局借銀二十五萬兩，另由李局長用製造局名義向中華、四明兩行先後挪借十四萬兩，以資開工經費。每年能出六米里八口徑步槍二千多支；又七生五管退過山快砲五十尊；各項槍子一千萬發，七生五砲彈鋼壳一萬一千隻；開花彈

二萬發，彈頭引信稱是。具見李鍾鈺任內工作報告，是年冬，部派陳洛書來滬接收，自稱督理，製造局遂爲袁世凱之私人火藥庫。

民國二年，民軍發動二次革命，攻製造局，不克。陳洛書撤任，袁世凱親信鄭汝成爲上海鎮守使，解散製造局各廠工匠一千六百餘名，以陸軍第四十三團所轄之第三營常駐局中。

鄭汝成以製造局設在滬地，易受民軍攻擊，引張之洞在兩江總督任內曾有奏請遷設萍鄉爲由，復呈遷移。袁世凱亦以江南軍火重局，設在華洋交錯之上海爲慮，擬遷北京，而經費計無所出。因調上海市商會籌募出資，以策安全。上海市商會亦視製造局爲禍水，樂於助遷，而經費龐大，終難實現。民國三年，陸軍部復令該局繼續開工，月撥三萬元作爲工料款項，專以造砲爲主，其與砲廠有關之鍊鋼、砲彈、機械三廠，同時開工，並派委員三人，負責督造。而將快槍一廠撥歸湖北兵工廠；槍彈撥歸德州兵工廠製造，先後遷出機器計有一千三百部之多；上海槍廠餘能力，祇能月造手槍百柄，機關槍四尊而已。

民國五年，浙滬護軍使楊善德呈准當軸，將龍華分局改建護軍使署，其他部分開工如故。其明年五月，上海製造局依照北洋政府陸軍部「兵工廠組織條例」，改名爲「上海兵工廠」。

十年齊盧戰事發生，雙方以爭奪兵工廠爲軍事焦點，休戰後，江浙紳商，倡議取消，未幾目的。至民十三年，江浙戰事再起，全廠爲軍隊所盤踞，廠務停頓。十四年春，段祺瑞執政，始徇滬人之

請，發還廠命令，但爲兵事給養，及善後費用，籌措無所出，資令上海市總商會籌墊銀六十八萬八千元，由臨時執政明令批准以全廠地產作爲抵押，許由商會募集民團保護全廠，並將所有廠基契據悉歸總商會保管。

是年二月四日，孫傳芳張宗昌簽約撤兵，總商會副會長方椒伯率領委員王一亭等三十餘人前往接管，時重要機件早被撤除，所備槍壳砲彈亦由浙軍分載鐵蓬兩車，運往南站。來滬奔走調解之陸軍總長吳光新陪同總商會方椒伯等接管人員，巡視一週，當將各廠大門加封上鎖。方椒伯主張駐廠軍隊立即離廠改駐南站，由總商會派葉惠鈞、朱少屏、江政卿在廠內設立「上海總商會接收兵工廠辦事處」。此一軍閥視爲必爭必奪之殘骸，更無一兵一卒盤踞在內。民國十六年，國民軍北伐，由前敵總指揮部派張性白接收，改名「國民革命軍上海兵工廠」重行整訓開工，工作緊張時，每月能出槍子二百八十萬發。至民國廿一年九月卅日始實行宣告結束，派李世瓊爲主任，辦理一切結束事宜。民國廿二年六月，全部結束，滬廠可用之機器全部遷出，併歸金陵。九月，李主任回南京覆命，軍政部擬將廠址及殘餘機件一概出售，所得悉充金陵、漢陽兩兵工廠經費。上海市總商會聞悉，以尙有債務連同本息八十餘萬元未了，當推派代表晉京請願，停止拍賣，其事遂寢。

上海兵工廠自此成爲歷史上之名詞，自江南製造總局創始至上海製造局，而上海兵工廠，前後歷時凡六十八年。

汽車物語

汽車自光緒二十七年，纔到上海，由匈牙利人李時恩運入，計有二輛。工部局因無案可稽，姑照馬車納稅捐照。但馬車章程，第一是禁止速度超前，而汽車無法開慢。據說兩位車主，一個便是猶商哈同，哈同夫人因此天天受罰而飛馳如故。衍聖公初次到上海，看了不識貨，在萬家春番菜館做過一首詩，留下了「汽笛鏗鏘叫鬼車，去來不怕路遙險」的名句。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指南說：（宣統二年版）「汽車向爲醫生乘坐，現在市上漸多」，則最初運到的二輛，其另一輛，當爲醫生所坐，惜已無從查考他的姓名。

宣統末年，工部局始頒發汽車執照，自一號到五百號規定爲自備車，每季納捐規銀十五兩，自五百零一號起六百號止爲營業車，但至民國初年，此項限制即已打破，私人汽車會至千輛以上，營業汽車另發白牌子，自備車執照仍爲黑底白字，俗稱公館牌子。號碼愈小者表現極的汽車資格愈老。第一號汽車周湘雲，更爲滬人所稱羨。周亦以此自豪，招搖過市。第二號爲猶太商沙遜，三號馬立斯，四號哈同，無不望塵興歎，自以爲不及。於是好事者，俱以重金購求最小號碼，以充資格。盛杏蓀諸子爲尤豪，如澤承行四，不但重價買了哈同的四號牌照，並將四四號，四四四號，亦花錢捐到，出入三車，豪華蓋世。蘋承行七，兼置七號，七七號，雙車。杜月笙車照爲「一一一」，人稱四隻七，亦有名於

時。

汽車自濟（燮元）盧（永祥）戰後，江浙寓公，遷居上海與日俱增，以十里洋場爲銷金窩，稍與社會接觸者，大有立錐之地可無，汽車不可不坐之勢。民國十六年，私人汽車增至一萬三千餘輛，至廿六年數復倍之。其時車價至廉，福特一輛，美金六百元，以二元七角兌算，連關稅不過國幣二千元，尙可分期付款，故稍有收入者皆可問津。洋場狎少或其典質赴之，華燈初上時，御車北里，徵逐酒食，不知者方以視少視之。主人開轎飯帳，汽車例得一元，經過趙李，積少成多，且有以此支持日常生活者。日寇陷滬，汽油絕跡，三輪車乃起而代之，汽車入於長眠狀態。勝利復員，重行登記，不過八百餘輛，卅五年冬始增至六千輛，蓋久經兵燹，元氣未復，往昔豪華出入，至今徒步當車，實繁有徒，謠者謂之十一號自備車，謂其剛起步行，如羅馬字11耳。

公共汽車，開駛甚晚。民國十一年，有董杏生者，擬自靜安寺路望喬治飯店，沿愚園路至兆豐公園，行駛能容三十人的公共汽車二輛，繪圖具說，經工部局核准，於是年二月施行，爲上海有公共汽車之始，旋因財力不充倒閉。中國公共汽車公司正式成立於民國十三年，行駛公共租界。法租界由法商電車公司兼營。華界由華商公司專營。敵僞時期，惟法商存有大量蘇拉油，照常行駛，公共租界及華界均告停頓。二層樓公共汽車，民廿四年始出現於公共租界，但如曇花一現，敵僞時期，盡爲日寇盜去，勝利復原，不復見其踪跡矣。

上海郵話

郵票，英國開始貼用，僅是一八四〇年的事，我國始於光緒二年，僅後於英國三十多年。我國郵傳制度，始自周代，有步傳、馬傳兩種，漢代改稱驛遞，沿用二千年不廢。西人開埠以後，各使節和上海西人往來信件，例由總理衙門驛遞，上海方面則由海關附設郵務辦事處。至光緒四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准，先在上海、天津、烟台、牛莊、廣州五處設立郵政局，收寄民間往來各通商口岸信件，其局仍交上海總稅務司赫德管理。是年發行郵票，共分三種：計銀一分（綠色）三分（棕紅色）五分（赭黃色）圖案中用蟠龍，由上海江海關造冊處銅模印刷，這就是世界集郵家所重視的：「海關大龍票」。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總理衙門札行赫德，着就通商口岸，推行郵政辦法。時上海客郵非常猖獗，各國僑民，倚仗着他的特殊勢力，自辦客郵，並不貼用中國郵票。中國人一向本着洋化心理，所以商埠寄信，也是相信客郵，內鄉僻壤則相信私人設辦的航船信局。以是赫德創議，如要郵政辦好，非把郵政獨立不可。因而擬具設局章程，請總理衙門核辦。到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根據赫德所擬章程，開辦國家郵局。上海郵政總局便在這一年成立，仍歸稅務司會同監督管轄，實際並未脫除海關的控制。

其時各國爲了他自己通信的便利，任意設立郵便館行使自己本國郵票的，有英、法、德、俄、日、美、奧、比等國，其截至民國初年尙見存在者有：

英國書信館（北京路博物院路轉角）

德國書信館（福州路六號）

俄國皇家書信館（崑山花園七號）

日本郵便局（東熙華德路一號）

法國書信館（天主堂街六十一號）

美國衙門書信館（黃浦路三十六號）

以上六國開設何時，已難考據。從甲午、庚子直到第一次歐洲大戰發生，中國的積弱，與各國的客郵猖獗，正好作爲一個比例。客郵不但可寄本國，甚至中國航信局可至之地，他們也漸漸可以越俎代庖。一種喧賓奪主，侵害中國權益的行爲，在郵票史上，也曾蒙受過莫大的恥辱。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陰曆十月初六日，是慈禧太后的六十萬壽，中國第一次發行紀念郵票。也是總稅務司赫德的主張，仿西方禮俗，用郵票來紀念國家的慶祝大典。這一組郵票共分九種，自二分起至二錢四分爲止，票面圖案由海關西人繪就，寄往日本承印，也就是中國郵票到外國去印的嚆矢。票面圖案分福、壽、龍、鯉、帆船等吉利圖形，亦即集郵家所稱的：「萬壽郵票」。

自光緒二十二年，郵局正式成立，郵票幣值由銀碼改爲洋碼，郵票仍向日本定印，但在新郵票未到時，暫將「帆船票」和「萬壽票」加蓋暫作銀洋若干字樣，以供使用。據集郵家的意思，這組郵票最感興趣，就是集郵家所重視的「印花郵票」，票上所印銀洋分值，大小至爲不同，其中有「當壹圓」的一種，最爲名貴，郵票大王周美權氏藏有一枚，按其價值，謂非萬萬元以上不易也。

大清郵局正式郵票由日本印成後，於光緒二十三年陰曆元旦正式發行，票面自半分至五元計十二種，採取蟠龍、魚、雁圖案，因爲紙張和印刷的粗劣，翌年改由倫敦華德公司承印，這一組圖案與前並無改變，但花紋極爲精細。其時全國郵局不過三十三處，到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滿清政府的郵傳部成立，專理郵政電報，但經五年，郵政總正式歸郵傳部接管而脫離海關，滿清也就在這一年亡國了。民國元年，南北統一，即將前清郵票加印「中華民國」四字，因爲一部份在倫敦加印，一部份在上海加印的緣故，字體絕不相同。前者爲楷體，後者爲宋體，集郵的專家，一見就能分別。

民國二年發行繪有孫總理像和袁世凱像的郵票，前者名爲「革命紀念郵票」，後者名爲「共和紀念郵票」，兩組郵票均自一分至五元，各十二種。其時全國郵局已有六百餘所，民國三年全國劃分二十一郵區，每區設「郵政管理局」一所，其次「支局」，再次「代理支局」若干所。上海一埠因郵務繁多，獨自成立一區，計有一總局，十七支局。就在這一年，萬國郵會在西班牙開會，各國承認我國正式加入，並派上海管理局爲國際直接交換局，與各國互負郵遞責任。

民國以來，上海郵局發行的郵票種類繁多，作者並非集郵專家，頗難羅舉。但憶民國二年發行郵票圖案計分三種，分票繪帆船一艘，陸上有火車行駛，表示水陸交通之義。角票繪農夫收穫，遠處有先農壇景，表示以農立國之義。元票繪北平國子監牌樓，表示以士教化之義。集郵家總稱曰：「倫敦帆船票」。

民國三年改由北平財政部印刷局印製，圖案和倫敦版全同，集郵家稱爲：「北京帆船票」，以上兩種區別甚微，非專家不能辨析。民國十二年續印一次，稱爲：「新帆船票」。自後，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其郵票之最有價值者，一爲民國廿一年倫敦印的總理像票，因黨徽內國，誤用雙線，復在北平加印改正，此未改正者稱爲：「總理雙圈票」，一種是同年發行的七十二烈士紀念郵票。以後便入於中日戰爭時期，因環境及物質的影響，郵票發行不免紊亂，非有專家，殊難臆述矣。

其由上海郵局發行，並爲集郵家所羨稱者，有：①紀念票八組。計：民十「郵政廿五年紀念票」，民十二「憲法紀念票」，民十八「統一紀念票」和「中山陵國葬紀念票」，民廿一「西北科學考查團紀念」，民廿二「譚院長紀念」，民廿五「新生活紀念票」。②賑捐票：僅有民十九發行的一組三枚。③航空票：有民十八、二十、廿一發行的三組。④臨時暫作票，有帆船票九種，總理像票三種，均爲上海郵局歷年所售出，集郵家多有集藏者。各國客郵在上海猖獗時代，他們亦在本國郵票之上，加蓋「中國」二字，此項郵票後來亦爲集郵家所喜愛，聊備一格，日本蓋的「支那」，美郵加有

「上海」，英郵有加蓋「中國遠征軍」一種，英文簡寫爲C·E·F，尤爲中國國恥紀念之特殊郵票，此郵票發行於一九〇〇年，惜集郵家未有特別注意及之者。

民初改革幣制史

我國用銀向以兩計算，後而兩與元並用，在前時，各省已有官銀錢局之設立，及設廠鑄銀元，鑄銅錢，銀元均以龍爲標識，名曰龍圓，湖北造幣局門首一聯云：「楚國以爲寶，天用典如龍。」是集古句而成，至爲貼切，聞爲張之洞所撰。而各省所鑄銀元，成色不一，至宣統二年正月，清廷頒行幣制則例，大抵爲中國國幣單位，暫以銀爲本位，以一圓爲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爲輔幣，及五分錢幣，二分，一分，五厘一厘，銅幣四種爲輔幣，圓與角均以十進，統一幣值，但各省仍多各自爲政，因亦不少雜色銀元，而甲省銀元，往往不能通用於乙省，而私鑄亦多。

民國三年，熊希齡任國務總理，召集財政會議，提議改革幣制，注意於確定以銀爲本位，銀圓質量，收集雜色銀元，從新改鑄，及防止私鑄，於是梁士詒與梁啓超，同商討改革幣制計劃書，提出會議，決定頒行，惟政變迭起，各方仍各自爲政，此計劃祇付之空談，各省且濫發紙幣，結果又成廢紙，此改革幣制計劃書，書云：

第一、用銀本位之理由言幣制者，自當選定本位爲第一義，本位可供選擇者有四：一曰，金銀複本位，二曰金本位，三曰金匯兌本位，四曰銀本位。複本位之不適用之歐美各國屢試屢挫，鑒被前車，毋庸置議。金本位之美善，衆所共知，然中國現備之金，實不供全國幣財之用，驟諸外國等費太鉅，國中現有之銀，驟難處置，或致釀成金融界非常之變擾，且我們人性好貯藏，所鑄之金幣，得之者常局諸笑筭，市面媒介，動生障礙，以此諸原因，故明知金本位之良，而未敢遽採也，金匯兌制，在資金不富之國爲調平時外匯價計，誠爲妙用，然行之而著效者皆屬殖民地恃母國以爲羽翼，我國情勢迥異，詎易效顰，即曰借一大宗外債，存放外國市場，以致平準，然偏毘於甲國，即對於乙、丙等國，失其權衡，利未形而弊且先觀，故法雖善而行之維艱也，以上三種，既皆不適用，所餘者唯銀本位制而已，以今日世界大勢論，銀本位固非可持久無弊，雖然，複本位猶勝於無本位，今日中國人所大患者。無本位也，與其夢想最良之本位而力未能逮，徒致遷延，何如因勢利導，採一較易行之本位以整齊之，而爲之過渡，此政府所以暫行銀本位之微意也，若夫此過渡期間，則愈短愈妙，政府則雖行銀本位，然常汲汲注意爲改進本位之預備，故國幣法及銀行條例，處處常本此意以立案也。

第二、用文銀四分八厘爲價格單位之理由，近來國中談幣制者，單位重量問題之辯爭，視本位問題爲尤烈，今政府主張用文銀四分八厘、即二十三格林姆、又九七·七九五〇四，即每枚總重量七錢二分。折合九成純銀之量也，所以如此重張者，并非謂衡以學理，非此不可，不過認爲事實上最便利

而已，其一，現在國內用枚數計算貨幣之習慣，沿江沿海一帶，已漸養成，而所用每枚之重量，實以七錢二分爲標準，其指取物價之力，日見普及，驟易他量，徒淆觀聽，致金融擾亂之範圍太大。

其二、歷年官局所鑄銀元，皆用此項重量，其現存於市面者，據財政部最近之調查，已逾二萬萬元之多，政制伊始，最宜設法利用，以充暫行媒介品，以供兌換準備，使新幣未鑄備時，稍得週轉，以此二理由，故認六錢四分八厘爲最適當也，然時流中反對此議者尙不少，甲說謂腹地各省及鄉僻皆用制錢銀兩，不用銀元，今改幣制時，當注意於多數之習慣，不能專以各商埠爲標準，故宜仍以兩爲單位，乙說謂若用七錢二分，而強銅元制錢使比例十進，則物價太昂，與人民生活程度不相應，此二說皆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今以政府所見，則甲說最無辯論之價值，蓋各地所謂銀兩者，其平色本無一定，甲地之習慣，不足以概乙地之習慣，標其一以馭其他，無論用何種重量，而詳細之比價折合，終不能省，（例如：用庫平一兩爲單位一枚之重量，謂可以沿用兩之習慣而省紛擾也，然試問全國各地中用庫平足色之地有幾？一兩之單位雖定，仍不能不將每枚合於江銀若干，合規元若干，合海關兩若干等，詳細折合列表，此自然之數也。）則一兩與七錢二分，其推行時折算之勢頗正相等耳，乙說以經濟之眼光，從貨幣與物價之關係立論，謂單位重論太大，人民生活所需隨之而侈，故議改爲五錢或五錢五分以劑之，此論若爲近理，雖然，人民生活費之侈儉，宜以最低級輔幣爲衡，使輔幣而有千分之一或千分二三級，（即與舊制錢相等者）雖用七錢二分，何嘗不可以獎儉？使輔幣值至百

分之一級而止，（即以銅元爲最低級）雖用五錢五分猶奢侈也，然則調劑之作用，不盡在單位之大小明矣，故政府之意，將銅輔幣多分等級，一分之下尙有五厘一厘之三級——而五厘二厘者，尤趕緊多鑄，庶與舊用制錢之習慣不悖，而民間日用零碎之媒介品，亦可無缺點，或擬據本法第四條之規定，各幣計算，例以十進，而現在市面銅元價格下落十之三，幣制既頒，即尙抬高，使爲十進，物價隨而劇，小民損失極鉅，此誠不可不慮，政府有見於此，故處分舊輔幣之法，以漸而不以驟也。

第三，各輔幣重量成色減輕之理由：前清所擬幣制草案五角輔幣之重量當爲一元金幣之一半，一角者當其十分之一，此尤爲秤量之觀念所束縛，謂必如此，乃足以表其比價也，殊不知貨幣之性質，惟金幣爲實價，而輔幣皆名價，無論何國，其輔幣所含成色之重量，斷不容與主幣同等，成色既異，而重量必比而齊之，斯亦大惑已耳。今政府所以定五角銀幣之總重量爲三錢二分四厘，其成色銀七銅三者，蓋今日雖暫行銀本位，其實不過爲過渡時期萬不得已之辦法，將來終須歸宿於本位，而貨幣改造一次，勞費不貲，故今日改革伊始，當預備將來改金本位時，現鑄之輔幣仍可沿用，若銀輔幣之名價，與其實價相距太近，則銀價暴漲，而輔幣必被銷燬，自然之勢也，今擬使銀輔幣名價對於實價比十分之七，故五角輔幣純銀所含爲二錢二分六厘八毛，附再益以三成之幣，故其總重量爲三錢二分四厘也，其二角一角之輔幣，皆準此推算，凡此皆以省將來改鑄輔幣之勞而已，或疑人民習用秤量，觀此將滋生疑慮，不知幣制能否維持確定爲斷，法價信用既立，則雖以原料價值數錢之紙幣，猶能代表百

元十元之名價，而民尙用之，況輔幣之含有實值者哉？夫輔幣之行使既有限制，且隨時與主幣兌換無阻，民何疑慮之有？或又疑輔幣減輕平色，政府將藉以牟利，不知前清濫鑄輔幣之流弊，現政府正疾首痛心，今方不惜巨款以收回之，豈肯復蹈覆轍？將來所鑄輔幣之數，必斟酌情形，務使供求恰足相濟，此政府所當以自矢也。

第四，主幣准自由鑄造，且收鑄費文厘之理由，凡幣必須許自由鑄造，稍治貨幣學者，皆能明其故，無俟喋述，然各國成例，有收回極輕微之鑄費者，有并此而不收者，今本案擬收方厘，其理由有三：（一）現在市面通行之各種銀元，其市價實在所含純銀之上，據天津造幣廠報告而論，平均每元市價，約合行化銀六錢九分二厘左右，今本位既定爲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約合行化銀六錢八分四厘，與市價相差約八厘，今既欲暫認舊銀元與國幣有同一之效力，非設法平其市價不可，加鑄費六厘，則距離之差甚微，自易爲力。（二）查天津造幣廠現在八八五以至八九成色之北洋銀元，每元鑄費鑄本約加增一分上下，若改制後，按九成更加精鑄，則鑄造成本，須合行化銀六錢九分餘，今若不加鑄費，或所加太微，則鑄造之工，賠累無算，今試以全不收費計之，則每日鑄幣五十九萬，國家應賠累四千兩左右，每月應賠累十二萬兩左右，收舊銀元以改鑄，則每月賠累在四十萬兩左右，所費益不貲矣，造幣爲國家一種義務，原不容許較勞費，然當茲竭蹶之際，苟能省一分賠累，即間接輕人民一分負担，於義固不爲悖也。（三）各國鑄金主幣，其收鑄費最多者，不過千分之二三，揆以本條例所收，

相去似太懸絕，不知金之價值，視銀一四十倍，鑄金加千份之三，實於鑄銀加千份之十，使銀幣而收鑄費太薄，則人民貪其成色之純，喜鑄化以作他用，隨鑄隨熔，稽禁何從，且吾國用生銀習慣，不能立即禁絕，此弊尤大，前此所鑄大清銀幣，成色較高，今漸匿跡市場，皆坐此故，且防於豫，此在歐洲舊用銀國，稍有造幣經驗者，皆能言其故矣，以此三理由，故政府幾經審度，而認鑄銀六釐為最適當，約千份之九，較前法幣制則例千份之十三，已減去千份之四矣。

第五，以前官局所鑄一元銀幣，暫准作國幣之理由，施行條例第二條云：「舊有官局所鑄發之一元銀幣，政府以國幣兌換改鑄之，但於一定期限內，認為一元國幣有同一之價格。」其所以如此規定者，蓋於幣制頒定後，一面趕鑄新幣，一面仍借舊幣以資流通，然後陸續抽換改鑄也，其理由有四：其一，幣制頒定後，必須有貨幣可供授受，然後其制乃能推行，此至淺之理也，中國果須有銀元若干，始足充用乎，今雖未能明言，然以國中現有舊銀元計之，各省前此官局所鑄，約合二萬萬元以上，其各種外國銀元，尚不在內，然各該種銀元市價，尚在各含純銀分量之上，則銀元之供不逮求，已有明證，夫現在以大銀元充交易媒介者，不過數省耳，然有二萬萬元以上，猶苦供給不足，則全國需要之鉅，更可推知，約畧算之，若求全國通用，至少總須有一元銀幣四萬萬元內外，即初辦時，先求各大城鎮商埠兌換流通，亦非有二萬萬元以上不可，以現在全國做幣廠之力計之，若鑄造稍求精美，每日僅能出五十萬元左右，況新製祖模，建造廠基，添置機器，尚須時日，計鑄成新幣一萬萬元，為期當

在一年左右，安得如許餘日，以待從容布置，今將官局所鑄舊幣，認爲國幣，則幣制一額定，國中立即有二萬萬之法幣，以資流通，一而使現有造幣廠分科動工，某廠專鑄主幣，某廠專鑄某種輔幣，一二年內，主輔兩幣，當可鑄成一萬萬元以外，則開辦之始，市面不至乏幣爲病，而推行可望迅速。

其二，無論何國改革幣制，必須藉國家銀行兌換券之力，然欲兌換券之通行，必更使持券者立刻有可兌幣，而無須中水補水之煩難，庶幾民便而信之，而推行之捷，方可期也。若幣制既頒，而市面尙無此幣，則國家銀行，即欲發券，將以何者爲兌換之資，若沿用舊幣之重量，暫認舊幣爲國幣，則所發之券，隨時得以吸收現幣，而所吸得之現幣，一面因陸續抽換改鑄，一面仍可暫充兌換準備，其於推行之迅速，可以事半功倍矣。其三，今用銀爲本位，不過目前不得已之變，要當處處注意，爲將來改金本位之預備，白銀之流入國中者太多，他日必且窮於處置，此最當戒備也，若改革幣制，而絕對不用舊幣，則新幣全額，皆須先求生銀，別爲鼓鑄，生銀之自別處流入者日增，將來改用金本位，益且以銀多爲患，而銀價之驟漲驟落，擾亂世界金融，又無論矣，此我政府不能不暫認舊幣之一原因也。其四，若別爲一元新幣與一元舊幣，異其重量，而不認一元舊幣爲國幣，當初辦時，鑄成之一元新幣甚少，其力不足以支配，則全市面一元舊幣，當然通行，其市價高下不定，且與一元新幣亦生比價，是一元新幣，非惟不能整齊幣制，且以增幣制之紊亂也。若用此法而免流弊，計惟有將所鑄一元新幣貯藏之而不發出，俟數年之後，約算所鑄之數，已足支配市場，然後一舉而發出之，試問如此豈

最辦法，國家鑄備此項鑄本，所損耗若干，而其所釀金融界之擾亂，又將何若者，此不待智者而知其非計矣。照此四大理由，故暫認舊日官局所鑄大銀元爲國幣，實屬正當不易之法，而一元單位不宜輕改舊規，其理亦從可識矣。反對此議者，每認舊鑄銀元爲七錢二分，與新鑄之幣同一價格，將來收回改鑄時，國家必受巨損，不知改鑄新幣，換回舊幣，無論何國家，未有不受損失者，查舊鑄銀元，有純銀九成者，有自八八五以上至八九零者不等，各省銀元，平均預算，將來照六錢四分八成色改鑄，每元成色上必有一分左右之損耗，若以二萬萬元計之，共約損失二百五十萬兩內外，然緣此之故，幣制立得統一，鑄本無須鉅數，國家銀行券，立得通行，則所得已足償所失而有餘矣。夫當改幣制時，欲使市面秩序不亂，舍國家忍受些少損耗外，固無他術也。

第六，舊輔幣暫以市價通用之理由，施行條例第三條規定各種舊幣銀銅輔幣，於一定期限內，各照市價行用，夫舊有之主幣輔幣，同爲當局所鑄，乃彼則認爲國幣，而賦予以法價，此則令照市價通用，辦法兩歧，或以爲怪，不知主幣爲價格之尺度，尺度非立刻統一，無以御凡百之物價，尺度既定，百價皆可依之以爲標準，則舊有輔幣之價，雖暫認爲凡百物價之一種，而於標準之基礎，固不至搖動，故劃一主幣與整理舊輔幣，不妨分期程功也，且政府所以必主張分期辦理者，非畏難而苟安也，爲維持金融市面之秩序計，有不得不然者，試以銅元一項論之，其現在對於大銀一元之市價，約值百三十元內外，若欲整理之，非使立改爲十進不可，然此非純以法律之力所能強制，稍有識者皆知之審

矣，就令國家忍受苦痛，將市面過脹之銅元，尅日收回鑄毀，使此供求相濟，免就十進之系統，然以市面通行最廣之銅元，驟變其價值十之三，試思金融擾亂之程度果何若，而其影響於小民生計又何若者。

故政府之意，將各種輔幣別鑄一套，其重量成色型式，皆使與舊幣殊別，新輔幣之對於主幣，用嚴格的十進法爲法價，而舊輔幣則以舊諸百物之列，不必其與新幣制系統相蒙也，然又非永放任焉而不思整理也，一面用市價收回，一面陸續改鑄，俟收回漸多，其市價至與新輔幣畧有同一之價格時，政府明定期限，全數收回之，則其影響於物價者不甚顯，而民亦相安無事矣。

第七，外國銀元，暫准以市價通用之理由施行，條例第四條：（凡用生銀納鑄者，以庫平純銀六錢五分四厘，折合一元，其他種平色之生銀，折合價格，則爲詳表定之。）此蓋根據國幣法第十二條，由鑄造之規定而益以鑄費六厘也，其外國銀元，既不能認爲國幣，論理自當以生銀同視，查照所含純銀，別定一比價表，使與國幣兌換，此正當辦法也，今所以不用此法者，緣現在市面所通用之外國銀元，其平均市價，實在所含純銀之上，若欲以法律之力驟變此原價，市面金融必生波動，故不若聽其於生銀外，別爲市價，俟國幣推行既廣時，由政府逐漸收買改鑄之，庶幾中外商民，不至損失，而幣制施行之阻力，亦可減也。

第八，施行地域分次第之理由：幣制既頒，本宜全國同時實行，今施行條例第十條，稱其施行之

增填及期日，以教令定之者，其理由有三：第一，我國幅員遼廓，各地習慣不同，而其金融待拯，緩急之情亦別，大埠通商口岸，最感幣制不一，若交通愈不便之地，其所感覺愈微，稱情以施，合分先後。第二，貨幣之鑄造，兌換券之推求，雖兼程以進，亦不能使全國供求適足相抵，懸而久待，窒礙滋多，故不如節節推行，易於支應。第三，各地濫鈔爲幣制梗，收回整理，當行以漸，其中不無數區，應用特別法施行，稍分次第，伸縮乃可裕餘。察此三端，則本條規定之意可見矣，要先將通商口岸實力施行，使匯兌無阻，脈絡通靈，然後以推行於腹地，期以二年遍及全國，則改革幣制之大業，其庶幾矣。

五四以前一頁內閣變遷賬

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八，以往八年中，政府組織，如照民元約法，應爲責任內閣制，顧民初政府承襲清北洋軍閥餘勢，而又益以袁世凱之梟雄，所謂責任內閣，祇有其名。中且經民三年設政事堂，內閣等若贅疣，總統擅領一切，袁氏亦曾與英公使朱爾典言，謂其權能佔全政府百分之八十，內閣僅佔百分之二十而已。由是更可見，所謂責任內閣，無非標榜以愚民，除一次由段祺瑞任總理，有較具體之權力外，餘多仰總統鼻息。矧最可異者，則歷時僅八年，而內閣已迭更，一若晚近法國政局，首相常席不暇暖，卽已下台。以一開國未久之國家，政局亦阻忼如此，更何怪積弱遺侮，迭年遞增，茲

將當時內閣變遷，試爲統計，白頭宮女，閒道前塵，真有往事不忘之感慨耳！計：民元年一月一日，孫文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是爲真正之總統制，各部人選爲：陸軍黃興，海軍黃鍾瑛，外總王寵惠，財總陳錦濤，內總程德全，法總伍廷芳，交總湯壽潛，教總蔡元培，實總張謇。旋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由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繼任，三月十三日發表唐紹儀代理國務總理，二十日繼發表外總陸徵祥，內總趙秉鈞，財總熊希齡，陸總段祺瑞，海總劉冠雄，教總蔡元培，法總王寵惠，工商總陳其美，交總施肇基等，而所謂責任內閣亦在其時開始。惟此短命內閣僅維持至六月二十七日，唐氏奉准辭職，由外總陸徵祥繼任。六月廿九日改任周學熙爲財總，許世英爲法總，范源濂爲教總，陳振先爲農總，朱啓鈴爲交總，餘仍照舊。維持至九月廿二日，陸徵祥亦奉命解職，廿五日明令趙秉鈞繼任，閣員未有若何更易。至翌年（民二）五月一日趙氏辭職，由陸總段祺瑞暫行代理。至七月十六日袁氏曾明令交總朱啓鈴爲總理，惟忽於十九日又取消前令，仍以段祺瑞爲總理，朝令夕改，殆欲對南方實施強硬軍事行動。直至九月四日，段內閣總辭，十一日改任熊希齡爲總理，熊氏自兼財總，段祺瑞回任陸總，此外則內總朱啓鈴，外總孫寶琦，法總梁啟超，海總劉冠雄，工商總及農林總張謇，交總周自齊，教總汪大燮。此屆之內閣，亦即民國史所稱之人才內閣。

及民三年二月十二日熊希齡辭，由外總孫寶琦兼代，閣員稍有變更，周自齊署財政并兼代陸總，朱啓鈴交總，章宗祥法總，嚴修教總至三月十八日，所謂民三約法會議開幕，仰承袁世凱鼻息，改內閣制

爲總統制，於總統府設政事堂，特任徐世昌爲國務卿，外總孫寶琦，內總朱啓鈴，財總周自齊，陸總段祺瑞，海總劉冠雄，教總湯化龍，法總章宗祥，農商總張謇，交總梁敦彥。另設國務卿助手二人：

卽政事堂左右丞，左丞楊士琦，右丞錢能訓。於是政府大權，都集於袁世凱一人手中，所謂責任內閣不復存在矣。至民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又改任陸徵祥兼代國務卿。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宣佈。然在此時期，卽有所謂洪憲怪劇出現。直至民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帝制烟消雲散。然後再復任徐世昌署國務卿職，而以段祺瑞爲參謀總長。翌月二十二日徐世昌辭職，卽改以段祺瑞爲繼。段兼陸總，劉冠雄海總，陸徵祥外總，王揖唐內總，孫寶琦財總，曹汝霖交總，王士珍參總，章宗祥法總，張國淦教總，金邦平署商總。至六月三十日恢復責任內閣制，仍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外總唐紹儀，內總許世英，財總陳錦濤，陸總段祺瑞，海總程璧光，法總張謇，教總孫洪伊，農商總張國淦，交總汪大燮。七月十一日汪大燮辭。許世英調交通，孫洪伊調內務，范源濂任教育。在此時期忽發生所謂府院鬥爭，贊張勳復辟等醜事，一直至民六年七月十五日段祺瑞再度組閣，陸總段自兼，海總劉冠雄，外總汪大燮，內總湯化龍，財總梁敦彥，交總曹汝霖，法總林長民，農商總張國淦等，至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與總統馮國璋不和憤而辭職，十九日任汪大燮兼代總理，王士珍任陸總，李思浩代財總，三十日更正式改任王士珍爲總理，陸徵祥外總，錢能訓內總，王克敏財總，劉冠雄海總，曹汝霖交總，傅增湘教總，田文烈農商總，迨至民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王士珍去職，由內總錢能訓兼代，但爲時僅一月，二月

二十三日即由段祺瑞復任總理，而以陸徵祥爲外總，錢能訓爲內總，段芝貴爲陸總，劉冠雄爲海總，傅增湘爲教總，朱深爲法總，田文烈爲農商總，曹汝霖爲交總兼財總，至十月十日段祺瑞復辭職，以內總錢能訓兼代，迨民八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真除錢能訓總理仍兼內總，陸徵祥，劉冠雄，朱深，傅增湘均仍其舊，另以靳 履爲陸總，曹汝霖爲交總，及補蔣心湛爲財長，舊瓶新酒，新湯舊藥，雖更迭之頻繁，問進步於何有？迨巴黎和會於五月證實失敗，國內亦掀起五四怒潮。六月十三日錢能訓不敢戀留，呈准辭職，另以蔣心湛兼代總理職務，即訓令和會我國代表團簽字，然代表團中人以民氣方張，清議可畏，未敢奉命，而於此又可見彼爲國務總理者眞若沐猴，徒尸高位，毫無建國辦法。迭迭恥痕，點點血淚，實都由彼據要津者無能所造成。矧上列內閣更迭情況，雖僅八年，而變遷幾二十次，中樞既難安定，遑能更言其他？

日本廿一條痛史

民三年秋，奧太子被刺，戰雲彌遍整個歐洲，野心者乘時混水摸魚，狡然思逞。日夷地鄰我國，中東戰役而後，即時欲作進一步想。然仍以列強環伺，均勢形成，不能無所顧忌。歐戰既起，列強無暇東顧，日本遂認爲千載一時，有機可乘矣。十一月初，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國，與外長加藤高明密商。決定向我提所謂二十一條要求。旋於十二月十五日回抵北京，畧事振奮，即於翌年正月十八

目不循外交途徑，直趨總統府，面見袁世凱總統提出此項無理公文，聲勢咄咄，已無復有所謂外交上禮儀。袁氏時方帝皇夢酣，而又有事於南方革命黨。弱點早爲日人把握。故日置益於面見袁氏時，即會揭出此意，謂「日本朝野頗多與中國國民黨聯絡，如中國政府能予以友誼之事實表現，則日政府自可轉而爲中國政府之助，消滅此項幫助中國國民黨革命之行爲。」其言娓娓，其勢咄咄，真所謂極盡威迫利誘能事。然袁氏固亦梟雄，生平歷史，與日人最不調協。自接日置益交來之條件，即在原文上以朱筆批註，指出日人種種野心，如云「是直以亡國視我。」又云：「真是握我咽喉，置我死命。」凡所指出，都覺條理分明，見地清徹。且以日人不循外交途徑，逕入公府遞文，無非企圖秘密交易，求償所欲，因示意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貽以其事洩諸泰晤士報駐京記者端納。使此巨大新聞，立刻傳揚國際。外交圈中人如英公使朱爾典都爲震駭，表示關心。而日人利用秘密以償大慾之願望，亦完全粉碎。後此日人雖亦能藉其強橫壓力，迫我屈服，然猙獰面目，業爲世人認識，且可激起我民衆誓死反對。中日關係，長在不良狀況中，是日人之計劃，無疑亦遭受失敗耳！

先是，袁世凱既得廿一條件，即召集政府要員集議拒絕辦法，時陸徵祥從瑞士歸國，袁即命陸氏與外長孫寶琦，外次曹汝霖，交長梁士貽協議應付。孫氏爲親日派，當發言謂：「日人未先至外交部遞送要求條件，竟見總統，直接遞送，其蔑視我國，可謂至極。然我國爲弱國，歐戰又正沉酣，無可爲助。所謂談判應付，實已毫無機會。故彼主張宜先接受條件，俾能渡過危機云云。」孫與曹均受日

人孕育，其言如此，殆亦一貫奴性使然。惟梁士貽極反對其言，謂：「不談判，即接受，外交實無此例，無論如何，應先與開會討論，結果如何，隨後再言可矣。」陸徵祥亦贊同其言。於是四人之會，乃分爲兩派。一主接受，一主談判。糊塗至此，誠屬可笑。至翌日，孫寶琦以集商結果上達袁氏。袁氏雖私慾薰心，顧亦頗明外交大體，即決定採用談判辦法，并以陸徵祥主持其事。孫寶琦以袁氏意決，亦上辭呈，由袁改任陸徵祥爲外長。惟日人竟復以我國在彼遞送要求書後即易外長，顯無誠意爲詞，向我提出異議，強橫無理，一若我爲附庸國。幸袁氏應付敏捷，謂變更外長正爲誠意表示，日置益始無言，並於次日訪陸外長談商開會辦法，決定即由翌日始，每日下午二時開會。

二月二日下午三時，所謂第一次會議即在外交部展開。我國列席者爲外總陸徵祥，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日方列席者則爲日使日置益，參贊小幡西吉，高尾亨。日方政策爲速戰速決，免夜長夢多，滋生國際間之枝節。而我國則欲竭力拖延，以尋求會外轉機。故在第一次會議中，即舌劍唇槍，專在談判之遲速問題加以討論。陸徵祥久在外交界，不屈不撓，日使亦無術先佔便宜。第一次會議後，我國即派日人有賀長雄回日游說日元老，并儘量供給消息與輿論界，企望掀起國際間之不滿情緒，及使持重之日元老有所轉圜。陸氏更在條約中咬文嚼字，務使拖延時間。至二月五日第二次會議時，陸氏對廿一條件表示意見，謂第一二號可以討論，第三四五號無法談判。二月九日第三次會議，日使更加催促，陸氏則提出第一二三四號之修正案，第五號則認爲困難商量。惟日方聲勢洶洶，未滿

所欲，決不罷手，日使竟於三月八日訪曹汝霖，加以恫嚇，謂如數日內無滿意答覆，將有不測之事，及四月二十六日，日使更提出所謂最後修正案，復增兵於山東，奉天等地，又加派軍艦游弋於渤海沿岸，關東戒嚴，日僑回國，情況嚴重，一若戰爭立起。我國遷延至五月一日，不得已亦提出最後修正案，然日虜箭在弦上，不肯罷手，卒於五月七日向我遞送最後通牒。內有云：「……中國政府應諒帝國政府之誼……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應諾，帝國政府茲再重行勸告，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為止，爲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行認爲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等語。至此，所謂談判已瀕決裂矣。冉冉戰雲，一觸即發，政府中人固無作戰勇氣，而英公使朱爾典復以良友姿態訪問陸徵祥，謂目前情況，至爲危險。國際間又因歐戰關係無法東顧，爲中國計，祇有忍辱接受，避免危機，以期十年教養，經武整軍，再與日本週旋，始爲上策，朱爾典復表明與袁世凱有卅年交誼，而其本人在中國亦有四十年歷史，不欲坐視良友危亡云云，言似由衷，理由亦娓娓可聽。五月八日袁世凱亦即在公府中召集最重要會議，當時出席者，除袁氏外，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政務堂左丞楊士琦，右丞錢能訓，參總王士珍，外總陸徵祥，陸總段祺瑞，海總劉冠雄，財總周自齊，內總朱啓鈴，教總湯化龍，交總梁敦彥，法總章宗祥，農商張謇，外交曹汝霖，參政李盛鐸，秘書長梁士貽均在座，情形慘惻，悲憤填滿每一人心頭，袁世凱亦對衆沈痛而言：「我國力未足，難與言戰，不得已接受要求，經此大難後，各人務宜以

此爲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胆之精神，做發奮有爲之事業，確定計劃，力求刷新，羣策羣力，務達目的……本人負國民付託，決不爲亡國之民，國之興，諸君有責，國之亡，諸君亦有責」云云，其言亦頗沉痛，其後更以密諭告誠京外文武百官，有「唯知亡，庶可不亡」之語，一若所以接受恥辱條件，真爲萬不得已也者，然當時外交人員雖會竭盡能力，交涉達六月有餘，正式會議亦達二十五次，顧因外交方式仍太呆板，又不知利用民衆外交力量，徒閉戶做事，祇逞口舌，以此而欲制勝以強兵堅甲以臨我之野心者，其失敗也又豈待言？於是五月九日十一時乃作最恥辱之承諾，使五七，五九，之日歷上烙上無限恥痕。

五四與巴黎和會

民國四年，北洋野心者袁世凱酣迷於皇帝虛榮，又矯於日人強盛兵力，卒承認奇恥大辱之廿一條件。幸袁酋帝制幻夢，纔祇一瞬，而我國且又參加歐戰。一般心理，都以爲我既僑爲盟邦一員，戰勝之後，德國在山東權益，在情在理，均應歸還我國。而所謂廿一條款之第一號要求，固爲在山東德國權益由日本繼承。是則撤銷之辦法，如在和會中尋求，或可事半功倍。因遂忍辱偷安，等待此未來之一線希望。

民國八年一月十八日，所謂和會已正式開幕於巴黎凡爾賽宮，我國首席代表爲外長陸徵祥氏，餘

四代表則爲王正廷，顧維鈞，魏宸祖，陸氏首途赴法時曾先經日本，欲一窺日本政情，顧日曾亦敏捷，竟準備盛大歡迎。日皇且備於茶會中親授勳章。蓋彼國政治人物，容以我國官僚，但得顏色，即可供予揮使。惟陸徵祥竟因病辭謝盛會，使彼曾籠絡手腕，無從實施。然日皇仍派御醫，爲陸氏診視，其積心處慮，固可想也。

陸氏既至巴黎，初欲先謀在大會中爭回山東權利，然後徐圖取消二十一條款。步驟計劃原亦不錯。然日曾外交更爲敏捷，未待中國踏上此種外交途徑，即先與美國締立所謂石井，藍辛協定，取得美國承認日本於中國有特殊利益；同時更與英、法、義等國成立所謂五國諒解，保證日本在和會中可接收德國在山東權利。一若佈下地網天羅，不讓吾人稍有申訴機會。故於正月二十七日之集會，竟先通知我首席代表避席，祇許顧王兩使列席觀察。而在會中，日本確曾提出關於膠濟鐵路及其他利益應無條件讓予日本，交還中國一層，則隻字不提。可知所謂和會，早在所謂大國之互相勾結情勢中決定一切，我國申訴，徒浪費氣力而已。然我國人士對此重要關頭，并未放鬆。除政府派出之代表團外，如梁啟超率領之戰後歐洲考察團，團員有張君勳，蔣方震，徐新六，丁文江，劉崇傑等。及汪精衛組織之和平促進會，集合法國留學生如王世杰，李書華，鄭毓琇等。均會在會外多所活動。中國代表團更於二月十五日準備山東問題說帖送交大會。二月二十五日顧維鈞謁見美總統，四月八日陸徵祥謁見義首相，解釋情形，企求獲得幫助。旋更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說帖致送大會提請主持公道。

五月三日我代表團即以惡劣情況報告北京，請示機宜，此比廿一條款更使人可恥可怖之惡耗傳出後，熱血騰沸之青年學子，遂爆發震燦天地之五四運動，毆打佞臣，發揚正氣，一方面作奮然醒覺之怒號，另方面更爲代表團作支持。而代表團中人以民氣之沸揚，深爲感動。故陸徵祥於五月十四日會電徐世昌總統，請示簽字問題，有云：「國人之目前清議可畏，將來之公論尤可畏；究竟應否簽字？倘簽約時，保留一層亦難如願，則是否決計不簽？時間日迫，關係至鉅。見聞所及，合再瀝陳。」等語，可見五四運動之發生，完全與巴黎和會之失敗有關。

二十八日午後三時，二十七國代表集於凡爾賽宮之明院殿共同簽約，惟我國代表則拒絕不到。事雖可哀，然亦足表示我國之堅強民意矣。是日我首席代表陸徵祥更與顧，王，魏等聯名政府，畧謂：「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云云亦完全被拒，此事於我國領土完整，及前途安危，關係至鉅。詳等所以始終未敢放鬆者，因欲使此問題留一生機，亦免使所提他項希望條件，生不良影響。豈料大會專橫至此，竟不稍顧我國國家纖微體面，曷勝憤慨……」。由是更可知強國心理，狠毒如何？而一般弱國，苟欲在強國之分贓宰割面前，企求獲得矜憐，稍沾公道，其事亦等如水月鏡花，永遠無法捉摸。巴黎和會之註定失敗，固亦有極多由於北洋政府之糊塗政治，斷送國權。但同時強國之互相勾結，分贓宰割，更爲重大原因。然巴黎

和會已矣，巴黎和會造成之惡果，亦由於彼輩殘酷之政治家及身嘗試，并且貽害子孫，貽害國人。第二次大戰之更殘酷犧牲，何嘗非由於彼輩自私強國自掘墳墓？

軍閥時代的嫖賭

武人好賭，在民國七八年的一時期，稱之爲軍閥時代，賭風頗盛。其實不僅是軍閥好賭，即那班文官，亦以賭爲生。因賭而生活不定，今日腰纏百萬，明日可以囊無一文，又越數日，則依然是面團團作富翁了。於是作奸犯科，蕩檢越閑，亦由是而發生。

賭有賭品，賭品有佳者，亦有劣者。賭品之佳老，亦不過無事喧嘩，鎮靜如常而已。當時的文官中，據說：王克敏最鎮定，雖輸至數十萬，而口中所啣的雪茄烟，烟灰長至寸餘而不墜。若張岱杉郎差一級了，若輸在二十萬以內，洋洋如平時，若至三十萬，就要頻頻的皺眉頭了。但他們文官，賭輸了有辦法，他們常駐京內，可以劃賬，也許今日雖輸，明日便贏回來了。而那些武人都是外官，如各省督軍之類，留京不過拾天八天，輸了就是「直脚輸」了。

試以賭品而言，這些武人，贏了就是大笑大樂，輸了便是使性罵人。有的贏了笑納，輸了掛賬。有一次，張作霖攤牌九，拿到了一張長二，一張二四，那個副官，給他撤沒了長二下面的一點，喊了一聲：「至尊！統治！」便把台面上的籌碼，擡回來了。張勳有一次也來賭了，他命馬弁們，先擡了

幾個「釘包」進來（大概每一釘包是現銀一千元），說：「這是咱們大帥的賭本。」試問誰贏了，拿了他的釘包回去呢？他們每賭局必召妓女，張宗昌最愚劣，輸急了，便拉了一個雛妓去「開苞」，他們有這個迷信，事後，贏了，便賞給她們一二千塊錢，不算稀奇，不過有的督軍，本來進京向財政部領餉的，也被他們勾引入了賭局，將餉銀全部輸光，欲歸不得。有的故意輸錢給大軍閥，一面串通他的副官，爲了說項，說：「某人輸得很慘，給他一個差使，調劑他一下吧」。

大家玩得高興了，什麼問題都好解決，大而至於國家大事，政治上的陰謀鬥爭，無不可相商，此外，賣官鬻爵呀，苞苴投呀，都可在這個時候成交。因此，娼妓成了狡黠者利用爲勾結官府的橋樑。這裡是新聞記者的消息供給站，也是國際間諜的情報搜集所。那些腐化的軍閥官僚們，從來就不知道政治上還有「保密」這個名辭，說起來真令人可哂可恨！

比如「狗肉將軍」張宗昌，就是首屈一指的濶票客，他在審子裡是出盡了風頭，凡是一個妓女見到他的面，他就賞給五拾，一百元的盤子錢，滿不在乎，這樣一次的開銷，豈止「窮人半載糧」，恐怕一連至一營的官兵關一次餉都綽有餘裕了。

假如他看中了某一個妓女，就會脫口而出的說：「給咱作姨太太吧」。得了，這妓女就可以另租房子，掛起張公館的牌子來，按月回軍需處領開支。可是張宗昌自己早已忘了這回事，又玩別的妓女去了，所以張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錢有多少，軍隊有多少，老婆有多少」之稱號！

張宗昌不過是一個例，軍閥官僚們的生活糜爛，彼此都是差不多的。

民國十六年正是張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帥的時候，北京憲兵司令王瑞和另外幾個大官員們在石頭胡同的時花館妓院裡打牌，查署子的大令——即稽查官兵所持的「××司令部或××督察處」那塊長布招——來了，當時副官馬弁們都跪開了，所以沒有人上來打招呼，這些稽查老爺們，拿着一枝「大令」，往屋子裡直衝，走進王司令那個房子，大官們看見當然不加睬理。可是稽查不懂風色，還是問他們這幾個人的姓甚，名誰？幹甚麼的？在座的又好笑又好氣，可是又故意不理。稽查還不識相，再問：「你們這些人連話都不會講嗎？」在座的還是一心打牌，這樣一來，帶隊官便發了火，罵道：「××你奶奶的，難道你們都是啞吧！」當時四圍坐的全是陪侍的妓女，這一下不是大掃司令官的臉子嗎！這樣目無長官那還了得，王司令也忍不住了，拔出手槍對着那個帶隊的稽查，「拍」的一聲就打死了，其餘的稽查兵正要動手，王司令的副官衛士們一齊趕到，一陣亂槍，把這個「時花館」打得鬼哭神號。王瑞在這時間馬上搖個電話到司令部，調了一營人趕來，把八大胡同團團包圍，將所有在胡同裡執行職務的稽查官兵一一拘捕起來。

張宗昌求雨法

以前久旱不雨，惟有所雨之一法，或設壇誦經，或向龍王廟禱告，靈不靈，固無人敢言，但農民

必如是做，倘官吏不爲人民求雨，將必碍及收成，從知中國人實靠天吃飯也。

張宗昌督魯時，適逢天旱，人民籲請求雨，張素不信此，然不能不奉行故事，因命於龍王廟設壇念經，彼將親往禱告，民間聞之，皆大欣喜。屆期，張果至龍王廟，但既不拈香，亦不禱告，直奔龍王座前，手批神像之頰，厲聲罵曰：「×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呀！」罵畢，登車逕去。觀者皆爲駭汗，不敢作聲。越日，晴空一碧，仍無雨意。張遂命砲兵圍於濟南千佛山列過山砲十九尊，實彈向天空轟擊，其意無非洩憤而已，結果竟收奇效，傾盆大雨，霽然而降。當時報紙謂爲「未之前聞」求雨術。

徐樹錚之大膽

徐樹錚才識寬宏有胆量。民國六年奉軍入關，張作霖任總司令，樹錚任副司令，原屬合作，後因事齟齬，樹錚竟欲以殺陸建章之策而殺作霖，白之段祺瑞，段力斥其非。一日作霖至國河謁段，樹錚適在座，段恐樹錚妄爲，於作霖去時，親送至門外，而以右手於背後頻頻搖擺，以示「不可」，始未致肇禍。時作霖勢傾朝野，無人敢想其鋒，樹錚獨欲殺之，胆可謂巨矣！此一事也。

民國九年夏直皖戰爭發生後，曹（錕）吳（佩孚）咸欲得樹錚而甘心。及皖系兵敗，直軍逼近都城，是晨樹錚猶衣白夏布長衫，乘敞篷汽車，出宣武門至其主持之殖邊銀行，提取現款，轉赴琉璃廠

書書店，償還欠賬。時都中均知皖軍已敗，直軍驟將入城，店主見樹錚猶從容若無其事，頗爲躊躇！頻謂：「此小事，何勞督辦大駕。」樹錚笑謂：「此刻不來還，將成倒賬矣。」迨其由琉璃廠轉至東交民巷時，直軍已躡其後矣。其胆大如此，此又一事也。

迄民國十四年冬，樹錚在廊房遇害，亦實其胆大之過。蓋是日段祺瑞及都中友人，以馮玉祥駐兵廊坊，恐遭暗算，均勸其化裝乘小汽車赴津，樹錚不聽，猶掛軍車，張揚其行，卒至殞身。

黎元洪和總統印

中國人，也許因爲幾千年來都在帝皇統治底下，深信帝皇的玉璽真的就是傳國之寶，得了它便是「受命於天」，既保有之後就不應輕易授人的。這種怪有趣的觀念，到了民國初年仍然存在。民國當然沒有皇帝和玉璽了，但有些人還認爲大總統的印信也具有和玉璽的作用一般，以爲誰保有了這個總統的印信誰便是合法的元首，得不到它的，縱使事實上已登了台，也不能算是合法的，因此之故，民國初年，曾經發生了兩次總統於被逼下台時挾帶印信出走，弄到向外國領事提出交涉的怪劇，相信可能是由這個觀念而產生的。

第一次怪劇發生於民國六年。當張勳上演復辟醜劇時，大總統黎元洪，連忙躲進了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裡去，通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馮國璋很快就在南京就任了代理總統職，馮氏當

時以副總統兼任江蘇督軍），但過不了幾天，復辟醜劇便閉幕了，黎的政敵段祺瑞復入北京，黎氏祇好通電下野。可是總統的印信當事變發生時，已由丁槐偷偷的帶了到上海去。馮國璋知道後，派員到上海向丁討印，丁却不肯交出，因他認為黎氏的下野電可能是別人偽造的，聲言：「除了有黎總統的親筆信，我不能隨便交予任何人。」當時上海報載有人擬實行用武力來奪取印信，嚇得丁氏不敢出旅店一步。那時中國官方是不能在上海租界捕人的，所以馮國璋於沒法可想之餘，祇可命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向上海領事團交涉，由捕房把丁氏和印信都帶到會審公廨來，這樣，才了結這場追討總統印信的怪劇。

第二次發生於民國十二年，時候是曹錕賄選的前夕。距離第一次剛巧將近六個年頭矣，當時被迫下台的總統也是黎元洪。原來當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曹錕與佩孚於逼走徐世昌後，再度擡了黎元洪登台，但為時還不够一年，曹錕想自己來過大總統的癮，便授意王懷慶，馮玉祥，薛之珩，來迫黎元洪下野。他們一面向黎氏索軍餉，令警察則藉口索餉無着全體罷崗；一面收買流氓乞丐來組織公民團，手執驅黎的旗幟，包圍黎氏的私宅，甚至把黎宅的電話和自來水管都截斷。結果，黎氏自然不能不走。黎氏這次在出走前，也像前次一樣，將所有總統的大小印信，統統交給他的部屬，叫他們帶往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收藏起來。當曹錕的爪牙發覺黎氏已登火車出京時，即往總統府接收，發覺所有印信不在，便立即發電至天津，令直隸（即河北省）省長王承斌截留黎氏。王氏便帶同軍警，等候黎

氏車到，登車向他追查總統印信下落。黎初不以實告，王氏百端威嚇，不許黎氏出車站，足足把黎氏軟禁在車上度過了一夜。待黎氏告以實情，得到北京方面的電話回覆已將印信索得，然後才把他放行。所以這一幕怪劇有人稱之爲「劫車索印」。

這兩齣怪劇的主角都是黎元洪，可見這位由海軍出身的總統，不僅對軍艦有特殊愛好（武昌革命之役初期，海軍未反正，黎氏曾命民軍的砲隊勿轟擊各軍艦。）並且對總統的印信愛好尤甚。然而，貴爲大總統，竟爲了區區的印信，致令在火車上吃了一夜苦頭，也是民國的趣話。

漢口華景街慘案

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自爲時，漢口革命黨人，曾發動一次討袁運動，因一夕之間，即告失敗，故迄今已被世人遺忘矣。按是役主持人爲鄂人聶豫（晴暉），亦即辛亥起義人之一。先是聶寧戰役後，武昌曾有改進團發生，其目的亦爲反袁，因起事未果，官廳搜捕甚急，黨人多逃匿漢口日租界。至民五，匿租界黨人，多食不能自存，乃由聶豫向日人購手榴彈手槍一批，於是年夏某夕，分給黨人二百餘名，由日租界整隊向華景街突擊，其意以爲佔領漢口，即可控制武昌矣，顧華景街前馬路，半屬華界，半爲租界，黨人槍聲既響，華景街多處起火，租界巡捕海軍，均於各街口架槍防堵。漢口鎮守使杜錫鈞，警察廳長周際雲聞報，立派大隊軍警，由大智門沿鐵路向華景街後包圍。黨人處此形勢，

前有洋兵，後有軍警，實屬進退維谷。故當場被擊斃者，不下百人，被捕獲者，亦數十人。聶豫由日人保護，登日輪逃滬，所捕數十人均於事後一二日內，由周際芸在後城馬路槍斃，其中有市民被誤拘者，亦一律處死，此實革命史上一大慘案！

國內戰的一頁

從民國肇造以後，給國人帶來的並不是共和之福，而是兵連禍結的軍閥混亂局面，這一筆歷史爛賬，却是袁世凱一手寫成的，所以歷史家對袁世凱的蓋棺定論，判決他是危害民國的罪魁，固不限於「帝制自爲」之一端而已。

論到北洋軍閥的形成，就必須溯源於李鴻章的「天津建軍」。

原來李鴻章和曾、左、胡、彭幾個之能打垮太平天國，是全仗着他們那塊「衛護聖道」的牌子。但這塊牌子對付洪楊「妖教」是可以的，要想抵拒外來帝國主義的犀利武器，那就失效了。可憐這幾位「清室納臣」，想來想去，只好「師夷法以制夷」，儘管夷人的「奇技淫巧」，有乖聖道，然而事到其間，不跟着夷人的路子跑是不行了。這就是他們所唱的「堅甲利兵」主義。

他們一面仿照西法造艦，製槍砲，一面改革練兵方法，設武備學堂，水師學堂，建立新軍，把中國以往軍神武聖們定下來的「一字長蛇」、「陰陽八卦」等等陣法拋棄了，而代之以「洋操」，這在

中國兵學思想上劃分了一個時代。

北洋軍閥，就是這一時代的產兒。

因爲光緒十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武備學堂，採用新式教練，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北洋軍閥首領，就是這學堂的畢業生。

甲午中日戰爭，清廷失敗，袁世凱奉旨在津南小站市建新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小站練兵」。

當時袁世凱所用的軍官，都是武備的學生，這枝軍隊，就成爲了袁世凱以後窃國的武裝資本，亦即是此後北洋軍閥的勢力基礎。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也就充當袁氏門下的「龍」、「虎」、「狗」三傑了。

袁世凱死去以後，馮國璋和段祺瑞各擁一部份實力，形成直、皖兩系；既而，關外崛起張作霖，也成爲直系首領，北方遂成鼎立而三的局面。直系的實力是曹錕、吳佩孚掌握着。其後，又由直系中叛變出一個「國系」，即恭賀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這四個勢力，好比北洋政治球台上的四個彈子，在那裡互相撞擊。

當然，民國以後的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也不純然只屬於四系的盤觸之爭，各省的地方軍閥，彼此爭權奪利，武力角逐，也應該歸於軍閥混戰的同一範疇的。如四川的各防區司令，福建的民軍司令們，以及貴州、雲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受北方軍閥勾結所導發的分裂與爭奪等，戰火連綿，

涉及廣泛，此處畧而不談。

現在我要敘述的是「直皖之戰」，「直系與湘川之戰」，「直奉之戰」，「反直之戰」等四次大曠仗。「春秋無義戰」，這正是春秋歷史的重演。

民國九年的 「直皖之戰」

這一場戰爭爆發的原因很多，遠因是民國六年廣東成立「護法政府」以後，照「北政府內閣總理」段祺瑞的主張，是要與護法政府訴諸武力的。但北政府總統馮國璋不同意，他對南方一向是主張和平解決，兩人意見背道而馳，擅裂痕自然要爆出血火來的。及段祺瑞下野，王士珍組閣，段的智囊徐樹錚却引奉軍入關以壯聲勢，於是段對南方主戰的論調，又抬頭了，這益發刺激直系，加之民國七年春天，直系的曹錕和皖系的張敬堯同時率兵南下，畧取湖南，曹的大將吳佩孚把長沙，岳州攻下來，而湖南督軍却發表為張敬堯，直系更為不滿。

民國七年夏，徐世昌當選總統，段再度組閣，徐氏對南方的態度與馮國璋相同，段祺瑞是時組「安福俱樂部」，成立新國會，與南方抵抗，且以此要挾徐世昌，直皖兩系勢成水火了。

而觸發這場戰爭的直接原因，則是民國八年我國在巴黎和會外交戰上的失敗，以及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議又告決裂，舉國上下，對段祺瑞發出責難之聲。次年在湖南的吳佩孚藉此引兵北還，屯兵鄭州，顯然有對皖系不利之意。

當時吳佩孚發出的撤防通電說：「遠戍湘南，瓜期兩屆，三戰換防，不可謂速，閱給煎豆，何敢

言功？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無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這些話，即是針對段氏的主戰論調而發。記得他那首「回防途次」的長詩，內中有這樣的句子：「……軍中名將老，江上昔人非，建樹須及時，動靜宜見機……止戈以爲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復同仇，歸顧莫相違。」是其與安福系之對立，情見乎詞了。同時因爲直系的兵力從湖南調開，使南方革命勢力進入湖南，譚延闓乘機驅逐張敬堯，段祺瑞因之對直系用兵，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曹錕又聯絡奉系張作霖，通電宣佈安福系禍國，要求北京政府解散「安福系」，並罷免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及邊防軍總司令等職務，火上加油，一切積怨新仇，一齊爆發，由是直皖戰爭的序幕揭開，其時爲民國九年七月。直系方面以吳佩孚爲總司令，下分爲三路，東路總指揮曹瑛，西路總指揮王承斌，中路總指揮由吳佩孚本人自兼。

皖軍方面以段祺瑞爲總司令，下亦分爲三路，東路總指揮徐樹錚，西路總指揮曲同豐，中路總指揮陳文運。

戰鬥展開後，皖軍出馬不利，曲同豐指揮的西路軍一經接觸就敗下來。徐樹錚的東路軍，起始在楊村還打個勝仗，孰知黑松林殺出個李迺，奉軍加入爲直系助戰，因而直軍方面聲勢大振，徐樹錚所部大敗下來，東西兩翼皖軍遂告不支，陳文運的中路軍當然是不戰自潰。

段祺瑞從第二次組閣後，向日本借來的大筆外債，辛辛苦苦練成這三路大軍，不到五天時間，就

被直軍打得落花流水，皖系的實力，便從此一蹶不振了。

民國十年，正是直系大將王占元當湖北督軍，他不但與鄂省人民的感情弄得非常惡劣，就是他自己部隊也攪得怨聲載道。湖北的紳商會經歷次電請政府撤換王占元，可是北京政府因為王氏手握重兵，不敢貿然頒發撤換命令，王占元聞到風聲，深恐地位不保，趁曹錕和張作霖在天津開會的時候，就逃程趕去，曹、張允作奧援，要他在長江方面鞏固地盤，他這才得意洋洋地跑到北京去向財政部逼索欠餉六百萬元，其時國庫空虛，財部無法籌出，幾經羅掘，才勉強湊半數。他得了這筆鉅款回到武昌，馬上存入漢口的外國銀行生息，部隊欠餉分文未發，全省軍隊紛紛索餉，他只一味支吾搪塞，根本無發放的誠意，不到一月，武昌、宜昌兩處便發生軍隊譁變事件，到處焚掠，人民受害甚深，王占元雖派兵圍剿，而對人民損失，却熟視無睹，鄂省商會及地方各社團聯銜致電北京政府，痛訴王氏督鄂罪行。

政府見民情憤激，遂派蔣作賓南下，一來是向王占元責問，二來是慰問當地受害民衆，那知蔣氏到達武昌時，王占元竟置之不理，蔣氏痛癢梓蒙受災禍，復恨王占元目無政府，毫無悔改之意，於是聯合孔庚一同赴長沙請援。

此時，湖南督軍趙恒惕，正高唱「聯省自治」，湘鄂本屬唇齒，出兵相援，義無反顧，因派宋鶴庚、魯滌平二人分任援鄂軍正副司令，率湘軍第一二兩師及第一八兩混成旅，並駐湘鄂邊區兵團向湖

北省境進發。

湘軍取得鄂人合作，連戰皆捷，長驅直入。同時，聯絡川省劉湘進兵鄂西，兩面夾擊。王占元至此力不能支，乃向北京政府自請辭職，旋北京政府表薦劉湘繼王督鄂，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名義率軍南下督戰。

直軍與湘軍正面相持於汀泗橋，吳氏指揮艦隊直趨岳州，湘軍遂敗，兩省戰事於是終結。

湘軍既敗，吳佩孚復揮軍西指以戰川軍，吳部炮火猛烈，川軍則得地之利，憑險頑抗。雙方膠着相持三星期之久，終以川軍糧藥缺乏，劉湘敗回川省，「鄂川爭端」至此，吳佩孚復又勝利。吳氏於是派張福來守岳州，孫傳芳守宜昌，佈成一角之勢，瞰制長江。

由於直系勢力之膨脹，使奉系大爲不安，乃再聯安福系以制直系——因而又點燃「直奉戰爭」的引線。

張作霖此時羽毛已豐，不甘伏處關外，必須藉故發動戰爭，以便問鼎中原。先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皖系既敗，直系逼段下野，徐樹錚、曾毓雋等被列爲罪魁，下令通緝，奉系爲要拉攏安福系，自然須爲彼等緩頰示惠，特向北京政府請求取消安福系的罪名，並撤銷徐樹錚、曾毓雋等之通緝令，致使吳佩孚大光其火，對奉系恨之入骨。

而由張作霖推薦而組閣的梁士詒——外號財神，因爲感激張氏，軍餉方面，難免厚奉薄直，這更

令曹、吳等憤憤不平！

又民國十年美國總統哈定，爲防止未來大戰起見，以維護東和平及限制軍備爲名，於是年十二月召開「華盛頓會議」，我國代表施肇基提出之議案中，有廢除租借地一項，以英國反對歸還九龍半島，日本又堅不放棄旅大，梁內閣曾電施肇基囑其對日讓步，遂予吳佩孚以口實。可是吳攻梁的通電發出後，張作霖立時反唇相譏，於是戰爭又爆發了。

民國十一年四月

「直奉之戰」

直軍以鄭州，洛陽爲後方集結地，總司令部設於河北省北部之涿州。吳佩孚任總司令，東路總指揮爲張國鈞，統率葛榮，彭壽莘等部。戰鬥地區爲津南之馬廠及津保公路之線。中路總指揮爲王承斌，進出固安一帶地區。西路總指揮由吳佩孚自兼，率董政國及王承斌之一部，活動於京南琉璃河一帶。此外，在隴海鐵路亦集結重兵，以爲策應，合計兵力約十二萬人。

奉軍以津樞城爲後方，總司令張作霖設總司令於津京鐵路線之大興，以京奉、津浦兩線爲東路，爲張作霖指揮，率張學良，李景林兩部兵力。固安方面爲中路，由許蘭洲指揮，率閻朝璽，鮑德山兩部兵力。京漢線爲西路，由張景惠指揮鄒芬、鄒殿陞等部作戰，總共兵力超過十萬人。

奉軍三路同時接戰，以西路京漢鐵路北段戰事最爲激烈，雙方相持數日，吳調兵一旅，由西路迂迴奉軍之後，張景惠部將潰，直軍乘勝進佔豐台，其他中東兩路亦相繼敗退，於是張作霖命所部第一

步退至京奉鐵路之灤縣，直軍着着進迫，奉軍復再撤至山海關，直軍尾追，奉軍郭松齡憑險抵抗又失利，至此奉軍以軍事大勢已去求和，直軍接受後，遂開會議於秦皇島，協定奉軍全部撤至山海關外，直軍不得再逼入奉天省境。

這一場戰鬥結果，是內閣梁士詒，交通總長葉恭綽，財政部長張弧等撤職，交法庭訊辦。張作霖免去本兼各職。由是張作霖在瀋陽宣佈東北三省——奉、吉、黑自治，張自稱為東北保安司令。

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京政府又有所謂「法統重光」的把戲出現，即是驅逐徐世昌，重擁黎元洪為總統，恢復舊國會。這時直系掌握支配北方政權，黎元洪不過是個傀儡而已。直系勢力既趨擴張而鞏固，終於十二年六月驅逐黎元洪，由直系首領曹錕賄選為總統。當時被他收買的議員，就被設為「豬仔議員」，所謂「神聖之選票」，竟因此蒙垢含羞，成為民國史上最可恥的一幕。

曹錕任總統以後，招致「反直系」的大聯合，段祺瑞聯絡關外王張作霖和南方的革命勢力，共謀打倒直系，即所謂「孫·段·張三角同盟」是也。

這一役是由安福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 and 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首先發難。

十三年九月的「江浙戰爭」，一稱「齊盧之戰」。

這次戰爭從表面看來，是齊盧二人爭奪上海的地盤和鴉片市場。因為上海雖屬江蘇省區，而實際上滬上行政軍事大權，却由盧永祥派何豐林以淞滬護軍使名義掌握。這一場爭奪表面上是「江浙戰爭」，但事實上是直皖兩系

第二次的大戰。

齊盧雙方部隊在上海外國展開戰門，而直奉兩大勢力在華北方面亦復調兵遣將準備廝殺。

熱河方面在朝陽首先發難，接着山海關方面的九門口，石門寨亦發生劇戰，雙方徵調十數省的力，量，蠻鵬拼命，成爲第二次直奉大戰。

奉軍方面：張作霖自任總司令，組成六個軍，由吳俊陞，張作相，許蘭洲，張學良，李景林，姜登選等分統之。大本營設於關外之錦州，分三路部署，計劃向朝陽之線主攻，向榆關之線主守，出動奉，吉，黑三省步兵及蒙古騎兵，連同後方各地部隊，總數約十五萬之衆，另有飛機三隊，以葫蘆島爲基地，向山海關，喜峯口活動。

直軍方面：吳佩孚任總司令，分爲三軍，由彭壽莘，王懷慶，馮玉祥領之，總司令部設於津東之灤縣。亦分三路部署，計劃向山海關北主攻，向熱河北主守，前後方部隊約二十萬人，另委張福來爲援軍總司令。亦有飛機四隊，分駐於北帶河，灤縣，朝陽及舊航空處機場。

齊盧構兵，在上海外國相持四十餘日，起初是盧部佔優勢，可是盧永祥下面的第四師師長陳樂山，突然在淞江叛變，通電主和，驅盧下野，盧永祥以變起肘腋，於是反勝爲敗了。陳樂山之變，並非是齊慶元的運動，完全是以個人的金錢太多，加之滬上復有嬌妻美妾，不願作戰而犧牲，遂斷然反戰。當時上海報紙曾刊載有「江南甲子論」，其末首有云：「溫柔不住住何鄉？垂老陳平夢亦香，馬

後黃金馬前血，將軍何苦死沙場。」即詠陳樂山倒戈事。

至直奉雙方之戰況，自比齊盧爭奪爲猛烈，直軍在軍事進展順利之際，亦殺出一個陳樂山同型的人物，且此公翻雲覆雨的本領，又高出陳樂山千百倍，此人是誰？那就是以倒戈起家的基督將軍馮玉祥是也。

馮在直奉二次大戰中倒戈表演，並不是初顯身手，早在民國七年時就玩過這套把戲。那時他是當混成旅長，段內閣想對西南用兵，派曹錕爲兩湖巡閱使，段南征大本營於湖北之孝感，馮之一旅駐防鄂東之武穴。當段氏正劍拔弩張，準備問罪西南之際，馮玉祥忽於是年二月十三日在防地宣佈自主，一面聲討皖系的倪嗣冲，同時呼籲南北罷兵，十四日發表寒電內有「或罷兵，或殺玉祥以闢天下」，段聞變，遂於二月廿三日下午令免馮職，交由曹錕查辦，是時，馮復唆使部下通電挽留，聲稱全旅官兵九千餘人，決與旅長同進退，共生死。這對於段內閣簡直是目中無物了。幸而曹巡閱使打圓場，向段請求撤去馮玉祥陸軍中將銜，仍留旅長任，改歸曹錕節制，其實，這是直皖兩系的火併，馮玉祥由直導系演出來唱花臉的，所以從此馮玉祥成爲了曹、吳心腹，想不到六年以後，曹、吳這位心腹，又發了「倒戈」的老糧，掉轉槍頭對直系了。

在奉直交綏中，熱河方面，奉軍佔了優勢，山海關方面，兩軍血戰未決，吳佩孚親臨前線督戰，正圖扭轉局勢，不意馮玉祥忽然自改番號爲國民軍，敵前叛變，吳佩孚這一下真急了，處於兩面受敵

前後作戰狀態，馮部國民軍直趨京畿，以陸軍檢閱使名義，在各地大發佈告，北京各報以馮玉祥班超回京作新聞用粗號字刊出，奉軍乘機進攻，直軍於是乎全部敗退。

曹錕被趕去位，先是馮玉祥一手造成一個黃部內閣，但爲時甚暫，旋奉、國兩實力派擁出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於是總統，內閣，國會三機關的權力，集中於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時局更爲紛亂，成爲奉、國、直、皖、四系分割之局，這四系從十三年冬起就開始磨拳擦掌，最後終於扭打一團，即爲直、國、奉、皖混亂時期。

段祺瑞既任執政，皖系算是迴光反照，他就召集善後會議，以求解決時局，而北洋軍閥的鬥爭，又進入一個新階段。

這時各系的勢力發展是這樣的，奉軍沿津浦南下，國民軍沿京漢南進，直系殘餘力量則盤據長江待機而動，皖系殘餘則欲藉段之東山再起而死灰復燃，四系旗鼓相當。

十四年一月齊燮元和盧永祥再啓戰端，實則此爲四系混戰之前奏。

齊、盧之戰未決，張作霖的奉軍實力已自津浦線伸展到長江區域，襲取蘇、魯、皖三省，實收漁人之利，而以張宗昌督魯，姜登選督皖，楊宇霆督蘇，由是奉系勢力遠佈江南富庶之地。按當時張宗昌等均以善後督辦名義出任。

孫傳芳丟了江蘇怎能甘心呢！因起蘇、皖、浙、贛、閩五省聯軍以抗奉，吳佩孚亦在漢口設立總

司令部，號召舊部，馮玉祥坐鎮京都，一方面擁護執政以自重，儼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氣勢，一方面又派軍南下河南，經略陝西，進而想囊括西北。

楊宇霆和姜登選戰不過孫傳芳，只得又放棄蘇、皖向北撤退，張作霖當命直督李景林和魯督張宗昌對付孫傳芳，而以郭松齡，張作相，汲金純，閻朝璽等部，監視馮玉祥。

不久馮玉祥之國民二軍岳維峻攻魯取直，張作霖遂決意與馮玉祥以武力相週旋。

可是奉系大將郭松齡受馮玉祥之勾結，發生叛變，揮軍東進，圍攻瀋陽，馮玉祥擬派軍出關爲援，而直督李景林不允假道，予以阻擊，李雖失敗，而郭松齡亦被擒，奉軍轉危爲安。

十五年張作霖遂大舉攻馮，李景林與張宗昌組「直魯聯軍」，靳雲鵬號召舊部與張合作，吳佩孚由鄂揮軍北上，誓必消滅馮玉祥以報其對直系倒戈之仇，張作霖及時自山海關向馮部反攻，馮玉祥陷於四面楚歌之境，即退守南口，而以張、吳合力進擊，馮不支，退往陝、甘，直至民國十六年五月誓師，參加國民革命軍，這位「倒戈」將軍才又抬頭。

張作霖打倒馮玉祥後，聲勢大振，奉軍主力再度入關，張始稱「安國軍總司令」，繼又稱「海陸軍大元帥」，成爲北方政局的中心人物。至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攻入北平，張遂倉皇出走，途次京奉鐵路之皇姑屯車站被日人炸死，這才是北洋軍閥混戰局面的大結束。

馮玉祥迫宣統出宮記

清宣統帝溥儀，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被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派兵入宮，迫令實行廢除清帝名號，並令交出玉璽，同日出宮，溥儀移居日本使館，其後又移居天津，卒至爲日人所利用，挾之以組織滿洲國，用爲傀儡，東北遂成爲日人優畧的基地，貽患無窮，國人對馮玉祥迫溥儀出宮，頗多疵議，然在當日，馮玉祥這一舉動，也有他的藉口。這事發生在馮玉祥率直第二次大戰正當緊張的階段，忽在前方通電主和停戰，回師北京以後的事。說起率直第二次大戰的起因，是由於直系迫辱黎總統元洪退職，曹錕乘機賄選做總統，盧永祥張作霖與師討曹，馮玉祥原是直系人物，做到第三軍的總司令，大有舉足輕重之勢，怎料他的部隊，突然由熱河前線撤回北京，陷曹錕吳佩孚軍隊於失敗，曹錕又被迫退職，被困於總統府，現在先把直系迫辱黎元洪出京的經過擇要述出，和宣統被迫出宮的史畧記在後面。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日，北京直系軍隊，借索餉爲名，同至總統府嘩噪，又使公民團圍困總統府，黎元洪不安於位，至十二日，即通電辭職，離京赴天津，當乘車到京津鐵路的楊村站時，直隸省長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兩人，帶着五百名軍隊，乘車先到，表面謬稱歡迎總統，而實際却強迫黎氏下車，擁黎到新車站留居，王承斌拿出經已擬定的電稿三通，迫黎氏簽名宣佈，並索取總統印信，那

三通擬定的電稿，一是向國會辭職，二是令國務院代行總統職權，三是聲明臨時所發命令一概無效，黎氏當即堅決拒絕，王承斌竟斷絕其飲食供應，當相持最劇烈時，黎氏曾用手槍自殺，爲西人隔開森等協力阻止挽救，才不致自殺，到了十四日早上，黎迫於無奈，忍辱簽名，並電京交出印信，王承斌得了總統印信後，才准黎元洪赴天津，黎氏到津後，發出通電，聲明在楊村被迫簽名之三電，一概無效，旋由天津到上海，這是直系迫黎元洪退職離京的一幕。

黎元洪退職後，暫由國務院代行總統職務，而直系即運動選舉曹錕爲總統，北京國會，定於八月廿七日那天選舉總統，浙江督軍盧永祥，首先通電反對，他的反對理由是：國會議員之不附直系的，多已出京，國會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違法開會。奉天張作霖也通電反對這次的選舉，但直系却置之不理，於十月五日，北京國會吳景濂等一票豬仔議員，開總統選舉會，選出曹錕爲總統，這就是中外咸知的賄選那幕醜劇了。十月十日，曹錕入京就總統職，並公佈憲法，當時國人都叫他「曹家憲法」哩。

至民國十三年，浙江督軍盧永祥聯合粵奉浙反對曹錕，直系的孫傳芳由閩入浙，吳佩孚又使江蘇督軍齊燮元調兵南下取浙，夾攻盧永祥，盧率部迎戰於崑江附近，結果戰敗，就通電聲討曹錕，奉天張作霖通電響應盧氏，於是蘇浙的戰事結束，而奉直第二次大戰接洽開始，曹錕下令討張作霖，張並通電派兵入關討曹，奉直兩軍既接觸，奉軍使戰很勇，直軍不支，紛紛退到秦皇島，奉軍便佔據山海

關，封鎖了直軍的通路，吳佩孚以艦隊運兵數萬在秦皇島登陸，謀大舉反攻，如果沒有內部變化，奉軍未必保持勝利的。

不料担任攻擊熱河奉軍的馮玉祥，與陸軍第一師長胡景翼，京師警備司令孫岳等，忽於十月廿三日回師北京，通電主和停戰，曹錕以馮玉祥背已聯奉，形勢已變，便下令停戰以謀緩和，同日並下令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派充青海墾務督辦，馮玉祥帶兵回京後，已將曹錕困於總統府裡，但曹錕仍無退位之意，蓋有待於吳佩孚之解圍，吳佩孚知道馮玉祥回師北京，立下令回師天津，準備與馮軍決戰，而張馮兩軍聯合進攻，吳氏更調江蘇齊燮元、湖北蕭耀南，派兵北上赴援，但山東鄭士琦宣佈中立，毀壞了津浦線各地，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仍用帝制。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引為笑柄，且聞馮儀彙性聰明，平居恒言願為民國一公民，不願為禁宮一廢帝，蓋其感於新世潮流，時感戚焉以己身之地位為虞，近自財庫空虛，支應不繼，竭蹶之痛，益傷其心，故當百政刷新之會，得兩方同意，以從事於優待條件之修改，自移居後海後，並願由軍警妥密保護，從茲五族一體，階級盡除，共和基礎，固如磐石，而在薄儀方面，既得自由向學之機，復蘇作繭自縛之困，異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資格，宣動民國。至於清室財物，業經奉令由國務院聘請公正耆紳，會同清室進支人員，共組一委員會，將所有物件，分別公私，妥為處置，其應歸公有者，擬一編號，分存於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中，俾垂久遠，而昭大信。

當時馮玉祥還宮，有謂馮氏乘機搬去清宮珍物不少，變價以充軍餉。山西閻錫山，亦助馮張截斷京漢路，阻湖北竊軍北上，吳氏知事無可爲，遂率僚屬乘輪南下武漢，曹錕亦通電辭職，馮玉祥回京後，以是時有某方面再擁宣統帝復辟之謠，爲先發制人計，於十一月五日，帶兵入宮，勸宣統帝廢除帝號，交出玉璽，即日遷移出宮，即由國務院與溥儀商訂：修正民國優待清室條件如左：

「第一條，大清宣統皇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號，爲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第二條，自本條件修改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二百萬元，開辦北京平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約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第四條，清室之族屬陵寢，民國酌設衛兵，妥爲保護。第五條，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爲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右約修訂後，溥儀即於是日偕其妻妾遷移出宮，先居醇王府，後移日本使館。

革命軍德安戰役定大局

民國十五年八月中，革命軍既擊潰吳佩孚軍，僅餘陳嘉謨，劉玉春困守武昌城，軍事進展，固極順利。惟孫傳芳尙擁兵廿萬，雄踞南京，竟以九省聯帥名義，電限革命軍撤離鄂、湘、贛。同時命謝鴻勳部由武寧向陽新進發，陳調元部由武穴、王普部由富池口亦向陽新推進，又命馬登瀛率軍二千餘，由黃石

港登陸，思以大包圍姿態，殲滅駐陽新之第七軍，進而解武昌之圍。總司令蔣公洞燭其謀，遂於九月初調包圍武昌之第七軍指揮官胡宗鐸，率部會合原駐陽新第七軍之一部，向長江下游監視，並進擊轍北。宗鐸奉命後，知欲突破孫軍包圍陰謀，首須消滅其有力部隊謝鴻勛。時鴻勛方率一師之衆，屯駐湘溪，宗鐸遂以迅速行動，由陽新荻田港渡河，向洋港前進。次日抵羊腸山，首將鴻勛警戒部隊殲滅。越日到達湘溪北端丫環山，察知鴻勛在湘溪東一帶山地，佔有陣地，控制武寧，並構築強固工事。宗鐸求戰心切，當率部向陣地攻擊。顧謝軍砲兵甚多，火力熾盛，第七軍爲貫徹革命目的，奮力效死，敵軍之砲火愈烈，則進攻愈猛，經一日搏鬥，謝軍不支，而其左後方，又阻於修水，遂全師覆沒，鴻勛身受重傷，由其衛兵乘黑夜昇通修水、建昌、轉九江、赴滬療治，未幾斃命。時孫傳芳親在九江督戰，聞謝軍被殲，大爲驚憤。遂嚴令所部分途反攻，於是鄧如琢、鄭俊彥等復佔南昌，駐武穴之陳調元王普等部，亦有溯江而上，進窺武漢之勢。使革命軍程潛、王柏齡等部，遭受挫敗，朱培德且向萍鄉撤退，贛州及撫州方面脅蔭平，賴世璜等部，亦感不支。此時形勢危急，倘因此而武漢動搖，湖南不保，則革命軍歸途斷絕，北伐大業殆矣。蔣介石神謀獨運，知欲挽此頹勢，惟有令第七軍重創轍北敵軍，使其首尾不能兼顧，遂令胡宗鐸進向南潯路線出擊，然第七軍此時已成孤軍深入，勢亦甚危。宗鐸爲解除革命軍威脅，更不能計及環境險惡，當選取南潯路中段德安縣爲進擊目標。於是率湘溪苦戰之師，於兩日間急馳至德安城西十里之木坑壘十里亭附近，次日拂曉，開始攻擊。時在德安孫

軍，爲楊震東、李俊義、陳光祖、段承澤、盧香亭諸部，勢力雄厚，殊非第七軍所及，然宗鐸本革命精神，攻擊甚猛。孫軍亦知此役關係存亡，抵抗亦烈。互進互退，死傷均重，而火線錯雜，指揮尤難。至日暮時，宗鐸親督僅有之衛隊三連，領導衝鋒，全線軍心奮振，孫軍於疲憊之餘，立時瓦解，四散潰退，溺斃於德安城東小河湖海者數千人。第七軍團長陸受祺陣亡，宗鐸衣帽均被彈穿，其戰鬥慘烈，可以想見。孫傳芳聞訊沮喪，由潯遁回南京，贛西孫軍，亦紛紛投誠，於是鄂贛鞏固，大局定焉。

記褚民誼陳公博之死

汪精衛於抗戰期內，身兼民意暨行政兩大任，值前方失利，英美袖手，緬漢路又告封鎖，西歐德軍以破竹之勢，席捲歐陸，一時認爲事不可爲，竟排衆議，倡爲和談，中樞峻拒，竟乘間脫身，由渝走越，將爲遠適之謀，乃以河內一擊，誤中其心腹曾仲鳴，一時意氣衝擊，去甯組府，遂鑄大錯。時以中委而隨汪者四人，陳璧君而外，陳公博、周佛海與褚民誼是已，汪於勝利前一歲，以腹內藏彈復發，病逝於日，陳璧君迄猶囹於滬獄。周佛海雖經明令特赦，改處無期徒刑，卒以心臟舊疾，瘦死南京老虎橋押所。惟陳公博褚民誼兩人，一經定讞，均先後在蘇州獅子橋監獄內執行槍決，兩人生前，素不拘羈行，獨於臨刑之際，能從容赴死。其死狀，外間已有傳之者，而語焉不詳，本文所記，則同

獄目擊者所轉告，錄之或足補史乘之不足，亦所以爲垂誠也。

褚民誼與汪本有姻婭之誼，抗戰未久，國軍由滬西撤，褚仍留滬，方主持亞爾培路中法大學校務。褚與李石曾等均爲留法前輩，褚習醫，畢業論文，以解剖雞兔陰部之生理狀態爲題材，被稱爲兔陰博士，以此學歷，獲長中法，但仍受命與滬法租界當局負聯絡之責。迨二十八年汪氏抵滬，乃依附焉。

褚在汪府，雖迭任外交海軍等部，一度爲駐日大使，但向不爲汪所倚重，爲魯固不足，爲惡尤不足也。而勝利以後，卽遽之繫蘇獄，兩審判置重典，家屬奔走疏解，終不獲諒。當司法行政部執行命令送達之日，方晨起，褚正授同獄諸人以太極操，獄卒已環伺於後，褚猶未覺，迨一回顧，始見有異狀，因問何事，諸卒與相處久，不忍告，僅微搖其首，褚以爲眞無事，遂續操，逾刻，見獄卒仍未去，情狀亦不類平時，自知末日已至，因與諸獄友，曰：「豈止於此，將永別矣。」環場一掃，返身入囚房，整雜物，將内外衣履盡易，襪爲新置者，已穿就，旋復除去曰：「不必暴殄矣，將留爲兒童用也。」獄友力勸，始勉爲易之，猶嘆息不止。乃隨獄吏出，同難者戀戀送抵二門口，褚力阻，謂不敢再有勞，指門旁停屍室曰：「半小時後，將重歸此處，不難重見。」返身對衆拱手過額，且道珍重，衆皆含淚目視其去。出獄門，報社攝影記者已久候，舉鏡欲照，褚小立，復曰：「此爲余之最後一次，幸勿錯過好鏡頭。」步行將抵刑場，行刑吏執鎗自後突發，彈中其腦，恒人皆前仆，而褚受彈後，猶作鶴子翻身狀，掙扎再四，始仰跌於地，殆爲平時練習太極拳之功，體力逾常也。血自創口汨

泪流地爲之赤，喘不止，作聲甚鉅，久乃氣絕。

褚生前，早歲參加革命，留法期內，隨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加入同盟會，曾有微勞，值費用不給，則設立豆腐肆於法京，博蠅頭爲挹注，其發行鼓吹革命之華文書報，排印均身任之。迨其返國從政，依違無表見，事汪亦最久，日惟以太極拳、紙鷂、游泳、平劇等爲事。在行政院秘書長任內，且爲美人魚執鞭，玩物喪志，不類政壇人物。以是爲世詬病，生平無大善，亦無大惡，而竟召殺身之禍，要非其始料所及矣。

陳公博爲粵人，早歲留英，風度瀟灑，有口才，擅文事。民十與陳獨秀等爲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且爲在滬召開之第一次十人代表大會代表。其後反共脫黨，與顧孟餘同稱汪之左右臂。北伐以前，迭任黨國要職。抗戰前，汪任行政院長，曾一度出長實業部，迨汪赴法，又在滬創大陸大學，發行刊物，對國府多所指摘。

汪離渝輾轉由黔而越而港，赴滬籌創政權，事前陳不及知。二十八年冬，汪在滬已由虹口重光堂移居愚園路之一三六弄口之王伯琴宅，公博突由港兼程來滬，婉言勸阻，反覆辯論多日，汪謂事已大定，勢成騎虎，難中輟矣。汪並謂若汝求自全，不敢強，行止可自決之。公博微喟曰：「余一生以公爲知己，值此患難，不敢求苟免，勢惟效關羽事劉豫州者以事公耳。」汪聞語，爲之感動。及汪府成立，以其任立法院長，旋又兼滬市長，汪病逝東瀛，代「主席」職，以迄抗戰勝利。

日寇投降，汪府中人，在寧集會，通令各機構負責人各安本位，靜待接收，公博等仍留寧待罪。會中央地下份子周鎬等人擅自行動，佔新街口「中央儲備銀行」發施號令，拘捕京市長周學昌等多人，一時秩序陷于混亂，汪府諸要人所繫犬，有相繼暴斃者，風聲鶴唳，若不可終日。而號稱中央接收機關者又紛紛出現，行動逾常軌，且真偽莫辨，公博等忍受僭冒者之辱，乃貽書何敬之將軍之先遣人員，謂先赴日暫避，以待後命，但決不欲逃避任何應負之責任，如需傳鞠，早發電而夕返矣云云。乃專機與其妻李勵莊及林柏生等諸人飛日。其後中樞電召，公博等遵命歸，因繫於蘇州獄次，卒判死刑，繼膠斌之後，就獄執行。

當命令抵達之時，公博方爲典獄長書楹聯，聯語云：「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爲心。」猶未覺，而獄卒已持令來，公博本極機警，觀狀已覺，因曰：「請稍待，當畢此一聯。」仍爲懸腕書之，字體無殊于平昔，書竟，擲筆而起，返抵監室，割繃寸，出紙烟燃之，草草收拾一過，持平時所用一小茶壺，首趨陳璧君室，罄折爲禮，曰：「夫人！恕余先行矣，此去應有面目見汪先生于地下，幸自珍衛，一壺雖微，獄中無他物，謹以爲獻，親物如親余也。」陳璧君爲之痛哭失聲，握手勿釋，公博僅畧一盞額曰：「人生總須一別，亦總須一死也。幸夫人稍抑悲懷。」乃脫手掉首行，復與獄中諸難友一一握別，抵庭，已爲設桌椅，疾書遺函數通，時已近午，本尙欲作一書呈當局，見時已晚，自語曰：「言之亦奚益，不如其已。」謂庭上曰：「因余之故，有誤午餐時矣，彌覺歉疚，卽此行乎？」

「直前與庭上推檢人員握手爲禮，隨行刑者趨刑場，至曠地，彈自其腦後發，以兩彈畢命。」

公博平時，風流自賞，衣履整潔，常戴法國便帽，披玄色氅，如佳公子，人頗病其失于穩重，而能臨命不亂，一如平時，雖其政治上之出處，有可議者，但其忠于一人，克全終始，人于其死也，有爲之慨然者。以視今之受國厚恩，一旦勢去，則朝秦暮楚，視顏事仇，視公博應多愧色。

公博生前，除政治論文外，著有「寒風集」行世，中多記述生平瑣事之作。有一子，賢而篤學，留美習電機工程，已卒業，刻方任事于彼邦，前歲且已迎其母李勵莊奉養以終餘年，公博其有後矣。

劉鎮華妾死案

曾爲安徽主席之劉鎮華，河南孟津人，某年任鄂豫邊區剿匪司令時，在漢置有寓廬，其第三妾隨侍，妾生一子，母以子貴，故鎮華甚寵愛之。會鎮華赴前方督剿，妾獨居漢上無以消遣，日惟至戲園觀京劇。時伶人小楊月樓，方在漢演劇，楊故美男子，妾頻往觀劇，因發生曖昧，兩情繾綣，人多知之。後爲鎮華所聞，乃不動聲色，派副官迎妾赴前方，妾以鎮華初無迎眷意，今忽令其居軍中，必爲東憲事發，是此去凶多吉少矣。故與漢上戚友辭別時，輒痛哭失聲。及抵前方，鎮華並無異狀，僅責孟津家中有事，令妾回家料理，臨行派兩衛士隨護，行未數十里，衛士忽返報盒子槍走火，彈中姨太太殞命，鎮華以槍枝走火，乃無心過失，未予追究。後衛士私語人，所謂槍枝走火，實鎮華嫌便爲

之，確否殊不敢必。

孟恩遠殺妻

民國九年十月間，曾任吉林督軍孟恩遠在天津寓宅，親以手槍殺死其妻，當時被捕房捕去，以殺人犯看管。後經證明其妻原爲女伶出身，因與人通姦，爲孟發覺，故槍殺之。復由多人疏解，始獲恢復自由，此亦軍閥中一段佳話也。

按孟爲天津衛大茶壺，於小站練兵時，應募入伍，至光緒卅年，升爲吉林防軍管帶，民國成立後遂走陳昭常而爲吉督。自是縱情聲色，養尊處優，內事委之女婿陸承武（陸建章之子）、外事委之外甥高士儼，高爲吉林第一師師長，固孟之靈魂也。

至民國八年，張作霖因欲擴充地盤，遽向段內閣檢舉孟與復辟有關，被段免去吉督，改任爲誠威將軍，孟抗不受命，並電段質問調動理由，限三日內答復，否則吉林宣布自主。高士儼亦以邊事重要，電請政府收回易督命令。時代理國務總理譚心湛電復高謂：「孟督久任邊圉，閱歷甚富，調京另有借重，非同左遷……國家設官，本無內外輕重之殊，出堂封圻，入參機要，其爲國家盡瘁則一，望勿以孟督遷調，致生誤會。」但孟、高、仍不服從，致僵持甚久。後因日本支持張作霖出面干涉，孟、高始陡然軟化，將吉督交鮑貴卿接任。時孟年已六十，卸職後，僑寓天津，次年遂墜殺妻之

禍。後數年，歿於津。

宋哲元點名笑話

政府制定居民姓名限制條例，一人祇准一個名字，凡報戶口，以及買賣房屋，納稅，選舉，以及任職等等，概以一個名字爲限，不得亂用別號別名，違者處一年以下徒刑。這種限制，尙屬創舉，而亦爲我國特有之法規。因外國根本就無用別號的習慣，用不着法律取締也，故英人常說中國人爲名字最多的人。實際上我國人名字之複雜不一致，有時也確令人頭痛。回憶宋哲元主持華北委員會時，曾藉考試辦法錄取人才二百人，宋招集訓話，躬自讀榜點名，將軍行伍出身，翰墨無多，秘書又未將名字點句，至將軍念至單名雙名及單姓複姓之間竟上下相連，無法再念下去，當場大窘，突然停點。事後立下通令，限冀察平津四地文武官吏，一概須用雙名，不得用單名，違者免職，因之有許多人原祇一名字者，紛紛改爲二字名，如王麟改爲王春禧，陳德易名陳才德之類，比比皆是，一時傳爲笑談，亦見我國人名字之紊亂也。

一盒雪茄烟故事

吳佩孚的參謀長蔣雁行和北洋政客有點不同，他祇要有烟可抽，不管什麼牌子，可以過癮就算

了，好壞不在乎的。蔣本是吳佩孚的老師，蔣百里辭退之後，就是他去接任的。當光緒廿九年袁世凱正當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之時，蔣雁行正在督署當參議。有一回，袁世凱向德國某廠定購了一批大砲，步槍，機槍，共值八十萬兩，可說是一批大買賣了。這批軍火運到天津後，發給北方幾省新軍之用，怎知道大砲的口徑與定單所載不符，袁世凱便批：「交蔣參議查覆。」

原來那時候外國的兵工廠都拿清廷當瘟生看待，賣不出的軍火，就拿來中國賣，往往一批槍砲到了，子彈放不進去，鬧了很大笑話。袁世凱把這件案批交蔣雁行辦理，他的同寅便向他道賀。蔣覺得莫名其妙，問有何可賀。他們說：「照以往慣例，外國工廠知道沒法彌縫，一定會派人來向查辦委員打招呼的。八十萬兩的買賣，還不送你十萬八萬嗎？」蔣雁行雖然不是一個貪官，但他錢是想要的，不過他在官場裡玩得熟了，也知做官的秘訣，他認為外國人是不好惹的，把外國人激惱了，說不上會從此一蹶不振的。於是他對查辦一事，便抱了馬狐政策，裝腔作勢了事。

果然，德國人派了買辦來向蔣講條件，要送他五萬兩銀子，託他照顧一下。蔣既抱着不肯開罪外國人的宗旨，更為討好外國人起見，不肯收他的禮，一口答應把小事化為無事。

結果，此事化為烏有，算是中國倒黜損失了幾十萬元，德國人見蔣合作，又不肯收他們的厚禮，便送了他一盒很名貴的雪茄烟。

宣統三年，段祺瑞任江北提督，蔣雁行也跟了去做總參議。某次回京公幹，公畢，取道還河南下，

還有一天路程便可到徐州，忽然袁世凱的表弟張鎮芳下船拜訪，主人拿出那盒名貴的雪茄請客。張鎮芳吸了一口，就大讚特讚起來，問主人是什麼牌子，多少錢一盒，在什麼地方買的。蔣不好對他說出來源，隨便說在天津一家什麼洋行買的。張鎮芳正談得起勁，一回頭見烟碟上堆滿四五支半截的雪茄，他便失聲道：「你真闊啊，這樣的烟起碼也要三四塊錢一根，你只抽一半就不要了！」到此時，蔣才知是好烟，深悔自己太過浪費。客人臨走時，他又送一根給他，以為紀念。

張鎮芳是跟老袁辦軍需發財的，他一向奢侈慣了的，但還沒吸過這樣好的雪茄，便託人到外國買，民國成立，蔣雁行回到北京，路過天津，找到那個德國人買這樣的雪茄。那人對他說：「蔣先生，你的烟真抽得太快了，這樣兩打一盒的烟，在我們抽，起碼也要半年才完的，一根要抽好幾天呢，這種烟，是六十年前我們的皇帝向巴西特製的，我們的老板，蒙皇上賞過五盒，我來中國老板給我二盒，因為蔣先生你幫了我一個大忙，我才送給你。現在你想花錢去買，恐怕也買不到呢。」

民國第一個飛機製造人朱家仁

一九〇〇年，朱家仁生於湖南漢壽縣的農村，此後他的父親朱熙（申甫）由日本士官畢業回國，經過幾場內戰，因而風雲際會，做到陸軍第二師師長兼蘇常道鎮守使，駐節蘇州，因此朱家仁一直在蘇州求學，自幼聰慧好學，對科學與一切新的事物尤感興趣，在東吳附屬高中畢業後，他的父親要他升讀東吳

法學院，但他堅決反對，那時恰好政府招考留美學生，他即前往報名應試，因為學額不多，而應試的又都是大學畢業生，名落孫山，自屬意料中事，而他竟認為奇恥大辱，回家痛哭不食，後來經他的父親周樹林向他父親說項，給他一筆旅費赴美，自求深造，並且約法三章，除供給第一期學費外，此後不准再向他父親要一文錢，換言之，今後在美國的一切費用，要他自己籌措。

朱家仁抵美後，即攻讀某著名飛機機械工程學校，爲了實踐他對父親的諾言，課餘之暇，就到某百貨公司擔任擦玻璃揩地板的工作，學校當局，見他勤奮好學，予以免費優待，他課餘工作所得，即作爲添製服裝和日常零用，於是順利的讀完四年課程。

學業完成後的朱家仁，他認爲學識是一回事，經驗又是一回事，於是決心留在美國，由學校當局先後介紹他入福特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工作，予他充份實習的機會，因爲事事留心，對飛機的全部機械，均能完全明瞭其製造的過程和性能的掌握，據說有幾種飛機就是由他設計而爲公司方面採用製造的。

經過四年的實習，朱家仁自己覺得已有相當的經驗與把握，於是向公司辭職，決心回國，以所學貢獻祖國，搜集了各種寶貴的材料與參考，準備回國後大展抱負。

朱家仁回國時，正是北伐告完成，政府遷都南京，不久就有航空委員會的設置，與杭州寬橋空軍學校的建立，由於美國方面的推薦，朱家仁就擔任了航空委員會第十五科科長（主管航空機械事務

），兼空校機械教官，然而這對他並不滿足，他希望祖國的航空事業能趕上歐美，成為一等空軍的強國。

由於他是一個務實的人，必須先做一點成績出來，然後再呈獻他的大套計劃，以避免人家說留學生好唱高調，有一次他發現了堆置在空地上的一架廢棄了的發動機，經過日晒夜露，已是破壞不堪，並且當時國府所聘德義兩國顧問，均認為已不堪再加利用了，但他却上了一個簽呈，請求將這個廢棄了的發動機送給他，預備利用它再完成一架可以飛行的飛機，雖然他的簽呈獲得了上率的批准，但一班德義籍顧問都笑他庸人自擾，萬難成功。

他獲得了這架破發動機，不憚麻煩的把它由杭州搬運到蘇州，放在他自己家裡的大廳上，每逢假期就趕回蘇州，由他親自拆修，有時也僱一二個機器銅匠幫忙，日積月累，把他的精神和僅有的薪金都放在上面，大概經過了一年之久，才將這架飛機完成，命名為家仁號。

當他報告航委會說利用那架破發動機已完成了一架完好可飛的飛機，準備擇日試飛，一班德義籍顧問都認為是奇跡。因為德義籍顧問的破壞，誰都不願担任這架家仁號的試飛工作，最後他祇有決定自己來幹。

大概是民國廿一年的五月吧，這架中國人自己製成的家仁號飛機，由蘇州閶門外飛機場起飛，經過一小時的飛行，朱家仁與他自製的家仁號，一起抵達南京機場，一時轟動首都，傳為美談，并由當

時國府主席林森召見，賞給國幣五千元，作爲鼓勵。

自從家仁說的飛行成功後，不獨獲得了航空當局的重視，並且贏得了外國顧問對他的尊敬，於是他呈上了中國自己製造飛機的計劃，附列了精密的圖案和說明以及經費與預算，希望當局採納，以實現他的抱負，可惜等了幾個月，批回來一紙公文，說是「呈及附件均悉，該員才能卓越，計劃周詳，殊堪嘉尚，惟際茲征剿匪患，軍需浩繁，國庫空虛，實無餘款挹注，所請應從緩議。」這無異對他潑了一頭冷水。

此後他一直担任空軍的機械廠長，所担任的工作無非是裝修拆補而已，許多同學和他開玩笑，好一個飛機製造專家，竟變成一個拆補匠，他祇有點頭苦笑，有時他自己解嘲，說比學海軍的嚴復還是強得多了，嚴復回國後當文學教授，學非所用，馴至抽大烟抑鬱而終，我雖然是一個飛機拆補匠，還算是學以致用呢！

抗戰軍興，朱家仁曾奉命赴法國和美國，負責接收對我國援助的飛機，舊地重遊，倍增感慨。

朱家仁操守極清廉，抗戰時物價飛漲，他的薪水不够家用，一方面極力撙節，他與妻兒都是布衣粗食，一方面爲美國飛機公司設計圖案，藉補家用，較之其他的一班機關主管，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勝利後到現在，朱家仁在台灣的台南，仍舊緊守着他的工作崗位，現在算起來已是五十多歲的人

了，不知還有昔日的雄圖否？

初次飛機失事在廣州

航空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甚力，可是積極推行，却在民國十一年回師廣州靖難以後。那時各國正是開始於航空事業的經營，國父有感於航空不但在運輸上能發揮莫大的利便，而且在軍備上，尤具有莫大的權威。如果國家有了充分的空軍力量，則國家自可增強其國際地位。以之衡諸今日的航空事業和空軍建設情形，及今日航空地位的登峯造極，國父高瞻遠矚，其過人見識，確是一位先知先覺者。夷考此一運動的起點，却在民國八年歐洲大戰結束以後。

緣當時有國人譚根，甫自國外歸來，在廣州沙河瘦狗嶺表演航空飛行技術，螺旋槳乎乎作聲後，陳列在曠場的飛機，緩緩前進離地起飛，翱翔空中，環繞市區，市民觀此怪物，驚以爲異，於是「譚根放飛機」一語，却不脛而走。至今四十歲以上的廣州市民，仍多能記憶此事。

自「譚根放飛機」以後，翌年有意大利八架機降落廣州市北較場，一時市民應來郊外參觀飛機者如潮湧至。而當日全無航空設備，飛機降陸後，又無軍警保護，故機停在北郊上，任由市民觀摩，却不如今日機場上的鐵柱林立，鐵網叢叢的使飛機與外間完全隔斷者。機停約三小時，市民因得飽看飛機的構造外型，莫不興爲觀止。

及至飛機離境啓飛時，市民之看熱鬧者，仍絡繹於道。機既升空，市民殷殷以爲奇，能得覩飛機升空情形者，無不以爲快，歡呼揚別，聲震屋宇。此意謂機師亦低飛環繞市民頂上，且揚巾示別，狀至歡愉，却不注意機前有無障礙物件，致誤觸橫枝崗上的一株木棉樹，此機便即行墮下崗上，幸機距地高僅數丈，墮下時又未焚燬，機身亦稍受震損，機師僅微傷而已。此爲民國九年三月間事，亦卽在中國境內飛機失事的第一次也。

第一次飛機作戰笑話

當張勳在北京進行復辟時，段祺瑞却暗裡佈下圈套，來誘他上吊。他一面秘密授意日本人，對張勳表示贊同中國復辟；一面暗裡招兵買馬，作軍事上的準備。那時段氏已無嫡系的部隊，便想到拉攏別人的方法。當時在京畿附近的軍隊有曹錕的第三師，李長泰的第八師，和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等部，他却一一派人設法前往運動，使這三支兵馬成爲他的政治資本。所以他能迅速把張勳打倒，而盜竊了所謂「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的美名！並不是於事發後才倉皇想法來應付的。

李長泰不錯是於復辟消息傳到天津這天的下午就到來見段祺瑞，但他並不是不請自來的。李長泰是段的同學，也是舊部，但兩人平日很少往來，替他們拉線的却是段芝貴。原來段芝貴囑咐李長泰是「很怕老婆的，而他的老婆又最愛大洋的」，小段於是想着了走內線這方法。據說，當時葉恭綽從交通銀

行撥出了二十萬元交小段，送給了這位李師長太太，所以復辟消息一傳出，李長泰就趕到天津來了！段祺瑞當時就了討賊軍總司令後，便把李長泰任爲參贊，將第八師交給段芝貴指揮，繼而不久索性委了王汝勤來任第八師長。（王汝勤原是第八師的旅長。）當日討賊軍中作戰最力的，大抵是馮玉祥、王汝勤、吳佩孚、李星閣、張敬卿這幾個旅長，經已榮升參贊的李長泰，倒沒有費過絲毫的氣力呢！

但這一役當膺首功的並不是上述那幾位旅長，而應該是南苑航空學校校長秦國鏞。他架了一架老爺飛機，去嚇張勳的辮子軍，並一直飛到紫禁城裡，丟了兩個炸彈，一枚炸死了幾名太監，一枚丟中金魚缸裡，不但沒有爆炸，連魚缸也好好的。這是中國第一次使用飛機作戰，由此說來，辮子軍的潰敗，倒是秦國鏞當膺首功呢！

申報與楊乃武、王韜

滬人一般習慣，總稱任何新聞紙爲申報紙，而稱申報爲老申報。報而稱老，其資格可知矣。談申報者，無不與史量才之名並舉，但量才接辦申報，實已在民國元年。量才深陽人，初爲民立中學教員，有大志，欲辦報，而絀於資。會與張岱彬同車北上，張固一時財政界風雲人物，後來九六公債，是其發行。與量才一席話，驚佩無已，遂助量才盤申報館。申報創辦於清同治十年，資本總銀一千六百兩，由英人安納斯，與其友人伍華德、模查謨、約翰瓦其洛四人合辦，各出規銀四百兩。翌年（一八

七十二）四月三十日出版，特以油光紙印刷，粗具規模而已。光緒廿三年，安納斯回國，轉讓於羅開森接辦，代價七萬五千元，以席子佩爲經理。宣統元年，由席子佩取回自辦，距安納斯創辦已三十七年矣。而鉛印的線裝書亦即於此期間，陸續出版。第一部爲尊聞閣叢書，尊聞閣爲申報刊載之藝術掌故文字，自史料、筆記，以迄小說，傳奇譯著，地圖無不兼收。實用油光紙印，都凡五十四類，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出版，光緒五年，續編二集，都六十四種，均由縉儒仙史蔡爾康編成書目，惜以後不再續出，現在相隔八十年，這套油光紙的鉛印叢書亦早被人遺忘，抗戰以前，尙能在來賓閣，古書流通處等冷書架上發現一二冊，視同鳳毛麟角，其中如「十三日備管錄」，紀英兵犯上海事。「梟林小史」紀咸豐三年劉羅川佔據上海事。「英字入門」爲中國早著之英文教科書，皆關係上海文獻至爲重要者。

申報館主筆在民國時代，以陳冷血最爲著名，前乎此者則有楊乃武與天南遞叟。楊乃武餘杭人，以小白菜奸訟案而名震京師，相傳平劇的法門寺即隱射楊乃武逸事。蓋楊因其姊告御狀而得昭雪，劇中傅朋則由其未婚妻叩告御狀。楊案大白之後，西后曾召楊姊與小白菜入宮，劇中孫玉姣、宋巧姣亦雙雙入宮。又其時獲權太監爲李蓮英，劇中以劉瑾比之，抹紅臉以媚之。盜御馬，金鰲島的大太監亦均抹紅臉矣。楊乃武故事，後由楊在上海當申報主筆時，親告李伯康之父，編成彈詞；後伯康由此事盛名於說書界。伯康云：「其父能行醫，嘗爲楊乃武愈危疾，故楊以此報之。」但言出楊口，辭多

文飾，恐反而非信史矣。杭人云：「楊實訟師，故鄉人以冤獄報之。」楊在滬，常貼春聯云：「緇水常飯吃，風潮代枕頭。」

天南邇叟王韜主筆申報，在光緒中葉，與南亭亭長李伯元，我佛山人吳研人同時。叟本黃皖，洪楊之役，李秀成二次攻打上海失敗，叟上書忠王，陳「四策三事」，李不能用。後來清軍獲覩原稿，大爲震驚，事在同治元年。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李爵相督師淞滬，以上海爲關中，……然當皖獻策時，使賊稍聽其謀，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所謂「四策三事」當時陳其庸雖見之薛中丞處，筆記並未錄其原文。後人輾轉相誇，視爲西夏之張元，南宋之陳同甫。謂于會國藩，國藩不能用而逃入太平天國爲謀主者，其實彼所陳四策三事亦平平無奇。民國二十年，故宮清理軍機檔案。此書始行發見，款式作：

「蘇福省儒士黃皖謹稟」

九門御林關國王宗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劉大人閣下」

是此策亦非直接上邇叟王，特欲假劉某以爲轉達耳。其所陳四策標題爲：（一）明告而嚴討之，（二）陽舍而陰攻之，（三）徐以圖之，（四）緩以困之。四策以外尚有圍攻上海當先謀及者三事：（一）結援，（二）散衆，（三）儲貨。凡此四策三事，其實清軍攻破小刀會劉麗州時卽已用之，其事在太平軍初到上海五年之前，並非天南邇叟所創見。

太平天國亡後，雙避居香港五年，同治七年應英人理雅谷之招，遊寓倫敦。返港後改名王漸，字懶今。光緒八年回上海，又改名士韜，字紫詮別號天南遊叟，一度主筆申報，著有淞陰漫錄，由吳友如繪圖，發表於飛影閣畫報，天南遊叟由此成名。晚居蘇州靈岩山，曰穀園，自稱穀園老民。性嗜內好吃西餐，有人請宴，必攜其麵包貽細君，以昭大信。

申報資格雖老，但非上海有報紙的第一張。最早的是「上海新報」，創刊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八日（一八六一）。而我國第一種中文日報則為「上海新報」，創刊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故申報在老字輩的資格，已居第四位。第一家用捲筒紙印刷者為汪漢溪之新聞報，係在民國三年，時新聞報已在三馬路建築館址，而申報尚在後馬路泰記弄中，營業、印刷、編輯擠在一處，靠路擺檯，蓋申報雖有數十年之歷史，但其業務並不猛晉，故席子佩願以十五萬金全部盤與史量才，量才勵精圖治，事必躬親，始聘陳冷血先生為總主筆，張蘊和為副主筆，王堯卿為經理，始創副刊，聘王鈍根為自由談編輯，一時人材濟濟。故其業務蒸蒸日上，銷數由一萬七千份一躍而至七萬。會小三年，量才已為上海鉅富，擁巨廈於南洋路，鏡樓雕梁，窮極富麗，席子佩乃後悔，百計欲謀奪還，不得，自創新申報於望平街，而申報館亦與新聞報館望街對字，層樓聳峙。狄平子時報適居望平街四馬路轉角，不甘落後，亦起崇樓，平子好佛且結浮屠高塔於大廈之巔，價自鳴鐘為時報商標。為後來先施，永安之樂園，摩天樓建塔之嚆矢。於是望平街成為上海文化輿論

之中心，而晶報余大雄獨以三日小型刊物，圓身於四大金剛之中，左顧右盼，嬌小精悍；時新聞報銷數最廣，申報次之，時報又次之，新申報僅存而已。而晶報獨以期銷三萬份自豪，如春秋之有鄭伯。主筆政者，申報陳冷血、天虛我生。新聞報孟心史、嚴獨鶴。時報包入笑、畢倚虹。晶報葉丹斧。新申報王鈍根皆一時之選。久之，席子佩不能敵，以新申報出盤於湯節之，湯自爲經理，鈍根主筆如故，不久，湯節之以桃色案件，鐐鑼入獄。上海報業，在三十八年撤退前，計有報館七十六家，通訊社四十二家，雜誌週刊四百二十五家。（見朱虛白：「大陸時期我國報業統計」。）亦云盛矣。

中華一屆內閣僅存王寵惠

辛亥革命發生於宣統三年（一九一〇），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擁黎元洪爲湖北都督，各省先後響應，紛紛宣告獨立，清廷知大勢已去，授北洋大臣袁世凱全權，與革命黨人議和。袁世凱委唐紹儀爲代表，國民黨由伍廷芳爲代表。雙方交涉折衝，和議在民國元年三月間始告完成，清帝宣告退位，中華民國政府，始由各國次第宣告承認。

當武昌起義時，國父孫中山先生居海外，奔走呼籲，聞各省響應，先生由海外歸國，各省民軍代表，也紛紛聚集在南京，辛亥十二月十日，各省民軍代表一致選舉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成立臨時政府，以次年爲中華民國元年。國父於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並仿襲

國現行的民主總統制度，成立外交，內務，陸軍，海軍，財政，教育，司法，交通，實業等各部，以總長綜其成，當時的全部政府人選乃王寵惠外交部總長，程德全內務總長，黃興陸軍總長，黃鍾瑛海軍總長，陳錦濤財政總長，蔡元培教育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湯壽潛交通總長，張謇實業總長。

和議告成後，袁世凱以清廷全權代表名義，宣佈帝制結束，共和政體成立。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參議院推荐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由南京臨時參議院十七省代表一致票選通過，袁氏於民國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通電就職。依據南京公佈臨時約法，將南京成立臨時政府的美式總統制改為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政府各部組織情形，大致與南京臨時政府無大差異。僅增置內閣總理一人及將實業部易為工商部而已。三月十三日任唐紹儀為代理國務總理，組織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同月三十日發表陸徵祥為外交總長，趙秉鈞為內務總長，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熊希齡為財政總長，蔡元培為教育總長，王寵惠為司法總長，施肇基為交通總長，陳其美為工商總長。

此一內閣成立後，袁世凱與唐紹儀以權責問題，唐紹儀的內閣總理壽命，僅三個月便宣告終結。閣員中除王寵惠一人至今仍健存，位為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外，餘悉作古人矣。

梁士詒以牛自比

三水梁燕聚（士詒）在清末民初時期迭任郵傳部鐵路總局局長，郵傳部大臣及總統府秘書長等職，

而交通銀行又是他發動創辦，對於當時我國財政交通方面，關係至爲密切。胡適之在「傳記文學」一篇演講詞裡，說起有一次見到梁氏，曾勸他把自己在袁世凱時代所經過的事，宣佈出來，作成自傳，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藉自傳把自己做事的立場動機赤裸裸的寫出來，給歷史添些材料。可是梁氏後來並沒有把自傳寫出來。

這裡有一段梁氏幼年時的故事，相當有趣。

梁氏的故鄉叫做岡頭鄉，鄉民多以農爲業，田野間耕牛很多，鄰村的人，常常譏諷岡頭鄉人是牛。光緒元年，梁氏才七歲，居鄉讀書，清明節那天，跟隨長輩往山頭掃墓，沿途看見牛隻成羣，不禁談起牛來，長輩便告訴他前述那件事，說來十分忿怒。梁氏道：

「牛有什麼不好呢？牠品性馴良，負重致遠，辛苦地替人類耕田，有助民食，牠有什麼不好呢？」

自此以後，梁氏常常以牛自比。民國十七年梁氏壽辰，章行嚴給他的壽聯有「萬牛回首」一語，段祺瑞贈他一枚印章，文曰：「負重致遠」，梁氏大喜，因對家人憶述幼年時代這段故事。

又光緒二十七年，梁氏三十三歲，受邑人延聘，主講鳳岡書院，力倡「學歸實用」，經史詞章以外，且并研習中外地理和現代政治，三水縣的讀書人，聞風慕學，來者數百人。有一天是會課日，有一個年紀七十餘歲的陳某，是三水有名的宿儒，帶同兩個兒子到來，得到了課題，自己動筆替兒子做

槍手，在柱後暗中傳遞文稿，梁氏看得清楚，但依然詐作不知。文童送給梁氏，梁氏援筆批道：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爲子者亦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他日成名，幸毋忘乃父入幕抱柱時也。」

梁財神竟是一個這麼風趣的人！

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

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先唱堂會，後才在戲院子裡正式演唱，這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上，已經敘述過了，我今再在記憶所得上，補述一二。

這時是民國二年，梅蘭芳在北京已經紅起來了，這聲譽漸漸傳到了上海，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許少卿，到北京去邀角，約好了王鳳卿與梅蘭芳，其時楊蔭孫（蘇州人，比國留學生，是北京銀行界一位高級職員，人稱楊二爺）適告假回鄉結婚，他的新夫人，是施肇基的甥女兒，結婚的地點是在西家花園（又名味莼園）因爲上海那時還沒有可以安設三、四十桌酒席的大餐廳，只有張園的「安壇地」，還可以應用，這一天的喜筵，可稱一時之盛。

本來由戲館裡請來的名角，打泡戲也沒有唱，如何先唱堂會呢？但當時北京銀行界，到上海來吃喜酒的人很多，梅蘭芳就是北京銀行界捧出來的人，怎麼可以不答應呢？許少卿當然不願意，後來一

般金融界裡的人，由馮耿光領頭，包他一星期的滿座場子，不是爲了賠償許少卿，就是爲了捧梅，也應該盡這個義務。許少卿本來只知道賺錢，又拗不過捧梅派的聲勢，祇得屈服了。這一次的堂會，實在與梅有益的，經大家一宣傳，滿座的場子，竟不止一星期。

楊蔭孫在未去北京之前，是時報館息樓裡的朋友，後來，他是北京交通銀行行長了，不久忽然辭職歸家，終日念佛，不知有何感觸，言語之間，似有精神病，不久便逝世，年紀不過五十多歲吧。

大世界野雞委員

西南政務委員會時代的湘籍委員楊熙讀，口操湘音，每次開會時，大唱「反蔣」高調。「反蔣」與「飯漿」諧音，惡之者皆稱楊爲「飯漿」委員。可是國民黨的第四屆中央委員唐有壬等，也曾被嘲爲「野雞」委員，其事情的經過，於民國二十年間陳濟棠、汪精衛、鄒魯等在廣州組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唱對台戲，值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汪精衛深知廣州的國民政府沒有得到國際間的承認，便藉此機會首倡「共赴國難」口號，北上商談安內攘外的救亡大計。

汪精衛等入京後，與中央當局商定，承認國難臨頭，主張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國是，其時的廣州非法政府，尙未宣告撤銷，汪等爲求爭取主動，也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

表大會，而與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台，事實上國民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却在南京和廣州兩地舉行的。南京舉行的代表會，在丁家橋的中央黨部爲會場，廣州召開的代表會，假廣州中山紀念堂爲會場，各議各案，各提各事。可是兩地的代表會決議案，均以精誠團結爲號召，會議場所雖演出雙包，但決議事項却殊途而同歸。

會議既竣，對下屆的中央委員產生，亦分兩地選舉，廣東的選出若干人，南京的選出若干人，兩地選出的委員，合而成爲第四屆中央委員。此時汪精衛既已北上，汪派委員，例須在廣州的代表大會中選出，但廣東的代表會，以汪精衛既已在南京出席。汪系委員，却應在南京的代表大會中產生。歸來歸去，雙方却把汪系拒於門外，汪憤而走上海，拉出粵粵兩地代表若干，另在法租界的大世界遊樂場開會，選舉第四屆中央委員，至是國民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寧粵兩地區又增添上海一地。從對台而演成三台，終因汪精衛的堅持，改組派却選出陳璧君，唐有壬，褚民誼，周佛海，曾仲鳴等爲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終由中央黨部承認。

大世界遊樂場，却爲上海遊娼集散地。尋花問柳者，咸奔逐於大世界遊樂場中，長江一帶，稱游娼曰「野雞」，故奔逐於遊樂場者，名之曰「打野雞」。改組派當時在上海大世界遊樂場開會，其視會議如兒戲已不問可知，又以其所選之委員，而在游娼集散地之大世界會場產生，一時都門人士，稱此批委員曰「大世界貨」，蓋隱寓「野雞」之嘲，亦諷而虐也。

陳濟棠盛氣倡讀經

前年陸軍一級上將會主粵七年的陳濟棠逝世於台島。陳氏出身軍事，政治之學，未嘗深入。所謂施政大計，亦祇一三年建設計劃，頗覺中肯，但對崇祀關岳，及勸行讀經之嚴令，未免使人感覺措施流於支節。以時代而言，在當日作此提倡，雖亦能迎合某一階層人心理，然在事實上，則殊有開倒車之嫌也，或以爲陳氏未達於政治哲理，而左右人士，復唯諾者多。抑陳氏所好，而更推波助瀾，遂植此倒退時代之政令。矧陳氏當時權傾南天，個人意旨，有如帝皇時代之綸音，不容偶加反對。猶憶廿四年胡適之南遊，至廣州，得林雲陔先生之介，謁伯南於其總部，語及讀經，伯南即會盛氣暢言，意頗強項。歷時幾四十五分鐘，不稍停輟。一若深具把握。其言曰：「讀經爲我主張，祀孔亦爲我主張，拜關岳也爲我所主張。我有我之理由。我民十五年赴莫斯科研究，原預備歸來做紅軍司令，惟研究結果，認共產主義不合國情。遂而終止。并決定我之政治方策，第一爲生產建設，第二爲做人。而我之崇祀關岳，讀經尊孔，均爲提倡「做人」道理之基礎。因「做人」必須有「本」。而此所謂「本」必須於古文化中尋求。苟欲「做人」，而不崇古忠義古聖賢，則爲忘本。忘本之人，當必墮落。」陳氏言至此時，聲厲而容莊，一若凜然不可違逆，雖對語之人爲提倡新文化之胡適之，亦絕不客氣。且謂：「今之中國教育，均爲亡國教育，而所謂科學，亦祇皮毛，因既然忘本，何能建樹？既學不到人家之科學精

神，亦不能創造。非亡國教育而何？」厥後雖經胡適之據所知婉詞相駁，亦盛氣如虎，未肯接納。顧伯南所謂做人不應忘本。是亦爲千古不易的論，獨惜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作毛皮支節之鋪張，未作正心修身之實踐，七年幻夢，南天依然，由此可知爲政之道，非淺學所能妄唱高調。

朱五小姐之父朱啓鈴

朱啓鈴是民國初年會歷任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當年在北平，有名的朱三、朱五小姐就是他的女兒。

他是貴州省紫江縣人，字桂萃，一字雙公。他生長在一個文學、美術氣氛很濃厚的家庭裡，三歲死父，他的母親傅氏夫人茹苦含辛把他養大了。他小時候便有才名，考上舉人後，到北京捐了一個京官來做。當時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羅鴻禨是他的親戚，便介紹他做京師大學堂講學館監督，不久，徐世昌做東三省總督，朱氏被調往服務，遂以候補四品京堂到奉天，做蒙古事務局督辦。民國成立，朱担任過好幾任內務、交通總長，在內務總長任內銳意經營北京市政。郵部宋代理建築專署「李明仲營造法式」，也是由他刊行的。

朱三小姐出風頭

朱氏爲人和氣，言論、態度都很安詳，雖然是生長在一個很舊式的家庭，但他對於兒女的交際及自由，都不欲橫加限制。當民國成立

後，北京也得風氣之先，男女青年酷愛自由。其實那時所謂自由者，不過是愛穿得時髦一點，愛結交一些朋友，愛出來逛逛馬路，吃大餐，上戲院罷了。這本來不算什麼，獨有頭腦頑固之士，認為這麼一來便有傷風敗德之嫌，好像男女自由就國亡無日一樣，便紛紛攻擊內務總長朱啓鈴，還說他縱容他的三小姐出外交際，記得當日濮伯欣「北京打油詩」有一首云：「欲將東亞變西歐，到處逢人說自由。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可見爲他人惡意攻擊一斑。朱氏一於不理，於是便有肅政史夏壽康上書袁世凱，請飭內務部注意。朱也一笑置之。今日仍伴讀張學良生活的朱五小姐，也就是他的女兒。

絲繡錄與女紅傳

朱是一位勤學不倦的學者，他的做學問工夫最大的貢獻，當然是刊行「李明仲營造法式」，此書一出，中外的建築家奉爲圭臬，其影響之大可知。其次是他對刺繡美術的貢獻。二十五年前，他刊行「存素堂絲繡錄」，又輯有「女紅傳」，表揚我國那班不爲人所知的精於女紅的人物數百人。朱本人對於絲織、刺繡品的鑒藏極精，蒐羅歷代的作品甚豐富，今日我國對此道研究之精，不能不推他爲第一了。

八十五歲老人

朱的外祖父是貴族傳壽形，以詩名，著有「澹齋寶詩」。他的長女傅夢瓊就是朱先生的母親，當她生下來不久，她的父親的「初生女詩」有：「傳寶尙是他年事，先遣人來繡我詩」之句，稍長，即精於刺繡及吟詠，她的父親期許她的並不落

空了。她和朱慶鏞結婚後，夫婦皆以詩名一時，她更擁有「神針」的稱號。朱啓鈴幼受庭訓，所以對文學美術，別具慧心。（他的外祖父「澹齋寶詩」，及其母的老師楊劍潭「芋香館詩」，都是朱啓鈴所刻的。）自從一九一九年他退出政治舞台後，卜居天津，近十年住在上海，雖然是八十五歲了，還是丹鉛不輟，日夕讀書研究學問，老而不倦。他生平有一憾事，就是一九二〇年徐世昌委他爲籌印四庫全書督辦，以庫款支絀，四庫全書始終沒有印成，他一談到這件事就搖頭太息，責罵執政的人不注重文化。朱啓鈴生於一八七一年，今年八十五歲。

談陳樹人元旦詩

陳樹人詩善畫，風格絕高，雖歷任中委，而恂恂儒雅，絕無要人習氣。自二十六年抗戰開始，至三十一年止，在州中所作詩，都六七百首，名爲「戰塵集」。集中每年元旦，各有一詩，而各有不同意境。在二十七年元旦偕王志遠登黃鶴樓詩云：「不語江山涕淚新，豈期登眺及茲辰，閉眸凝想鍾山上，可有潛來謁墓人。」二十八年元旦，中樞於重慶遙拜中山陵，樹人詩云：「胡氛萬里絕松楸，還失先靈願未酬，罪孽吾徒知極重，橋山弓劍尙存不？」此詩顯示其雖在滬浦流離中，猶念念不忘國父陵寢。二十九年元旦試筆詩云：「不是尋常獻歲辭，山河收拾定何疑，今年更喜符私祝，還我江南一畫師。」此詩作於長沙大捷之後，故其願望只在以畫師還鄉而已。然蹉跎至五年後，始得如願以

價。樹人勝利回粵後，與其夫人若文女士，唱隨甚樂，是年元旦，有繪雙清圖贈若文詩云：「送年詩與迎年畫，二稿丁寧枕上評，騰起揮毫申祝宴，人間端有此雙清。」此詩心懷恬靜，伉儷情深，與以前各元旦詩，意境又自不同矣。

怪儒辜鴻銘

清末民初的辜鴻銘，由於他的忠君思想，對所謂「國粹的愛癖」。因此常單刀匹馬地受許多革命份子和外國人的攻擊。但辜先生能通拉丁，希臘，德國，法國，俄國，英國等六國的語言。於我國古文尤有研究，他的聲名和溝通中西文化的功績，還是響譽國內外。

他是廈門人，字湯生，又字立誠，自稱「慵人」，又號「漢濱讀易者」。出生在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

辜氏在香港受初步的英文教育，啓蒙的老師是個非常嚴肅的英國人，他在香港打好英文根基後，到蘇格蘭去讀書。一八七七年得到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學位。

其後，他回國任張之洞的幕僚，後任滄浦局的董事，南洋大學教務長，北京大學拉丁文教授等職。生於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卒於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享壽七十一歲。

他底忠君的思想，在其文章中常可見到。他早時在上海的字林西報和華北的日文華北標準報上，

常發表維護清朝皇室的文章，他在外國時還留長辮子，穿著長袍馬褂，出入交際場所。在他所著的「中國政體和文官制」(英文本)一書中，尤其說得顯頭是道。他對女人纏足很感興趣，不反對隨地吐瀉，這是他的怪癖。同時他曾把中國圖書譯為英文，近代英國的思想家會受其影響很大。而他却喜用中文來回答英文的問句，用英文來回答中文，使對他談話的人不知用什麼語言來講好。因此他常受人攻擊，而有「怪儒」之號。

他的英文詩寫得非常美麗動人。著名旅行家白特夫人極賞賞他的詩。她在「揚子江流域見聞」一書中曾感慨地說：「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還沒有生出來呢！」

他的中文詩也非常工整。他的詩往往中英文都有，我們對照了讀，於翻譯上可得益不少。較出名的詩有「壯士吟」「懷舊」等兩首。

他的翻譯堪稱獨步，他不似林琴南的不識英文而譯書。他的中文好，英文更好。因此他把春秋大義，中庸，論語諸書，譯成英文，使歐美人士親知我國先哲聖賢的思想的成就。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當時中國人識讀英文的有三個半，一個是辜鴻銘，一個是伍朝樞，一個是陳友仁，還有半個他不說，大概是他自己吧。這可想見辜鴻銘在一個偉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可想見辜鴻銘的英文造詣。

生育倫學問

他所著「張文襄幕府紀聞」(一名辜鴻銘的筆記)一書中，有「生子」一則，論求學問，非常奇趣，且言之有理，可為吾人讀書指南。其文曰：

「袁簡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踰商瞿，戚戚然以無子爲慮。先生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先生素方嚴，忽作謔語，其人愕然問故。先生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欲而無天理，今人年過四十，便有爲祖宗締血氣意，將天理攙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熾，難以成胎。而且以人奪天，遂爲造物所忌，子不見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養由基之射，一發一中，百發百中，是何故哉？蓋禽獸無生子之心。爲陰陽之所鼓盪，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謂此無關乎天理人欲也，斯卽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不貳則誠，誠則有功，吾人當求學之時，不可存有國家之念，猶如吾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余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則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可以得眞學問。」

大漢閣主章太炎

章先生名絳，字炳麟，又名枚，號太炎，別號末底，又號末公，別署大漢閣主。

在從前帝制時代，讀書人中每個都有「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的功利觀念的。但是，生當同治年間，章太炎，却一貫的反對束縛思想的科舉，和剝奪人民自由的牽制，他雖是曾任提督河南學政俞蔭甫（曲園）太史的高足，然而他的行徑却絕對不同翰林、進士的路子上走。他並不以書本爲敲門磚，

而純從學術的觀點出發，把一切古書作爲攷據的工具，一方面以文字鼓吹革命，在國內不容許他居住時，便亡命到日本（由台灣轉日本），在那裡，認識了孫總理，並創立了一個支那亡國兩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時爲光緒廿八年。）

清光緒廿九年五月，他自日本歸國，與鄒容等組織愛國學社於上海，鄒容寫成一本「革命軍」，太炎爲他作了一篇序。事爲清廷所知，便密電江蘇督撫，轉飭上海道。照會會審公堂，出票拘人。他的名字，和鄒容，陳吉甫，錢允生，龍積之，陳叔疇等，均被稱爲「偽作革命軍匪人」，時陳吉甫已聞風赴日，事先曾勸他同行，他却毅然加以拒絕，並且說：「太炎非畏死者，革命乃伸張正氣，萬死不辭也。」又說：「革命流血起，流血從我起。」結果，被捉入捕房。爲了這件事情，還特地組織了一個「額外公堂」，由上海道參加會審，當時律師的起訴書裡，有這樣的幾句「……如鄒容、章炳麟；照法律治罪，皆當處決，今逢萬壽開科，廣布皇恩，按照擬減，定爲永遠監禁。」但當時人民對於清廷這一行動，大爲反對。領事團也力持異議，不得已乃移京（北京）交涉，至翌年三月，才改判「鄒容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罰作苦工，期滿開釋，驅逐出境。」

他在獄中度了三年的歲月，叫醫生去做苦工，這當然是不能的，於是地方官也只好讓他去讀書。三年光陰，轉瞬已屆，臨出獄的當兒，他還說了幾句笑話：「現在要出去了麼？在這裡也可以讀書呀。」他的朋友鄒容，因年少而不耐辛勞，於一年半之前，竟病死獄中。

民國成立後，許多人請他出來做官，他一概謝絕，唯以研究學術爲樂。至民國三年正月，他應共和黨人之邀入京，時袁世凱秉政，頗有改共和爲帝制之意，以太炎負一時重望，恐其號召反對，乃聘爲公府高等顧問，意在箝制他的言論。太炎不顧，於是派兵監視，次年二月，遂被軟禁於故都龍泉寺。他焦怒異常，以枚擊碎器物殆盡，又欲焚其屋，禁守人奉其命，謹避之而已。

太炎在被禁時，以爲沒有恢復自由的希望。便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他的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曾提到這件事：一件是「我死了之後，國粹便中斷了」，一件是「先人窀穸未安，爲莫大憾事」。直到袁世凱將死，才得釋出。

他一生都埋首在古書堆裡，他不但主張作古文，而且主張寫古字。所以，他的男女公子的命名，都是怪特，把自己一部著作「國故論衡」，却題了「或古俞魚」四個字。

他晚年住在蘇州公園路，當局敬仰他的道德學問，便補助他萬元錢，他把這筆錢辦了個章氏國學講習會。後來又召集了幾個門人，從事研究工作，出版了一本「制言月刊」。太炎作古後（他歿於廿五年五月十九日）。他的弟子們爲了紀念老師起見，特創了一個太炎文學院，院長就是太炎的夫人湯國黎女士。

章太炎「在昔錄」

國學大師章太炎，夙有「瘋子」之稱，蓋因生性耿介，不爲權威所屈服，項城稱帝，太炎在滬，常發表反袁文字，報章轟載，袁恨而畏之。共和黨鄭某，胡某，陰受袁賄賂，於黨中集會，謂黨勢孤危，不如請太炎先生來京，主持黨事，即席通過。共和黨者，武漢革命團體民社中人，民二時，反對三黨合併之進步黨，宣告獨立，推黎元洪爲理事長，太炎爲副。未一月，太炎果抵北京，寓化石橋共和黨本部，祇往晤元洪，袁遣人相招，不應也。袁命陸軍執法處長陸建章，派憲兵四名駐黨監視，名爲保護，意在禁止出京，并監禁其言論；凡共和黨往來文件，均加以檢查，一切自由盡被剝奪。

某日太炎應鄭某之宴，乘馬車出門，憲兵隨登車前後夾護，初未注意，讎畢回寓，夾衛如故。太炎疑，問吳宗慈及張亞農，未便實告。次日再詢鄂人胡培德，胡笑曰：「此爲袁世凱派來保護者。」太炎大怒操杖逐之，憲兵逃，太炎冷笑曰：「袁狗被吾逐去矣！」憲兵以命不敢違，改易便服，不使太炎知之。

太炎居黨部右院斗室中，朋儕過從極少，所與談心者僅三數人，上天下地，無所不談；談話既窮，繼以狂飲，醉則怒罵，甚或於牆壁遍書「袁賊」等字以洩憤，時或堆在一起焚燒，大呼曰：「袁賊燒死矣！」罵倦則作書自遣，大篆小楷行草，堆置案頭，日若干紙，黨中同志欲得其書者，則令購

宣紙易之，派小僮一人主其事。

一日，陸建章派秘書長秦某，（前清翰林）求見太炎，謂：「敝總長（建章部下均稱之爲總長）奉大總統命，知章先生居此，慮供應缺乏，有所奉贈。」隨探懷出銀幣五百元置書案，太炎遽起立，持幣擲案面，張目叱曰：「袁奴速去！」秦某乃狼狽而還。

黎元洪恐太炎鬱抑無聊，商所以安慰之策，問太炎在京願作什麼事，經費可負責，太炎表示願組考文苑事，元洪與袁世凱商量，年撥經費十五萬元，太炎開列預算堅持非七十五萬元不可。袁允經費可酌增，但不必如預算所列，設機關辦事，換言之，即予以一種名義及金錢，示羈縻而已。太炎堅持要設機關，實際辦事，雙方談判，終告決裂。

黨中同人，最後商允太炎講學。「國學講習所」尅期成立，講堂設黨部會議廳之大樓，報名者紛至沓來。講授科目爲經學，史學，玄學，子學，每科編講義。講學不及兩月，聽者得意，而太炎有倦勤意，與左右商出京歸滬事，時偵騎四佈，不能獨行，設詞阻之。太炎怒曰：「吾知君等籌措大，慮無資斧，吾早有準備，只需一人送吾至天津，登日本輪可也。」旋啓衣篋，出現幣八十元，衆皆語塞，出京之議遂決，太炎留管，親擬電稿，致夫人湯國黎女士，以前夫人來函，閱竟投火爐中，不作覆，漸並不聞。某次夫人函述黎公有函致袁，囑命其來京相聚，并謂此將以君爲餌，但吾決不來，望君堅其志節，無以家室爲念。湯夫人固亦深明大義，善相夫子者。

決議出京之翌日，黨部同人，設筵爲餞，並知出京必被阻，相約縱酒狂歌以快車表。到京奉車站，已空其無人，太炎命移行館於六國飯店，陸建章陰奉袁命，送至龍泉寺軟禁。太炎初絕食數天，王揖唐婉言相勸曰：「袁氏之奸，等於阿瞞；先生之名，過於正平，所以不敢下手，不願千秋萬世後蒙殺士之名。先生自願餓死，袁既無殺士之名，又除心腹之患，先生爲袁謀則善，其自謀何疏！」太炎鑒然起立曰：「然耶？」趣以食進。居數月，建章頗以爲苦，說袁將寬其禁。時元洪亦代爲調解，乃得由龍泉寺移居錢糧胡同徐醫生寓所，并爲之調理身體。

丙辰六月，洪憲敗亡，元洪繼任，太炎始出厄回滬。其心腹送之車站曰：「願先生勿忘在莒」。太炎點頭稱善曰：「綜合兩年來情形，纂『在莒錄』，聊以備忘，也是好事。」於是「在莒錄」二書，由其心腹吳劉二君著錄。

章太炎龍泉寺縱酒罵袁

國學大師章太炎，生平軼事至多，而於洪憲稱帝一役，被袁世凱幽囚於北平龍泉寺，最初袁氏之意，以先生名聞海內外，倘得其一言贊成帝制，則勝獲萬人發言擁護也。於是派人誘先生於龍泉寺軟禁寺內，派士兵一隊駐寺，名爲保護，實則監視，行動不得自由。

先生既至龍泉寺，知受袁氏之騙，乃縱酒大罵袁氏，輾轉殃民，并不絕口。袁氏雖跋扈，但不敢

侮辱，酒食供應無缺。先生被禁於龍泉寺之第二日，袁氏派其次子克文送錦緞被褥至，但長懷先生正義凜然，不敢見面，只藉士兵將錦緞被褥送進室內，先生感到奇異，率帷一看，發覺有人在窺縫偷窺，赫然爲袁氏次子克文，先生乃以火燃點香烟，將被褥燒成許多洞穴，爰爰如貫珠，然後擲於窗外，叱囑曰：「歸告汝父，勿發皇帝夢，吾生平不受人憐也！」義正辭嚴，袁子羞慚而去。

袁氏稱帝，一意孤行，乃組織安會，偽造民意，紛紛勸進，日有數百起，先生在龍泉寺聞之，索紙筆，疾書盈尺大字曰：「袁賊速死！」懸於壁上，以表示自己心跡，決不附和袁賊所爲。

未幾，蔡鐸起義於雲南，全國紛紛響應，袁氏知民意激烈反對，大勢已去，憤而患病，寢且作孽自斃。袁氏既死，先生重獲自由，出都抵滬。民國六年夏，聞國父率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護法，先生乃由滬來粵，迨國父被選爲海陸軍大元帥，先生一度被任爲大元帥府秘書長，晚年講學蘇州，淡泊名利，民國二十五年，病逝於上海。

章太炎二三軼事

章太炎，記其軼事者甚多，我今寫其細微而幽默者數則。

太炎在蘇州任東吳大學教授時，與黃摩西同居，黃亦東吳教授，常熟人，其貌甚怪，兩鬢短髮蓬蓬，披散項間，戴一深度近視眼鏡，但其學問甚淵博。太炎與之交甚篤，寓居在葑門內之螺絲橋，以

其與東吳大學相近也。兩人都無家眷，常剪燭深談，不知東方之既白。一日，太炎自東吳歸，倦極，急思歸眠，乃誤走鄰家之室，彼視爲與己室無大異（同爲平屋），牀之地位亦相同，即擁榻而眠。孰知此爲鄰婦之室，方出外購物，歸而見之，大譁。幸鄰里有識章先生者（背後呼爲章瘋子，然頗敬重之），呼之醒，護送其歸，而太炎尙茫然，說：「我方酣睡，何必擾人清夢？」

一日，黃先生已回常熟，而章先生與一鄉下人在吵架，嗷嗷不休。章先生說話，蘇州人本聽不大懂，而鄉下人的粗魯的話，章先生也聽不明白，這鄉下人是個薙夫，黃、章兩人的馬桶是他倒的，此次要取月費，而月費向由黃先生管的，章先生不管此事，所以爭吵。他常穿一件不僧不俗的衣服，束了髮，沒有辮子，手中握了一柄團扇，衣冠都不大修整。有一次太炎到時報館，來訪狄平子，穿了一件西湖色熱羅長衫，金黃色杭緞馬褂，白襪玄履，煥然一新。那是什麼時候？正是與湯夫人結婚的前夕哪！

袁世凱厲行專制，太炎反之，且參加二次革命。一直到民國五年世凱病逝才恢復自由，他被囚龍泉寺時，以恨世凱之故，拒絕宮廳供應，自己掏腰包開銷火食。但不久後錢吃光了，便擬絕食。世凱聞知，不想負起殺害讀書人之責，就吩咐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設法開導，吳炳湘與一姓徐的醫生商量，把太炎遷至徐宅，俾徐某就近爲他醫病，其實即是暗中監視。到徐宅不久，又再移錢糧胡同，一直住到民國五年。太炎在龍泉寺擬絕食未成，但到了錢糧胡同却絕食了幾天。

錢糧胡同新居，是太炎租下來準備迎他的新夫人湯國黎女士北上的，後來又發電報止她北來。這是民國三年夏末的事。過了不久，寄居在他家裡的學生黃侃被警察驅逐出外，太炎以自由完全給袁世凱剝奪，憤而絕食，大概絕食有三日左右，他的學生及無政治色彩的朋友還可以進去看他。

馬叙倫和太炎誼在師友之間，一日早晨八時，馬叙倫去看太炎，這是他絕食的第三天。馬叙倫勸他復食，用種種方法來開譬，他都當作秋風過耳。太炎還引「呂覽」養生之言曰：「飢生不若死」。馬叙倫又再委婉譬喻，一直到傍晚，乃涉及理學學言，太炎似有回心轉意了。到初更時分，馬叙倫看出他有復食之意，就乘勢說：「我來了整日，一點東西都沒有吃過，現在餓得很，你陪我吃點東西好不好？」太炎首肯。馬叙倫便叫工人吩咐廚房煎兩碗雞旦，煎好後，太炎吃一碗，馬叙倫那一碗不吃，又把給太炎吃了。馬叙倫看他吃過後才告辭，第二天章太炎復食的消息便傳遍九城矣。這件事，十八年前在上海時，馬叙倫親口對人說過的。

章太炎一生絕食共有三次，但實行絕食只二次，第一次是他被禁上海西牢時，憤外國獄卒之虐待，絕食數日表示抵抗；第二次欲絕食而未成，第三次絕食了三天。

郁達夫的「快短命」

郁達夫的生平及軼事，許多人談過了，但這一件未為道及而却有趣的，是他「快短命」的演繹。

當陳懷主閨，鄭貞文長教育廳長的期間，郁達夫曾到八閩遊遊一次，福州新聞文化界震于他的文名，乃邀他作一次學術性的演講。

他一回會就跑到講壇，在黑板中先寫了三個大字——「快短命」。那時台下擠滿了聽講的人，看見了這三個大字，面面相覷，又不敢發笑，只有等待這位不羈之士發表妙論。原來他寫了三個字後，停了兩分鐘才下台發言，誰也沒有料到他說得很輕鬆的短短數句。他說：

「本人今天所要講的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概念，就是這三個字要訣：快——就是痛快，寫得快；短——要精簡與扼要；命——不離題，詞達意。

說話和作文都是一樣的，如我現在所說的，就是這個原則。不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或者是纏腳布，那樣又臭又長，完了。」

台下一陣掌聲過後，有人算算前後合計不過五分鐘，正是最短的演講，切合他所講的又快又短的原則。這位浪漫不羈的文人，未到四十歲就死了，有人說他是「快短命」的預言和讖語。

蔡元培的婚姻

蔡元培曾結過三次婚，除第一次是在舊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完成外，這位夫人不幸早逝，致蔡元培有第二次結婚，第二位夫人也早死，又有第三次結婚，在他第二第三次結婚，却是自主的，他

的選擇結婚對象，另有條件，值得爲今天的青年人參考。

他在第一任夫人逝世後，于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三十三歲的時候，與江西黃爾軒的女公子仲玉女士論婚，那時黃仲玉女士自幼好學不倦，多才多藝，但待字已久，標梅已過，蔡元培以自己係續絃，不嫌其老，因提出徵婚條件如下：（一）識字，（二）不纏足，（三）男子不娶妾，（四）女子在夫死後可再嫁，（五）夫婦意見不合即離婚。黃仲玉女士對這些條件都適合，遂由葉祖卿任介紹人，訂婚禮即於杭州舉行婚禮，婚禮中以孔子二字紅緞代替了三星畫軸，於結婚之午，開演講會代替了鬧新房，上述那些條件中的「再嫁」和「離婚」，及結婚開演講會等，在五十年前都是最新的舉動的。

但是，蔡元培自與黃仲玉結婚後二十年，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黃仲玉又病歿，蔡不勝悲悼，留下許多悼亡的文章。隨於一九二三年，行年五十三歲的蔡元培又娶蘇州周峻女士爲妻，周峻女士是愛國女校的學生，可說是蔡元培的及門弟子，曾任教於安徽女子師範，上海神州女校。由杭州徐珂夫人何墨君代媒，於是年三月訂婚，七月十日結婚於蘇州留園，婚後相偕出國，周峻女士在德國漢堡研習美術，很有心得，不久返國，又在國民政府特任爲北平大學校長。

蔡元培晚年事業，得其夫人周女士協助很多，而且閨房之內，酬唱不絕，直至蔡氏在香港逝世時，還是這位夫人陪伴着的。

林森典守印信

林子超（森）任國府主席時，已年逾古稀，正當外侮日亟之際，常自言典守印信而已，惟其素性恬淡，與人無爭，所服常一灰布長袍，黑鞋布襪，狀如三家村之冬烘先生，其時閩錫山馮玉祥，亦力倡儉儉，往往舊衣敗履，周旋於廊廟之中，幾成風尚，但馮氏到南京後，眼見黨政中人，以爲多習於奢華，出入必有華貴之汽車，馳驟大道，衆人辟易，馮氏則每赴國府及各部會，與盛大之叙會，必乘一簡陋之貨車，雜於各一羣名貴汽車之中以爲諷刺，對於某市長夫人，穿價值數十元一對之絲襪，尤不惜當面諷諍，報章傳播，舉國皆知，論者乃指爲馮氏與林氏閭等同是力倡崇儉，但未免過於矯揉造作，抑有意諷刺他人以爲快也。

林氏典守印信，其閑靜之志趣，而不爲繁雜之環境所搖動也。茲錄其詩如左：

竹院敲棋

滿園綠葉任風吹，長夏宜遇客奕棋，一局輕敲聲的的，千竿斜曳影離離，氣高合讓洪圖種，人俗還須君子醫，靜坐幽篁堪避暑，盤桓不覺日斜西。

松下納涼

炎司施政費方長，赤日當空火傘張，緩步園林神澹逸，潛身松菊樂徜徉，閒看塵世人何俗，靜聽

清聲意亦涼，避却炎威勝勝境，此情也可比羲皇。

柳蔭垂釣

閒來垂釣柳蔭邊，好趁斜陽雨後天，碧藻重重魚隊隊，清風拂拂水涓涓，靜看藻漾生機活，默聽
尼山道念堅，一曲漁歌一篇詠，歸來看我也如仙。

荷塘晚步

金鳥斂翅下西簷，晚景清幽映眼簾，青草一池新漲滿，荷盤萬柄翠痕添，管來雪藕情猶戀，看到
蓮花意亦恬，洗却俗塵兼俗慮，滿懷氣餒不知炎。

江東才子楊雲史賣花瓶

楊雲史，名圻，別署野王，江蘇常熟人，清光緒壬寅南元，曾官郵傳部郎中，新加坡總領事，天才橫溢，詩文並茂，有江東才子之目。民國十二二年間，入吳佩孚將軍幕府爲秘書長，吳極器重其才，雲史事吳亦誠恪，私人閒談，輒稱吳爲「主公」而不名，故賓主之間，復無間言。民國十三年直奉戰起，雲史將隨吳赴山海關督師，瀕行其夫人徐霞客忽病歿，匆匆殯殮，卽舉家從行，因有「可憐九月十三夜，死別生離第一宵」之句，傳誦一時。雲史既至山海關軍中，時方大雪，嘗賦詩十二首，悲壯淋漓，極富唐人風味，今摘錄其四首云：「盤馬彎弓首落肥，金湯大好啓戎機，雪花如掌陰山

曰，不照金樽照鐵衣。」「逐鹿中原舉國空，邊軍力盡更張弓，黃金白骨知多少？都在營州落照中。」「九合諸侯事惘然，三分猶得靖烽烟，江流不限南風競，門外津橋啼杜鵑。」「層臺美酒飲千鍾，日落清歌欲盡胸，醉裡未忘關塞氣，玉人扶定看盧龍。」後吳在山海關兵敗，雲史亦有詩紀其事，記有句云：「昨夜盧龍城上月，五更猶照廢營來。」刻畫大軍撤退後景象，使人讀之黯然！雲史所著詩，名江山萬里樓集，五言詩極似老杜，憶其咏促織云：「亦知生世晚，物候已收蟬，池閣燈如水，關山雲滿天，數聲星欲曙，一客夜爲年，辛辛苦何急，宵征孰爾賢。」弦外之音，極堪尋味。江山萬里樓詩集，抗戰前，流傳至廣，大江南北閨閣中，亦多誦其詩，故有「一自新詩傳衆口，家家紅粉說楊圻」之句。雲史不惟善詩，所爲聯語，風格亦絕高，吳佩孚在北平逝世，雲史於誄詩外，曾有輓聯云：「本色是書生，未見太平難瞑目；大名垂宇宙，長留正氣在人間。」以彼與吳關係之深，而無一字涉及私情，可見其立言得體。段祺瑞卒時，雲史亦有輓聯云：「佛法得心通，知並世英雄，成敗一般皆盡餅；人間誰國手，數滿盤勝負，江山無限看殘棋。」蓋段念佛好棋，故以此悼之而兼喻世局，彌有無限感慨——雲史元配，爲李鴻章女孫，繼配卽徐霞客，晚年奉狄美南，情好頗篤。民國卅五年歿於九龍。薄儀結婚，那時候吳佩孚正在洛陽雄視一時，派他入京恭賀。這個「宣統皇帝」居然以「舊君」之禮召見「舊臣」，還「賞賜」了很多珍物給他。抗戰後楊雲史逃難來香港，這些「珍物」所餘無幾了。雲史死前一年，拿出故宮的寶物——花瓶一件，要賣好幾萬元。

戴季陶信佛

戴氏篤信佛理，時作出世之想，每對人言，婆娑世界，有何可戀，日形役於政海中，遠不及隱逸之士之悠然自得，而世人紛紛逐於其間，殊不可解云，其言蓋有感於當時政海之情形而慨乎言之。故其再度受任爲考試院長時，絕少到院，一切悉由副院長朱家驊代理，旋移居洛陽附近之村落中，日與牧童樵夫山僧野老相談笑，態度和藹，而喜對人演講革命故事，娓娓動聽，戴氏每出，村人輒圍聚其旁，聆其演講不忍去，戴氏亦隨而樂之，謂勝於徵逐酬應於朝市中也，暇則默坐靜室，彈琴閱經，每謂此樂不足爲外人道，居洛陽時，於其太夫人誕辰，假洛城內長壽寺，延僧人誦經，追悼先人，復大購鰲魚烏鯢之屬，實行大放生，治市業此者，廣爲搜羅，獲利倍蓰，於是洛人更稱頌戴氏之仁孝，惟亦有人以其身任考試院長，而放棄職務，作此消極之舉動，既不躬任院務，又不辭職，不無可議云。

戴氏在粵時，曾休息於白雲山能仁寺，時有僧人三名，侍戴氏甚敬謹，戴氏感其誠，以山上白雲寺荒廢已久，勝蹟蕩然，至爲可惜，因擬重建山門，送使該僧等三人，主持重建事宜，爲分函各機關團體要人名流，請求佈施，王成善舉，至於廣州一羣居士，承戴氏之美意，集衆成立重建白雲寺籌款委員會，以居士何某主持其事，三僧人則負監理之責任，從事募捐，得款數千元，乃先建兩楹及山門，以資觀感而昭信用，不料以眼目之故，居士和尙，發生意見，至於函電相指摘，至今廣州市政府亦

派員澈查，使和平解決，此民二十年秋間事也，於是人又有以「磨起袈裟事更多」觀之者，謂學佛而真能空悟一切，會有幾人，一時成爲社會話柄。

又廣東法科學院，設於光孝寺故址，該院院長某氏，爲擴充校務，乃將該寺原有之十八羅漢堂，闢作學生宿舍，堂中原有泥塑佛像十八，鑄於地上，甚爲堅固，不易移動，匠人掘地數尺，始搬出堂外，稟於院長，請示如何安置該十八佛像，院長固所謂新人物也，有新思想，反對迷信偶像，因謂匠人曰：如有人承購則賤售之，否則碎之作建築工料可也，事爲佛教會中人所聞，臨時召集會議，飛函該院長，請尊重佛教，及保存古物，勿將十八佛像毀棄，如院中無地收藏，則送該佛教會代管，亦未爲不可，而該院長未卽答覆，佛教會恐十八佛像，終不免遭於劫，遂聯合會友趨謁西南政委會委員，請求代請某院長轉囑，某委員云：初時政府設法政校於該寺，因無適當地點，不得不權宜在該寺設立，今又欲擴展院舍，而將原有佛像毀棄，似可不必，在信教自由之下，信佛教者甚衆，古物固宜保存，毀棄佛像，亦恐招物議，乃咨由高等法院下令該校，着永遠保存該寺所有一切古物，於是該院長不得不另擇一室，將該羅漢佛像十八尊，妥慎移置，爲之保存，此皆佛教會之力，而戴季陶氏對於此事，亦與有力焉。

王湘綺的周媽

我們讀「王湘綺日記」時，常常見他提到他的女傭周媽。一般印象，以爲她是一個老嫗。後來聽人談及，這個周媽，相伴湘綺二三十年，漸亦衰老，但在初來侍奉的時候，也還年青。當王湘綺最初到四川成都某一家書院做山長的時期，便要物色一個女傭，他那時是帶了他的太太去的，名義上是要一個乾淨伶俐的女侍，爲他的太太分勞。

因此有一位書院月課生，便介紹了這個周媽來幫傭。這時湘綺是五十歲左右光景，而周媽僅不過二十多歲，她是成都本地人，已是一個寡婦了。說乾淨的確是乾淨，說伶俐可能是伶俐，眉毛也會說話，眼睛却能傳神，除了會做針線以外，還識得幾個字，更配老頭子的胃口。這時候的王湘綺，見了她，便似泥菩薩跌入湯羅裡，酥醉了。

但那時王湘綺的太太，還在成都，關防嚴密，他也不能蕩檢除閑。恰巧那一年，他們的女兒出嫁，要回到湖南去，湘綺不能回去，而他太太非回去不可。也想帶了周媽同去，作個調虎離山之策，但是周媽不允，而湘綺也不放，他的夫人，只得含恨而去。其時有人做了兩首詩，記此事道：

花容憔悴月痕低，打起黃鸝不許啼。記否酒酣私語處？桂堂東畔畫樓西。

風流恰似卓文君，司馬新愁亂若雲。郎自吟詩儂繡扇，錦江春色已平分。

後來他的夫人故世了，老頭子要想把周媽正位中宮，可是他的兩個兒子不答應。不過當時周媽的名氣已經很大了，老頭子到東到西，一定要帶了她；有人請客，也要連帶請了周媽；他到北京，坐了馬車拜客，也有周媽，親筆寫了一個名片道：「王氏侍備周媽。」

畢倚虹生財大道

三十三年前，紅遍上海的一個小說家名叫畢倚虹。他的舊學根柢很好，詩詞也下過點功夫。他所寫的長篇小說頗通俗，爲上海小市民所喜，他也寫短篇小說和散文、詩詞也寫。

他是江蘇儀徵人，在中國公學習法律時，名叫畢振遠。二十多歲，就在滿清政府裡當過小京官（宣統三年全國官員名錄中還有他的名字）。一九二三年九月，他又在上海以畢振遠之名掛牌做律師。不過生意不好，還不及他賣文收入之多也。一九二三年到二六年，他主編時報副刊「小時報」一部長篇小說「黑暗上海」登了四年還未完（一九二三年六月起登至一九二六年四月死，中斷）；登在「自由談」的長篇小說「人間地獄」五年了，也沒有完。三十年前在上海賣文而能買汽車的，只有他一人，可是他的生活太過糜爛了，弄到債台高築，終於窮困而死，還是很可惜的。他最喜歡結婚離婚，直到他最愛的一位太太汪女士死後，他和繆女士結婚，才不擠這一套。一九二四年十月，汪女士死於上海，年只廿二歲，倚虹在壽聖庵設奠，一班文人所送的聯多刊「小時報」上，包天笑聯云：「萬轉

千題，寧爲才子婦；廿年一夢，覓此女兒身。」

蘇曼殊非日本種

蘇曼殊天才橫溢，如天馬行空，世人以其歌哭無常，年少出家，遂懷疑其身世曖昧，謂爲日本種而隨母下堂者，凡讀其著作「斷鴻零雁記」及「日僧飛錫潮音跋」者，益信其爲書中人而有難言之痛。其實此皆臆測之詞，非曼殊真面目也。按曼殊之父，名傑生，香山縣人，早歲至日本，在橫濱英商茶行任買辦。時吾國僑日工商，大都好與日婦同居，日久感情融洽，形同配偶，生子後尤爲密切，亦無所謂嫁娶。傑生居日既久，自難免俗，曼殊之母，即從此習俗而與傑生同居者也。母曰瓦仙，系出日本河合氏，與傑生同居後生曼殊，曼殊生後十一年，而甲午中日戰起，傑生乃携曼殊母子返粵。越四年，傑生家道中落，遂使母子東渡，依其親屬林氏以居。次年曼殊卽入華僑所設大同學校讀書，刻苦自勵，學業大進。壬寅入振興學校習陸軍，癸卯歸至香港，旋即變爲僧。自是漫遊上海、蘇州、杭州、江寧、長沙各地，日與革命志士相往還，兼爲上海各報撰文，由是文名大振。觀此，則知曼殊非世人所傳日再嫁婦之油瓶兒也。

蘇曼殊醉臥道中

戊申年間，（一九〇八年）爲國內革命運動將近成熟之期，海外僑胞，受了黨潮激盪，紛紛響應，旅居惹班埠華僑黃水洪等，爲了擴大宣傳，和國內革命團體及南社互通聲氣，早就聯絡了幾位朋友，秘密組織「惹班特別通信處」。水洪是惹班中華學校校董會中一位中堅份子。一九〇九年，教習許紹南，函託南社徵聘教席，南社舉荐了陳滄海。滄海又轉介紹蘇曼殊。是年冬，曼殊才從日本到爪哇，主講惹華。及至一九一壹年上半年還日本，暑期後，又重渡爪哇，此時三寶壟中華學校，欲以重金禮聘他，但是爲了心念義母、好友、門徒的情誼，不願離開惹班，謝絕其聘。

曼殊底義母，就是黃水洪的母親黃會氏，她雖是僑生婦，然而她的言談，以及待人接物，一望而知其完全祖國化，年已六十餘。她對於曼殊常常思念着，說阿瑛（曼殊名元瑛）是個性情純厚，文雅多情之士，這一段母子之誼，是由於曼殊體弱多病，生病的時節，水洪以友誼關係，盡心來照顧他，從密切的友情，加以受了這般恩惠，在曼殊想得很不過意，所以才和水洪同樣的稱呼黃會氏。

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一年主講惹華時代的朋友，要算最知心的首推黃水洪；他如張烈，鄭元明，黃紅潯，也算是他的好友。同事中較有關係的，有許紹南，周繼藏，接近的門生，有黃火炎，曾金龍，楊琛，黃鸞娘，蘇金英，林璇等。

水洪原籍福建思明，生長於惹班，幼年曾回國求學廈門，是曼殊的好友兼是義兄，常以金鋪資助。他曾得曼殊贈詩一首，手簽英文姓名的絕版「潮音」一冊，西裝相片一幀，以及曼殊於一九一〇年在日本同他底老母和姨母的合照。

張烈字震雷，浙江溫州人，爲爪哇龐引埠中華學校教師。一九一二年春，與曼殊會晤，而又相別於泗水的時候，曼殊有感成絕詩一首：「東裝歸省，道出泗水，會故友雲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定是歸；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

黃火炎是曼殊的學生，也是他的義弟，（水洪的弟弟）。曼殊出入，他老是跟着他一同跑，很受曼殊疼愛。他們合拍了兩張像，其一就是贈給蕭頌秋，經過曼殊筆題的：「宣統二年，同季弟泗水埠造相一幅，時予也爲惹班埠中華會館英文教習——蘇元瑛記。」

楊琛，黃鸞娘，蘇金英，林璇四位，都是曼殊的女弟子，鸞娘是火炎的姐姐，同時也是他的義妹。蘇金英，福建龍溪石碼鎮人，生長於祖國，聞之曾金龍云：因爲她和曼殊同姓，所以很得蘇先生的喜愛，他曾繪贈孔雀圖一幅，她藏有曼殊手寫國文鈔寫封面二幀，經曼殊填改的國文鈔寫一頁。

曼殊於一九一一年夏，二次南渡耶婆提仍主講惹華，越年，他的同事們都要還祖國來，他覺得從此寂寞，就也要打算回去。可是囊空如洗，旅費沒有着落，本來該校有種規定，教職員任職滿三年，校裡便發給一筆三百盾的回國川資，曼殊雖然還沒到三年，幸虧校董中那位中堅份子黃水洪，破例兒

也給他三百盾銀。他偕同義弟火炎去泗水買船票，誰知到了船公司，要拿錢出來的時候，才發覺鈔票已經不翼而飛了。可是他絕不介意地，同義弟回去，朋友和同事們，問他船票訂定了沒有，他總是含糊答應，後來才曉得他的三百盾不知道丟掉到什麼地方去了。於是水淇和紹南兩個人，又向他的朋友和同事們，籌款給他作旅費，大師始得成行。

曼殊最愛吟這兩句詩：「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會題在原版「潮音」第六頁底裸體石像的六面。他底學生會金龍曾說過：蘇先生常常把這兩句詩掛在口裡吟哦着，不論何時何地，都很容易聽到，就是在教室裡上課當中，倒也吟起來，並且在書本上也題上去。

大師性嗜杯中物，但不善飲，他差不多每天都跑到水淇家裡，喝幾口酒去。有一天，水淇替友人祖錢，曼殊是陪賓之一，這晚他特別高興，開懷暢飲，席還未散，已帶有十分醉意，於是告辭友人，說要回校裡睡覺。大家恐怕他在路上發生危險，要跟他跑，他都婉詞拒絕，朋友不好太強他的意思，唯有聽他的便。過了一會，水淇越想越不放心，便一路跑來看他怎樣，走不幾步，看見曼殊橫臥一家商店的門外，呼呼的睡覺了，才扶他回去。這一樁事，當一九一〇年曼殊在惹華致高天梅書中，有過這幾句話：「……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唯此一段笑話耳。」

國人在公教最高地位的陸徵祥

考公教傳播我國，業有多年，我國人士信仰公教者亦多。我國人信仰公教而膺崇高教秩者以陸徵祥氏爲最。徵祥滬人，生於一八七一年，字子興。家境清寒，以苦學進上海方言館，八年後入北京同文館，習法文，遷駐俄公使嘉興許文肅賞識，調爲使館翻譯員，並時加訓導。用是深知外交機微。後乃積資歷升爲駐荷駐俄等國公使。這民國成立徵祥被任爲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部長，且曾一度任國務總理職。以爲書生而不次超升，位至行政人員之首，不能不謂爲苦學奮鬥之有成也。願徵祥雖頗重中國文化，惟獨違其師許文肅意與比鄰女培德女士結偶，女士信公教，浸染甚篤。徵祥其時雖信誓反教，然以伉儷情深，每以愛妻之言爲重，且夕薰陶，影響漸深。卒於一九一一年在聖彼得堡望加大利納堂懺悔前非，補行洗禮，正式改爲羅馬公教信徒。夫妻一致，信仰更深。培德夫人身體素強，惟以積勞，竟於一九二六年先徵祥逝世，先，培德夫人病重，徵祥會毅然聲明：「若夫人去世，必擇公教之最古修會，進會作修士。」夫人既歿，徵祥履行誓言，遂摒棄一切，進入聖本篤會爲修士。本篤會戒修森嚴，重謙和，喜恬淡，修士均誠樸勤勞，徵祥年老體弱，且新喪妻，吃苦更深。願徵祥矢志弗渝，初入修士練習班，且夕查經祈禱，矧以年逾五十六，又曾任國家最高大員，而仍與青年修士同列，白髮與紅顏相並，益促其奮勵之心，卒成爲正式修士，至一九三五年，更晉升爲司鐸，司鐸之

職，意義爲耶穌之替身，當徵祥領職時，主禮者會高聲唱誦：「余已不呼與爲僑，蓋予於爾輩中所行者，汝俱已知之矣。汝其承受聖神於汝心，是乃吾父所遺與汝者，汝其謹守吾誠，俾常作予之友。」又授以赦罪之權，曰：「凡汝所赦者赦之，凡汝所不赦者不赦。」於是，徵祥遂成爲公教司鐸，在教中地位，可謂極崇高也。一九四六年，教宗復任命徵祥爲比國剛城聖伯鐸祿醫院榮譽院長職，職雖爲銜而非領實職，然足見教宗對徵祥之重視，且授以權杖指環曰：「謹授以神牧之權杖，以之示託爾之衆徒。汝於懲戒時，其勇毅嚴肅；汝忿怒時，其勿忘謙和慈祥。」又曰：「謹授指環，是乃忠信之證。汝其身被諸德，於天主之淨配聖教會，勿稍有沾污。」徵祥敬誠率領，初本有志回國建立一聖本篤修會，卒以病逝未果其志。願在公教中，確爲國人中最具崇高之地位者也。

潘光旦與葉德輝

一般人談起性的問題時，常會提及美國的金賽博士。二十多年前，張競生大談性學，哄動了一時，當時他的名聲，比今日的金賽博士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是以在中國而言）。但潘光旦却說：張氏一面利用霍理斯做幌子，一面販賣別人的性經驗，認爲是「野狐狸」的行爲，不足道的。

潘光旦本是研究人文生物學的，性的問題雖可說是包括在此種學問範圍之內，但潘氏爲什麼特別向這方面有深入的發展呢？原來他自幼就「好此道」，並且得到他父親的指導與鼓勵的。據說：他年

青時，對有關性愛的書籍已看了不少，有一次，他父親到日本去，回來時携了一本日本醫生所作的關於性衛生的書給他，說這是他應該看的書。幾十年前，做父親的把有關性的問題的書本給年青的兒子看，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我們由此可以推想，大抵潘光旦的父親也是「好此道」的吧？這樣看來，性的研究原來是潘氏的「家學」，無怪他後來能有這樣的成就了。（潘光旦撰有「性的教育」、「性的道德」，並譯註霍理斯的「性心理學」等書）。

葉德輝也是近年來對性的問題有研究的人（當然也是以在中國而言）。葉氏是一位怪人，他藏書甚富，不經以示人，在書棚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却校刻了不少舊書，有許多中國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秘辛等凡十數種，他都翻印過，特名之曰「雙梅影閣叢書」，潘光旦對於張競生出版「性史」表不滿，但對於葉德輝的「雙梅影閣叢書」却不然，認為這類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見潘光旦譯註的「性心理學」三六三頁）

但是，「性史」這書差不多每個人都知道，讀過潘光旦的譯著的人則較少，讀過「雙梅影閣叢書」的人則更為稀少了。

張國淦棄官

張國淦今年應是八十三歲了。他是湖北蒲圻縣人，前清進士，清末任憲政編查館館員，入民

國，做過黑龍江省長，教育總長，司法總長，農商總長，國務院秘書長，而農商總長，他當過三任，教育二任。從他的民國官歷看來，他做個老官僚是居之無愧的。然而他一點都沒有官僚氣習，他生平從不聯絡政客，交通聲氣，難進易退，非有大學問和修養的人辦不到的。

在北洋軍閥當政之日，他們提到了張乾老（他別字乾若），無不肅然起敬，原因是他有學問，有操守。他又是黎元洪尊敬的人，對政治無野心，所以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北方政府的閣員，時時少不了他。一九二六後，他謝絕政壇，以研究學問為樂了。

北京圖書館有一間特別研究室，是指定給他用的。他每天都到圖書館研究方志，成為中國現代方志學的權威。二十年前，他在天津國聞週報的那篇「方志考證」，對清代的方志有很精警的批評，為學術界中有數之作。他研究學問固然很熱心，而幫助人研究學問也無微不至。一九三四年，顧頡剛辦禹貢學會，苦於無會址，張先生把私人的一所房子撥出來，做這個學術機關的辦公處。

近代怪傑黃侃

錢玄同氏於戰前北京大學印行的「文字學音義」講義中，把我們那位小學大師黃季剛（侃）推崇備至，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先生集音韻學之大成！認為自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章太炎以下，能精通中國音韻學的，黃氏一人而已。錢、黃都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錢在學術界有「

「二瘋子」的混名，那是黃季剛寫出名的，而錢氏對他，却能持論公正，不稍詆毀，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季剛在學術上的地位之不可搖撼，也就可想而知了。

說到我國聲韻學的研究，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實開其端。自此而下，歷江、戴、王諸家，逐漸的由粗而精，由疏而至密。太炎先生的二十四部，可謂已至登峯造極的發明，季剛又承其遺緒，且添入聲四部，合爲二十八部，熔諸家學說於一爐，發揚光大，金聲玉振，爲中國經小學界奠不世之功，從今天來說，我們追懷先哲，便覺得他在學術上真有些「後無來者」的悲哀了。

黃氏名侃，字季剛，號病蟬，湖北鄖春人，清末東渡日本，學習法政；那時太炎先生適因參加革命，亡命東京，他因爲私淑已久，求教心切，輾轉得友人的介紹，把自己的一些作品轉呈給章，獲得太炎先生的賞識。

他與章先生在東京住了三年多，他一直埋頭苦讀，不時向章先生請益。他說章先生是最先教他關於「禮記註疏」的人，唐賈公彥的文筆也許並不高明，糾纏繁複，讀起來頗不順利，非章先生指點，他是沒有勇氣讀下去的。最可笑的，是他跟隨章先生甚久，始終沒有「拜師」的形式，太炎先生亦復以爲奇。

最後，季剛決定回國了，乃向太炎先生請求臨別贈言之類。太炎說：「你要拜一個好老師常常指教你才好。」他問：「甚麼人好呢？」太炎說：「到北京找到申叔（師培）吧！」他答：「暫時尙不

想去北京。」太炎說：「浙江瑞安去拜孫詒讓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說：「陳伯弢在南京，你可去找他。」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說：「那末，怎麼辦呢？萬不得已，就是我最強點吧！」這時，他才認真的磕了一個頭，算是拜了師。

黃氏生平，除太炎先生外，拳拳服膺的只有一個劉申叔。申叔執教北大時，他也拜之爲師。劉氏是晚清的一位經學大師，十三經的注疏，他能倒過來背，從尾到頭，一字不易。劉申叔的遺稿，當年落在黃氏手裡的，着實不少，他很想有機會把它出版問世，惜此願未償，而黃氏亦歸道山！

季剛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要批評一聲：「粗」！（小學是沒得甚麼說的。）我記得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來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的說：「你還是去弄人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他到中大教書，出於同門汪旭初，（時任中大文學院長，亦太炎先生弟子）邀請而來，本來張作霖要以重金聘他去任東北大學教授的，他已答應，但被汪氏綁票一樣的綁來了。那時中大校長是張乃燕，人雖顯赫，但對他非常尊敬，尙能相安無事。後來朱啟先繼任，朱是黨國權要，無暇顧到對他的禮貌，於是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捲行李滾蛋，經不起國文系同學再三挽留，又請朱校長親自出馬慰留他，他還不肯，寫信給他的學生們說：

「……但既已懇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慢遊，勉爾遜

思」，諸生愛我，當爲我詠也。」

結果仍由他的老友汪旭初疏解，才算把他的辭意打消了。

季剛生前，對於晚近人士的率爾操觚，蓋事著述，非常痛恨，恨不得秦始皇復生，再來一把火燒它一個精光。他平素輕易不肯下筆，固然是自愛自重，亦所以使世人知所慎作。他經小學工夫之深不用說了，而於諸子學說也有精密的研究，詞章之學更毋庸多說，祇可惜生平著作極少；教書時又不編講義，僅賴口授令學生作筆記。已經出版的書，音韻學方面，只有一本「音畧」，那是二十年前北平某書店印行的，搜購極其不易。關於文學方面，只有一本「文心雕龍札記」，比較容易得到，此外專著就不多了。他的遺作「古音韻圖表」十數種，詩文各若干，零碎斷素，都成至寶。可是屢經世變，盡歸失散，良深惋惜！黃氏是抗戰前仙逝的，並早已歸葬故鄉，所有遺著，多半被他的姪兒孝先和快婿潘君珍藏的，不知何時才能公諸於世！

吳稚暉「偷來人身」

吳稚暉嘗自稱爲「偷來人身」。幼年身世十分淒涼，時當洪楊之亂，他母親系出無錫北門「江尖嘴上團團轉」。鄒氏望族，因避亂來到陽湖縣的雪堰橋頭，其地有如一個長舌頭透出在太湖裡面，距無錫邊界很近，離無錫縣城也只三十里，而離武進縣城却有七十里之遙，後陽湖併入武進，其地歸武進

瞎境，本是極不合理的。稚老的老家就在雪堰橋，他母親十八歲嫁給他父親，也可算得一對亂世鴛鴦。不幸二十五歲就死去，時稚老僅六歲。稚老嘗自述道：

曾祖母早寡，吾祖爲獨子，生吾父亦獨子，十歲喪母，吾母十八嫁吾父，曾祖母與吾祖，切望吾母生子，不料吾母至家之年，爲同治二年，曾祖母近九十，祖父六十，先後去世。至同治四年，吾母生我，伊方二十歲。吾母生我之時，吾外祖母已喪其二子一女，止吾母一女，寄食吾家。吾母生我之後，連生三女，二十五歲時，因生第三女，產後患痢而死。彼愛第二女，在其產時死去，故悲傷而致疾。彼死，所生第三妹亦未育而死。遺吾六歲，及吾大妹四歲。時洪楊之亂已平，外祖母本無子女，故撫吾兄妹二人如己孫，同回無錫北門老家鄒氏，鄒固北門望族也。外祖母養我至廿七歲，而彼死，其恩至篤。這是稚老幼年零丁孤苦的身世。論他的籍貫，說是無錫人可，武進人可，「總之，是中國人也」。但在清末科學時代，稚老因爲在無錫應童子試，還會引起一次「冒籍」的小風波。

他所稱「偷來人身」也有一個可笑的掌故。當他八十歲那年，友人打算爲他上壽，出紀念特刊，他連忙致書辭謝道：「吾母方孕我，外祖母夢吾曾祖母與祖父告之曰：『吾將在陰間買小孩，已定價矣，惟秤時賣者曾將秤鈎納入肚臍而秤』。且夢兩次。並言兩臂已作記號。既而生我，左臂有一粒紅斑爲蠶豆大，右臂有一葫蘆有寸半長，外祖母深信不疑，信係吾曾祖母與祖父隔了閻王買來者。所以戒勿做生日，一做生日，必要堂前點蠟燭，以敬天地，有閒神去報告閻王難免拘回陰間。……外祖母並戒

不，切勿駁剔肚臍中之塵穢，此乃封住秤鈎洞之要物。吾十歲，漸不信神話，夏天洗澡，試將宿穢如綠豆大者剔去。忽腹痛如絞，連痛三日，塗以臍膏，焚去其穢多起。嗣後吾雖欲不信，事實不可能。故至今吾臍中有兩粒綠豆大堅黑之宿穢，存於其中，倘爲七十年前之宿穢，不敢動，彼亦堅着爲生根者，亦可驗也。

年老人這些話頭，可以說全是迷信，而稚老借以謝壽，却也有其一片至情，他說：吾之哲理，且不信有神，不信秤鈎鈎肚臍，過秤買米。肉上有紅癍，亦人人都有，決非買定之記號。自然更不信有所謂閻王。而臍中之穢不除，曾見有西人記載，笑劣等民族，不除臍穢，想我亦不免低劣，且更不信穢塵可封秤洞。然剔去宿穢，並未粗暴傷肉，竟至腹痛如絞者三日，則事實不能闢，亦不敢闢。至外祖母養我至一十七歲，而後死，其恩至篤。曾祖母九十，爲吾族之節母。彼等迷信，固一定可笑，然愛我則具誠心，而已死尊長之遺命故違則不祥，則決可言也。迷信我不管，違背遺命則大不可。而且尊長止知有我而延嗣續，亦知我爲不肖，「儻來人身」，能免大過，雖無補於世，讓我久久視息人間，亦可將小玩意報導報導。

他並認爲區區八十九十，俱不足道。方今衛生過於前人，由三百四百，竟追武老彭八百，乃必有之事。他說他自然甚愛生命，可活必當活。不做生日，不做壽慶，落得安閒無事。記得有年二月廿八生日那天，親友備些禮物送他，還挨他罵道：「做什麼生日，放屁」。這是「儻來人身」不做生日的大道理啊！

吳稚暉爲友報喪笑話

章士釗最初也談過革命，後來與章太炎交結了五百年前同一家兄弟，作政客式的活動，在北洋政府掛起總長之類的頭銜，辦過甲寅雜誌，國府成立後，他又想換上去獵取一官半職，未能如願，便在十里洋場，依人作嫁，操其筆墨生涯，時而壽序，時而墓誌，專替活死人捧場。和談時，他以毛澤東的老師身份，居然洋洋得意。吳稚暉與章原也有相當交誼，但自從章在北平辦起甲寅雜誌，便以「友喪」一文，宣告此人的死亡，認爲他從那時起已不在人間。甲寅雜誌封面刊有虎標，「虎」俗稱是大虫，故章當時以「章大虫」馳名。

稚老「友喪」一文，是刊於國語周刊的。開首還有一段序言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裡「散局」回家，路上撞着徐桐，剛毅的鬼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裡說話了。不然，他也是一個自負經天緯地的朋友，到了這種亡國破家的時候，什麼軍國大事，做了什麼國務員位子，應該破工夫去發賣籌劃：他竟吃飽了飯，來把幾個同意的冷僻死字，去替代了一看便懂的活字，瘋頭獸腦，自命是盤正文體；恐怕便是村學究對着他，也嫌他不合時宜罷。祇有那班無聊的官僚們，借着他那頑提倡「上聖德頌」的精神，暗暗歡喜，可以鞏固他們的老局面。說道：「好小子！你從前坐在上海巡捕房

丟了臉，今天才算自拔，做了體面人兒呀！」呀呀！章先生還是又驚呢！還是又喜呢？

就是章先生也說過「一爲文人，便無足觀。」

稚老曾說道：所以「文人」也者，卽與嫖賭吃酒金丹老士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卽蚊蟲臭風，充塞滿屋。近年「洋八股」之鳴張，不啻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令兄太炎，一生烏烟瘴氣，便吃虧在「能文章」，況取證不必在遠，章先生一以「能文章」自命，卽人格爲之頓生問題，以甲寅繼刊論，其中倔強不屈之處，尙保存章先生少年面目，至於那種「時評」那種「陳咸之父教子以詔」之「執政考」等，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於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然而無非慕俳醜優文人的結果罷了。

最後，稚老便擬了一個報喪告白，標題「友喪」二字，沉痛地宣告章士釗的死亡。告白如次：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輒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殮，遵古心喪，既（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吳稚暉附加說明道：所謂罪孽深重者，乃記實，因一般朋友不長進，於國事不能積極前進，弄得章先生憤懣無聊，走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裡，灣到十八層幽谷也。

稚老更反對章當年所持的「讀經救國」論，並舉出幾件小事，以證明其品格的卑污。他問：三十年前誰點了翰林，回家去沒人理會，弄一賭場裡失了東西，相傳出了「賊翰林」呢？又問：誰在東交

民巷某儲蓄銀行裡吸鴉片，賭銅錢，被外國人同一個姓王的同鄉一同捉去，好容易叫兩個車夫替代了，解到官廳却又拖了出來，致又被官拘去，罰金了事呢？

總而言之，「天下棄我，我不棄天下」，竹頭、木屑、牛隻馬勃，藥籠中少備些爲妙呀！故與其曰「讀經救國」，無寧曰「讀經做賊」可矣。

吳稚暉掃「落葉」

汪精衛一生多變，結果賣身投靠，賣國求榮，也不得善終。當抗戰至嚴重階段時，他由重慶出走河內，將其近作「落葉詞」分寄重慶各黨國要人，詞內隱示抗戰前途暗淡，南京歸去無期。吳稚暉也收到一份，除將原詞痛加評斥之外，並依韻步和，釋老詞中慷慨壯烈，有如老松柏之操，與汪原詞相較，其悲涼消極，真不可以道里計。詩詞雖屬小技，然言爲心聲，其忠奸正邪，亦可觀察出來。

汪的落葉詞題爲「憶舊遊」，原詞曰：「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猶作留連意。奈嬌魂不管，催化清萍，已分去潮俱渺，回纈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擎空枝老，同訴漂零。」吳評曰：「但使不付『東流』，則豈比西尼亞王龍寶火柴，一息尚存，何必楚囚相對，漂零同訴。」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槭槭蕭蕭裡，淒涼變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東去，流水有聲聲。只極目烟蕪，寒蟄夜月，愁秣陵！」吳評曰：「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無榮。」恰

似借吻付口使言，「天予不取」有解于國際之間，但作者曾戴少年之頭，欲引刀成快，以回天心矣，不可健忘也。又「只極目烟蕪，寒蛩夜月，愁秣陵」，此是遠却邊輯，美其詞令，危言以聳聽，作者一生術擅催眠，惑人自惑，故人方以其將姬文周且，東風鳳于天九，乃常喜自依藩籬。竟甘心與蜀衍吳越，把臂詞林，真可痛惜，不然，與作者同稱一代詞人，亦能傳其鈴山堂之集，所謂梁兼異也者，猶能電相慰曰：吾主正建「新秩序」，但使落葉落紅，相伴「東去」，秣陵金粉，將勝六朝，寒蛩方飲露芳草，寧肯在夜月中，尋覓不可多得之烟蕪耶？」

汪在河內填此詞後，跟着就發出「觀電」，潛赴南京成立偽組織，故吳穉老評其詞中，一筆就將其假面具戳穿。

吳穉老步韻和曰：「落葉春華日，早綴枝頭，吸露高消——恨少貞堅質，受嚴霜小逼，墮作齋萍。當記背寒追暖，反覆大紛經。忍喬木豐林，根殘枝禿，催似凋零？」

天心好荊棘，拚菊攔蘭折，滅絕猶榮。暴雨飄風後，看豺狼末日，終息殞聲，知否八公山上，草木亦寧馨？待掃葉入溷，斬荆投海，下金陵。」

在抗戰期間，這一首詞所引起重大的反應，國人當不忘之。當時，汪精衛賣國付「東流」，吳穉老填詞痛「落葉」，不僅是文壇中傳為佳話，也可以是正與偽、忠與奸的分野，抗戰史可記的一頁。猶憶清共時期，汪吳迭在報端筆戰，彼時汪擁共甚力，後來又搖身一變，而投靠日寇，不惜遺臭萬

年。則汪吳的人格，誠有雲泥之判了。

徐志摩與林長民

雙括老人林宗孟，爲北洋政客中的一代奇才，除楊哲子外，其文學的造詣尤高於齊輩，這決不是溢美之詞；徐志摩生前最折服的人也正是這位宗孟先生。

志摩對政治原非內行，但因梁任公的關係，與研究系的諸君比較接近，他是師事梁任公的，對林宗孟又似在師友之間。他的「自剖文集」中有一篇「傷雙括老人」，友情真摯，真是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散文。又在他的「愛眉小札」中也幾次提到林氏與他倆遊歷故都的往事，太息「如此靈秀，竟遭橫折」！

宗孟平日喜自負其政治的異稟，但其口舌與文字更有才華，故志摩記他：「搖曳多姿的吐屬，舊雷似的滿綴着警句與諧趣。」惜其鋒芒太露，爲其一生最吃虧的所在，但在遇難之前，已有厭棄政治生活的感覺，正準備謝絕俗緣，親自教課膝前的子女云云，並且亦很願意改變興趣從事文學藝術的生活。他的舊法本來不錯，晚年的腕力更健。當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時，他與志摩諸人熱心歡迎，與會不淺，也看不出是一個抱殘守缺的半百老翁！難怪志摩說他的精神裡，看不見蒼蒼的鬚髮，看不見五十年光陰的痕跡。

宗孟遭難時，其長女徽因女士猶在海外留學，這位三十年前的名門閨秀，後來成爲「驚才絕艷」馳譽京華的女作家，倒的確具有幾許貴族血液。她和他父親一樣的喜歡文學及藝術，曾自己對人說是他父親唯一的知己。他們父女真不是尋常的父女。「中郎有女」，宗孟生前固然常常以此沾沾自喜，但他也會慨乎言之：「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聲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在北方，徽因既是有名的才女，當年的一般少年名士無不趨之若鶩。詩人林庚白曾追求她失戀了，才轉而追求林北隱。徽因後來也嫁了梁任公的公子。宗孟與庚白都是福建人，又都是民國以來的「一代奇才」，結果都死於非命（宗孟死於軍閥之手，庚白於抗戰時在香港遇難）這也許是天才們所不可避免的劫難。最後想起宗孟遺詩中最得意的兩句：「萬種風情無著地，遼原白雪葬華顛」，正是他一生坎坷的寫照。

徐志摩陸小曼戀愛軼聞

徐志摩與陸小曼之戀愛事，記之者頗多，然尚有若干軼聞，爲一般記此事者所忽畧，爰補記之，以爲文壇談佐。

當徐與原配張夫人離異而與陸小曼結合，徐之友好，多貽齟齬阻。其師梁任公亦以千言長書致

徐，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爲世誥。書中有：「嗚呼，志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之警語，然徐意堅決，覆書亦有：「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徐隨結婚之日，任證婚人者卽爲任公。輿論對任公頗有微詞，任公一笑置之。

志摩撞機死，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爲出專號以誌哀悼。北大教授楊丙辰爲文投登該刊，對死者責備頗烈。時文學副刊編者爲志摩生前學友吳雨僧，刊登該文而附加按語爲亡友申辯。後三年，吳復有挽志摩七律二首，文情並茂，詩曰：

「牛津花國幾經巡，檀板雪案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業，依新依舊共詩神。曾逢瓊島驚羣社，忍憶開山火焰塵。萬古雲霄留片影，歡愉瀟灑性靈真。」

君亡三載我猶存，異道同悲付世論。碎骨紅顏知己淚，嘔心詩卷爪泥痕。名山路險經孤注，情海冤深甚覆盆。離合是非都不省，明星燦燦遠天繁。」

淞滬中日戰起，十九路軍參謀王慶在租界飯店爲日軍搜去地圖。當時盛傳王之赴租界飯店實因候晤陸小曼。事後燕京史學系教授鄧文如（之誠）爲長詩紀其事，有「汝自負人人負汝」及「纔知女寵原禍水，破國亡家皆由此」之句。全詩譏刺徐陸，不留餘地。吳雨僧又爲文爲之辯解，謂離婚未爲失德，滬戰全局之勝敗，與此區區一普通軍用地圖之被奪無關云。志摩地下有知，亦當喜有此知己矣。

梁啟超證婚掃興辭

梁啟超不獨文章鋒鋒犀利，且喜開玩笑，使被調侃的人啼笑皆非。可是有一次他給徐志摩陸小曼證婚，因玩笑開得過火，却有點大煞風景。

那是民國十五年之春，詩人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於故都北海漪瀾堂，徐陸均爲梁的受業門人，因此便聯袂往邀梁任公證婚。梁不加推辭，但却對徐陸說：「我當場要訓話的——要不客氣的訓話的。」徐陸以證婚人訓話是婚禮儀式上的例行公事，何況能得到受業老師的訓話，更屬榮幸之至，當然很表歡迎。

於是到了婚禮舉行之日，新郎新娘交換飾物之後，司儀人讀至「證婚人訓辭」時，梁啟超便於鼓樂喧天賓朋雲集聲中，上台致詞，他當真履行他的「不客氣的訓辭」，一開頭就說：

「志摩，小曼，均是我的得意門人，學術能力，膏高出常人萬萬，誠是國家的柱石，社會的中堅，他倆的結合，可稱璧合珠聯，異常美滿的了。可是……」

他說至此頓了一頓，望了望徐志摩與陸小曼，接着便暢談徐陸兩人過去的羅曼史，滔滔不絕。

「……徐曾與××結婚，離婚，……結婚，離婚，陸曾與××結婚，離婚，……結婚，離婚……雖婚姻奮鬥各有自由，畢竟離合錯綜，顯足增益人生無窮的創痛。我以先生和證婚人的雙重資

格來訓勉你倆，却要「同情到老」，不必用懺付前此「離婚者」的辦法，再顯身手。否則便對不起你倆自己，對不起參加盛典的各位來賓，尤對不起證婚的我——梁啓超。」

全場爲之默然，徐志摩陸小曼也爲之變色。因梁啓超所說的話都是事實，但是在這樣的場合下，誰也不願記憶那些舊事，因此梁的訓話變成大煞風景。

後此未及數年，徐志摩竟以飛機失事墮機身死，陸小曼呢，也不願辜負自己美麗的青春，嫁了人。固然這完全屬於天災人禍所引起的人事上的變遷，假若志摩不死，小曼也許不會另嫁。不過梁任公的訓詞，成了讖語，是非任公始願所及料吧！

羅文幹二三事

民初，袁世凱因帝制自爲，爲國人共棄。反對袁世凱氏的如蔡松坡，唐繼堯，梁啓超等，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今天許多人都不知道當時在北京袁氏的勢力範圍下，還有人敢於站在司法界的立場，公開檢舉袁世凱叛國稱帝的，這是當時京師總檢察廳的檢察長，卽已故法學前輩羅文幹。他的胆識過人，曾使朝野大爲驚疑！而袁氏的爪牙卒亦無如之何也。

羅文幹字鈞任，早年留學英國，治法律學與王寵惠齊名。他自從那一次因檢舉袁世凱「篡」之名之後，到了民國十年，出任王寵惠好人內閣中的司法部長，又被政敵陷害，發生有名的金法郎案，

吃了一次莫須有的官司，再度成爲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

據熟悉北洋政治內幕的人談：王寵惠內閣的誕生，係由吳佩孚一手促成，却爲曹錕所不喜。陸軍總長張紹曾更陰謀取王以自代，想過一次國務總理的羅頭，蓄意推倒王閣，因而連絡了衆院議長吳景濂等，指使華意銀行經理徐亞翰出面舉發，藉口奧款之事，入府訴於黎元洪，遂下令將羅氏逕交法院看管。這樣，王寵惠的內閣不得不呈請辭職，而張紹曾才能如願以償地代理國務總理。在張閣中擔任外交總長的是黃郛，黃氏出任外長後，第一件公事即簽定金法郎案。

王閣辭職的前夕，他們幾位重要的閣員自王寵惠以下，如教育總長湯爾和，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齊集在顧少川的公館中，商議應付事變。其中以湯爾和的態度最激烈，主張全體辭職援助羅氏。王、顧等比較溫和，亮曦曾用幽默的口吻對湯說：

「你是醫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們的目的是救國！」書生論政，一時傳爲笑談。

按湯氏爲醫學博士，原爲東方研究熱帶病學者之第一人，倭人則稱賞其「近世婦人科學」一書，研究最精，可稱爲世界作者，國中許多醫學名詞，大多由湯所譯定。湯、羅意氣相投，羅出獄後，卽與湯氏同赴東北。但抗戰以後，湯因熱心利祿，遂墮其行。與羅之保持晚節，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聞當時之北京東城警察署長，至羅寓捕羅時，羅氏極爲鎮靜，但問：「拘票在那裡？」警察署長赫然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但結果仍爲警察署長強拖以

去。

當時司法總長似爲程克，因媚附吳景濂，竟越權以部令再捕羅，著名法學家江庸（翊望），正担任修訂法律館總裁，以程破壞法令，憤而辭職，且通電全國責程「無恥」，時論大快，這是羅案中的一段插曲。

又在此事發生後，北京官場流傳一首打油詩：「幹倒羅 閻已空，一聲渾蛋滾匆匆，早知王總辦爲惠，此夫高恩竟不洪。」高恩洪是一個北洋政客的名字，當是也時王氏的閹員之一。（曾任交通總長）。

羅文幹之獄，後來因財政部職員徐曙峯行恭兩人挺身出來作證，案情大白，羅氏才得脫身於羅網之中，而他的廉潔反爲國人所共信。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時代，羅氏出任外交部長，照例部長每月可支鉅額的特別費，這是不必報銷的。但是羅氏堅決的拒受這筆款子，使他的屬下也深爲感動。抗戰初期，羅氏任國民參政員，民國三十年秋，病歿於廣東樂昌縣，身後異常蕭條。凡此種種，可以蓋棺論定，證明羅氏是一個有爲有守的好官，一個篤信西方法治精神，能在中國官場上保持着「衆人皆濁，唯我獨清」的末世君子。

除了廉潔之外，羅氏尤富於正義感，公而忘私，不怕得罪朋友。抗戰前夕，桂系的軍人爲促使中央抗日，將有「兵諫」之舉，胡適之在北平，以社會賢達的身份通電責備李（宗仁）白（崇禧），羅

氏因同情李白的動機，也自動的寫信駁斥他的朋友胡適之。莊諧並出，使胡氏啼笑皆非。

據述羅文幹之「幹」，原本應寫作「幹」而非「幹」字。但在三十年來，一切名典、公文、私記，習用羅文幹，而沒有人寫成幹字的，那又不知是什麼道理了。

羅文幹之風骨

羅文幹以民五檢舉袁世凱帝制出名，其風骨氣節，並爲世重。民十一王寵惠在北京組閣，羅任司法總長，高恩洪任內務總長，其他名流學者，參加亦多，時人稱爲「好人內閣」。卒因軍閥嫉忌，製造事端，羅竟因是陷於獄，王閣亦於焉解體。時北京會流傳打油詩一首云：「幹倒羅文閣已空，一聲泥狗飯忽，早知王寵惠難爲惠，此矣高恩竟不洪。」雖語近調侃，然足反映當時北京政治環境之惡劣，於好人內閣固無損也。

北伐成功後，國府奠都南京，羅曾任外交部長三年，凡外交棘手事件，皆能從容解決。當時中央規定，外交部長每月有特別辦公費三萬元，毋須報銷，羅凡百樽節，不輕動用，於交卸時，竟將節餘辦公費九十餘萬元，交還國庫，此爲歷任部長未有事，其廉潔如此。又當時上海某校因反對武育幹而起風潮，南京某報曾以「外交文幹，教育武幹」徵聯，但久無應之者。

羅文幹嗜啤酒

吾國的司法界前輩，不少是粵籍的，除東莞王亮疇（寵惠）而外，還有番禺羅鈞任（文幹），羅是研究法學於英國牛津大學，以碩士出身的，曾歷任司法總長，外交部長等職，他沒有官僚習氣，性很幽默風趣，對友好談笑，也喜出以諧謔，且具有特別愛好，當身任外交官時，也從不穿西服，長衣短褂，很似老師宿儒，因兩腿特長，每登樓梯常是一步兩級，有以此向他取笑的，羅只笑謂我身兼兩職，假如不是一步兩級，那是不合法的，因那時羅是兼任外交和司法兩部職的，他善解嘲由此可見，那時風氣，還沒有記者招待會的習慣，可是新聞記者訪他，他很少不接見，而見面必大談笑話，引得大家笑不合口，有問他的事，他不欲發表的，更常常以說話攪開，不使對方難過，故那時新聞記者，不少呼他爲笑話部長的，因有一次，有某國大使來華，謁見國府主席林森，那大使是羅的舊同學，且過去很友善的，又以他是外交官，所以陪同至國府，乃當鄭重行禮的時候，羅忍不住幽默的風趣，向那大使扮一下鬼臉，引得大使辛苦到眼淚皆出，因忍笑既不能，苦笑又恐失儀，故非常狼狽，事後，羅設宴請大使，大使想起那天事，要罰羅飲酒，羅笑允，但以啤酒爲限，且以兩瓶博一瓶，羅飲兩瓶，大使則要陪飲一瓶，但羅酒量很豪，一瓶復一瓶，看看已將盡二十瓶，大使已不能勝，高掛免戰牌，但羅依然綽有餘裕，撫腹自如，他的酒量怎樣，也沒人知，因他從來飲而不醉的，而每接見記

者，也常出啤酒款待，喜猜拳，但每猜必負，但笑說，要負才有酒飲，若猜而勝，則酒爲他人飲，自己空饒嘴了，他的風趣，可說是政海裡的妙人。

羅文幹幽靈顯現

羅鈞任（文幹）在中日抗戰時期病逝於粵北的。勝利之後，羅夫人忽然從上海去海南島，據說有個李君在那裡遇見了她，問她何以會來到此地，有什麼要緊的事？她悲愴地一歎，說：「不錯，我是奇怪，怎麼到會來此地？你是應該詫異的，我這次是鈞任叫我來的呀！」「羅先生過世好幾年了啊！您怎樣請的？」李君更感覺詫異的問她。她於是把這一件奇聞實事的內容坦白地自述出來了。內容情形是這樣的：羅夫人住在上海，家裡僱用的女工人也是上海人。一天，這個女工人忽然間倒地昏迷，幾分鐘工夫又爬起身來，就失去自己原來的常態了。她變成男子的神情，大聲說話，完全是羅先生的口音，她向來只能講上海話，決不會講出廣東普式地官話的。她於是和羅太太談心，同羅先生生前的神氣一樣。所說的很多都是私人的瑣碎事情，不但外人所不能知道，即此日常接近身邊的女工人，也不會明白一切的。她質問羅夫人（全是羅先生的口音）何以失信，還沒有履行以前的原約？羅夫人說：因爲孩子的關係還得要等候幾年才行。（原約的內容詳細情形羅夫人自述經過時並未宣佈，李君亦不便追問，因係他人夫婦間的私事也。）女工人說：「那麼，有一件事必要你自己去辦理一下的

了。你趕緊就去海南島把某項……事如何接洽如何處理妥當才。」（這件事的內容羅夫人自述時亦未宣佈，李君亦以事關私人的秘密所以並不追問了。）羅夫人「女工人所說的事情，都是非常確實，而且是除亡夫之外並無第三個人知道的問題，才相信是羅先生的幽靈憑附在女工人身上所指示的。她到了海南島後，照着幽靈指示的辦法果然把事體處理妥貼了。

她的弟弟對於幽靈的問題素不相信，抱定這個成見太深了，所以對這回事實還是有些懷疑。在羅夫人動身南來之前，他和羅夫人在屋內談心，偶然間斜靠了身體在沙發榻子上休息一下。榻子腳頭放着一座有大玻璃鏡子的衣櫥，鏡子照着他的視線非常清楚光亮。忽然間，鏡子裡面現出一個人企立不動地望着他。他凝神一加注視之下，鏡子裡的人就是羅先生。身上穿的是藍袍黑馬褂，袍子下面還露出來一小段袴腳管部份，並且連袴料子上一條一條直形的條紋全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他才大驚失聲地跳起來，叫羅夫人來看時已不見人影了。他自己遇見了這樣地奇怪事實之後，也只好承認是幽靈現顯的親眼印證。後來他偏處向羅先生當時在重慶來往的朋友們詳細地查問，又才多得到了一件有力的事實證明。證明羅先生在粵北去世後大殮時，衆親友們看見亡者所穿的是袍褂常體服，袴子則是長條子花紋絨料的。

吳趼人專寫黑幕小說

吳趼人所著「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和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文學批評者目爲黑幕小說，又稱譴責小說。李作單純以清末官場爲對象，其時暴露官場黑幕，間接有助於鼓吹革命，在這觀點上，官場現形記乃不無時代價值的。吳作暴露黑幕不限於官場，士農工商優娼皂卒無不有怪現狀，筆槍墨炮不擇人而施，吳的眼睛太雪亮了。而且，對待同鄉特別來得不客氣，這一腔怒火，相信其來有自的。

吳趼人，籍廣東南海，大書家鑑藏家吳榮光的孫子（？）是個地道廣東佬。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却把同鄉們漫罵不留餘地；罵得梁文忠（鼎芬）先後凡兩見，首先寫他以七品小翰林奏彈李鴻章，庭旨嚴譴，降九級調用。本來是，沒有降九級調用這回事的；作者杜撰了個降調方法，由七品而八品而九品，而士農工商，而優娼皂卒，第九級恰好降到「娼」這一級去。跟着寫他落職出京，到同鄉閩浙總督許應駘衙門打秋風，受挫辱後痛哭流涕，深悔越俎彈劾李爵相之非。如此還罵得不够呢；另一回羅織文忠閹房隱事，硬把文廷式（芸閣）拉入圈，書中（武月庭）便是文芸閣學士了。文忠京寓題爲「棲鳳樓」，「今傳是樓詩話」提到舊夢鷺鴦棲鳳宅（文忠自署楹帖句子）也不過說是節庵傷心事，內幕徇恍，傳聞而已。吳揭發（誣蔑）他人陰私，奚不憚煩至此？一說吳受了李鴻章兒子李經羲的津貼

故爲曲筆，是否屬實，祇好付諸多問疑吧。

書中有一回影射南海張樵野（蔭桓）侍郎嫁女事，把張府大小姐寫成鴉片鬼，出閣這一晚就在新房大張烟局吐霧吞雲，把新郎一家人氣個半死。另一回寫廣東大紳劉學詢在沙基開藥房遇到光棍損失巨萬，宿鸞樓便是劉學詢，對手「祖勞佛」影射何人，這裡可不忍說明了。此外，他還不迭譏笑廣東人，甚至廣東人盼藍青官話，也要特爲表彰一番。書中他最褒獎的同鄉，只有一個人，實在也不算廣東人，她是香港的一個「大縣把」。

有一個時期吳斯人乃趨附保皇黨的，雖不滿現狀，也不同情革命，對於革命空氣濃厚的故鄉每多誤解，還是有可能的。

叔本華「暗殺」王國維

民國十六年，北伐大軍擊敗率軍於河南的時候，宿學泰斗王國維遂於六月二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其遺書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種以死來抵抗北伐軍之勝利的學者，當時是頗爲人所不解的，其實這祇要對王國維的著作能稍作研讀，便可知道其來龍去脈的。

王國維是一個感覺敏銳而禁不住熱情，理智深潛而太沉溺於思索的人。甲午戰後，他專治叔本華哲學，後又由叔本華哲學而走向康德美學，這造成他論文學的獨到之見解，也影響他整個人生觀的再

決定。笛卡兒的第三道德規則所謂：「要常常征服我自己，不要征服命運。要改變我們的秩序。并且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一件東西能在我們的範圍能力以內。」這一種徹底唯心觀念，正是當時王國維對於政治與社會動亂的退避的歸依。

因此，當他的感情不能忍受辛亥革命的騷動而走向經史的理智活動的時候，已經是陷於不能自拔的泥沼中了。因為他不能忍受這巨大的變革，而這巨大的變革，却毫不留情地一直影響到他的內心。他的感情活動與理智活動已經無路可走，而他的天才也一無作爲。於是就在「義無再辱」的掩飾之下，完成了叔本華天才論中的天才——他自殺了。因此，說叔本華與康德殺死了王國維也未嘗不可以。

平江不肖生趣事

別署平江不肖生的向愷然，他以留學生的名義，赴日本求學。但他到日本後，並未進日本任何學校，將其所儲備的學費，遊玩了一二年，直到資斧告竭而歸。可於他帶回來手寫的一部「留東外史」約有數十萬字，把日本人與吾國的一班留學生，所有奇聞趣事，描摹盡致，其中有許多還是後來著名人物。歸國後，以此小說稿出售，上海書賈們，殺他的價，每千字，只肯出三四角錢，後來因急於得資，他以千字半元，售於某書賈，出書以後，銷路大佳。日本曾屢次交涉，欲禁此書，直至侵華以後，方向各書店禁絕。

向愷然是湖南平江人，其地近苗族，頗多神怪之談，他又習諸術，於是創爲神怪而又武俠的小說，大爲當時一般少年所歡迎。世界書局老板沈芝芳，於是大出「江湖奇俠傳」，訂明合同，不許與別家書局攪擾。而且向雖住居上海，不與同文往還，無人知其踪跡。又因有烟霞癖，日間不起身，夜午始寫稿，天明方止。而其所居在滬西，則又去市較遠，故訪問亦疏。

他所居爲一小樓，同居一爨者，乃爲其如夫人，亦湖南人也。此外則畜狗一、猴一。他向我說道：「我此間有三動物。」我訝之，云：「僅有一狗一猴，何得有三？」他指其如夫人道：「非並此而三嗎？」如夫人嬌嗔，以拳擊其背。他笑說：「你性好動，非亦一動物嗎？」一日，樓下鑼響，乃一耍猴戲者經過，樓上猴方踴躍欄，見之滋不寧，而樓下猴亦遙躍樓上，而愷然乃曳猴下樓，使之相會，而兩猴竟擁抱弗釋。向擬購此猴戲者的猴，他說：「這是我輩此爲活的。」不可。他也無力購回猴，只得把兩猴硬生生拆開。向猴乃終夜悲啼不止（向猴乃雄者）。嗚呼！猴猶如此，人何以堪？

王一亭寫畫換湘繡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書畫界頗有名氣的白龍山人王一亭，去世到現在已十八年了。他是江蘇吳興人，單名一個震宇，他的書畫都很像吳昌碩，但沒有吳昌碩的韻味，筆力亦不逮，只是海派之味甚重，他是上海的名流，以做日清輪船公司買辦起家，後來辦理慈善事業，舊日上海的什麼慈善機關都

請他當會長，名譽會長或顧問等職位。

五四運動時，上海學生大罷課、商人罷市，抵制日貨，王一亭服務的日清輪船公司大受影響，他暗中幫濟東家寫學生，幾乎給學 綁他出去遊行示衆，後來幸得他斂跡了，才不致受正義的制裁。

王一亭晚年吃長齋，專畫佛像，一九二八年他的母親生日，他要買一幅顧繡王母像掛在壽堂。一日行經一家湘繡店，見到了一件很合意，便派夥記去買。店主是湖南人洪某，知道是王一亭要的，情願以繡幅送給他，不收價錢，但要王一亭寫一幅無量壽佛來交換。王一亭馬上答應寫了送去，到拜壽那一天，洪某親自帶了壽禮和那幅王母圖去賀壽，賓主盡歡而散。

汪兆鏞窘汪兆銘

汪兆鏞和汪兆銘同父異母，兆鏞居長。一個是前清遺老，念念不忘他的故主；一個先是跟孫中山革命，後來背叛革命走去和敵人合作，出賣國家民族。

兆鏞一字憬吾，光緒十五年舉人，與梁啟超同榜，他雖然是科甲出身，但沒有出來做實任的官，只在廣東做做書院的山長，栽培後進，他的學問很好，著書二十餘種，對鄉邦文獻很有貢獻。他的「嶺南覽徵畧」雖然有很多可議之處（如不載反清的畫人，或「離經叛道」之士），但出版後幾十年，竟無一人可以繼其業，我們也不能深責他了。

自從汪兆銘「革命」後，他就和老弟斷絕來往，民國成立不久，汪兆銘以「偉人」姿態，回到廣州「大屋」拜見哥哥，他閉門不納。過了好幾年後，老人家的氣平了，才兄弟相見。

汪兆銘每逢農曆元旦，必定朝衣朝冠（他在前清的官銜是朝議大夫，奏保四品頂帶），向北叩謝「天恩」的。有一年，汪兆銘去拜年，碰巧他正在向「故君」謝恩，他見老弟到了，故意拉他一同叩拜以窘之，兆銘大驚，掙扎走了。

在抗日戰爭中，他死於澳門，年七十九。這時候，他的弟弟和兩個兒子正和敵人合作。

刺死孫傳芳的施劍翹女士

手刃殺父仇人孫傳芳，因而名震全國的施劍翹。

施女士的祖上是安徽籍，世爲武將門第，歷遷冀魯幽燕，她的父親施某，亦克紹箕裘，曾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軍閥割據時代的所謂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是後先同學，歸國後即隸孫所部，積功擢升至獨立旅長，但他的賦性耿直，每見孫的措施有所不當，即直言犯諫，其實他是感懷知遇，盡其諫諍，却因此觸動了孫的疑忌，加以旁人的進讒，以爲他別有企圖，必欲除之而後快。一夕設筵召施，卽席將之拘禁，因施帶兵有方，恐其都屬譁變，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翌晨卽假以某項罪名，將之槍斃，當執刑前，施的侍從在側，施附耳囑其寄語愛女，謂無辜受死，心實不甘，女應爲其報仇，

否則永不瞑目，侍從以弱質女流恐難勝任對，施說你不用管，我教養她這許多年，知道她能運行我的遺言，所謂知子莫若父。

施女士幼承庭訓，自小聰穎過人，父母愛逾掌珠，曾爲她延聘文武名師教習，不獨文學上頗具根柢，堪稱登堂入室，就是技擊功夫，也着實來得幾手，當她聽到父親的凶耗之後，初時痛不欲生，後來想到復仇遺訓，於是節哀順變，尋覓機會替父報仇。

初時孫傳芳擁兵雄據一方，十足地道的一個人，平日警衛森嚴，出入扈從呼擁，施雖報仇心切，却苦無下手機會，直至民國十七年後，孫傳芳兵敗下野，寓居天津租界，平時深居簡出，後來不知怎樣，或者是真有果報安排，他晚年竟信起佛教來了，間常往某一處佛堂聽講經義，施得到了這個消息，認爲如此機會，豈容錯過，於是也夤緣入會，經常前往聽經，教堂中人也不虞有他，一日施未見孫帶保鏢，卽潛坐孫的後面，乘他起立之時，迅用預帶的手鎗向孫傳芳腦後射擊，孫卽應聲倒地殞命，當時佛堂內秩序大亂，施於悲喜交集之餘，高舉手鎗，痛述係爲父親報仇，與他人無尤，並願自投官廳自首，遂由佛堂中人呼警偕之同往當地治安機關，後在法院審訊時，施女士慷慨陳詞，并自作供狀，其後附詩一首，詩云：

「蛾眉飲恨日如年，

殺父深仇不共天，

壯志不負三尺劍；

丹心一片慰九泉。」

情辭悲憤激昂，法官與觀審者皆爲之動容。

此項消息傳出之後，各地報紙登爲頭號新聞，全國輿論，一致寄與同情與聲援，後來政府爲徇國人呼籲，予以特赦。以後她便一直獻身教育工作。

施嘗語人：「君父大仇，刻骨銘心，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義正詞嚴，聞者凜然。

施在抗戰期間，曾婉辭政府昇她參政員的地位，而輾轉各地，致力於社會教育工作，雖然經費無着，她總是不辭艱辛，到處奔走呼籲，務底於成而後已，且正直敢言，有乃父風，平日對事非常認真，對人則誠懇熱情，她這種剛正不阿堅毅不拔的精神，可以說自幼就養成的。

施劍翹以一女子，有肝胆、有智慧，卒能報復父仇，其辭政辦學，窮且益堅，更是另有見地，難能可貴，其所以能成爲傳奇人物，絕非一時衝動所致。

世事滄桑，不知道一代英雄如今尙健在否？

韓復榘之死

在抗戰初期，膺一方面之寄的軍政大員，因爲不盡守土職責，受到軍事審判而伏法者，韓復榘是

第一人。

當時韓復榘是山東省政府主席，兼擁有龐大軍力的集團軍司令長官。

山東是物產饒庶之區，津浦、膠濟兩路交錯其中，日人早視作禁脔。所以抗戰發生不久，日軍即以數師兵力，首先進窺滄州，我守軍血戰三日，全團殉國，滄州遂陷，德州也受威脅。統帥部據報，即令韓復榘出師應援，不料韓不遵令，致德州亦告淪陷。

那時敵人正以全力進攻山西，其配備在津浦線兵力較弱，統帥部以山東得失，影響全局甚大，因而再令韓復榘反攻，藉挽危局。乃韓又徘徊瞻望，使敵軍得乘時增援，向陵縣臨邑方面攻擊，陷慶雲、趙惠民，進濟陽。統帥部復嚴令韓復榘固守黃河北岸待援，詎又不遵令，焚毀黃河鐵橋，退守黃河南岸，敵遂佔有膠濟路之一部，以攻濟南，韓更不戰而退，致敵兵不血刃佔有濟州，并到山東名城重鎮，淪陷殆盡，戰局不可收拾。

韓復榘是馮玉祥的舊部，不學無術，野心甚大，駐魯多年，固步自封，日人早窺知其內心所在，威迫利誘，使他入其彀中。如抗戰爆發，通都大邑，敵機狂炸，蹂躪殆盡，但對於韓復榘防區之濟南，初未嘗加以一彈，韓嘗藉此自誇。有一次敵機炸彈落在韓氏的河北故鄉，敵軍即跟着向韓道歉，並願賠償，韓更以為這是敵人對他的寵厚，而不知道正是敵人拆散我團結的奸謀。從這樣看來，韓與敵人勾結，實昭然若揭了。

所以韓復榘退守魯西之後，不顧上峯命令，一意孤行，直趨漢中，竟欲獨樹一幟，乘機坐大，統帥部偵知韓的詭計，無法再想，即密下嚴辦之令。其實，韓迭次抗令，放棄重要城市，貽誤軍機，依法早應嚴懲；不過他保有龐大兵力，中樞投鼠忌器，因而遲遲未果。

嚴辦密令既下，拘捕方法，異常慎密，先由統帥部宣佈，召開高級會議於開封，通令各方面軍政大員一律赴會，韓不得不應召而往，但他帶領精銳手槍隊一旅，隨火車護送，不離左右，以資保衛，可是當局早已準備應付之策。

韓車至中途停站之際，空襲警報忽發，大隊飛機出現雲層，機聲不絕，各火車都倉卒離站，韓所乘之火車，亦急促開出以避，因此與他的手槍隊所乘卡車隔開。及至車抵鄭州，韓始知中計，但隨從手槍隊所乘之火車，業已脫節，遂俯首就捕。其實當時所發出之空襲警報，及上空之飛機，都是當局所佈置，意在使韓所乘之車，與手槍隊隔斷，以免發生火併。

韓就捕後，押至武漢，先由軍事最高領袖親自提訊，跟着發交軍事委員會組織高等軍法會審，由鹿鍾麟任審判長，判處韓復榘死刑。其罪狀是：

「該被告（韓復榘）不盡守土職責，及抵抗能事，對於統帥部先後電飭出師應援德州，及出擊滄州，牽制敵軍之命令，均不遵奉。復因敵軍渡河，擅先放棄濟南，撤退泰安。統帥部續令該被告堅守魯南防地，又不奉命，節節退後，迄魯西濟寧失守，敵軍跟踪侵入，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

李宗吾之「厚黑學」

民初以來，凡進蜀者，無不知李宗吾其人，凡知李宗吾者，無不知其「厚黑學」，厚黑學者，即面厚心黑是也。蓋彼以爲古往今來所謂英雄豪傑，無不爲面厚心黑，即得其一偏者，亦足以稱雄一世，人物大小，全視其厚黑程度而定，如謂三國時曹操殺皇后皇子，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爲心腸最黑。謂劉備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寄人籬下，恬不知恥，爲臉皮最厚，謂孫權取荊州，殺關羽，爲心黑；向曹丕稱臣爲臉厚。謂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爲心黑；受巾幘之辱爲臉厚，更上溯楚漢之爭，謂項羽鴻門之宴，不從范增計，殺劉邦，爲心不黑；垓下之敗，恐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渡烏江，爲臉不厚，故自速其亡。而劉邦推孝惠於車前，分杯羹於俎上，韓彭組醢，兔死狗烹，其心至黑；項王挑戰，笑而謝之，廊生責其倨傲，立延之上坐，呂后私辟陽侯，佯爲不知，其臉至厚，故能擊敗項羽，數滅羣雄。

又謂韓信能受胯下之辱，可謂臉皮至厚，但其心腸不黑，每念劉邦解衣推食之恩，不聽蒯通之言，遂致身首異處，夷及三族。又謂范增千方百計，欲教項羽殺劉邦，心腸可謂至黑，但因臉皮不厚，一受離間，即大慙求去，致疽發背而死。總其立論觀點，劉邦司馬懿得其全，故能統一天下；曹操劉備得其偏，故僅稱孤道寡，割據爭雄；韓信范增，雖亦各得其偏，但因與劉邦並世同生，故同歸失

敗，持論之恢奇謔怪，舉世無兩，無怪讀其文者，無不撫掌讀賞，津津樂道也。

「厚黑學」，爲宗吾民元所作，載成都公論報，其後又有「厚黑經」，「厚黑傳習錄」。厚黑傳習錄包括三部分：一爲「求官六字真言」，二爲「做官六字真言」，三爲「作事二妙法」。所謂求官六字真言，爲「空」，「貢」，「冲」，「捧」，「恐」，「送」六字。「空」，即空間之意，謂欲爲官者，應放下一切事，一心一意，專門求官。「貢」，即鑽營之意，謂有孔必鑽，無孔不入。「冲」，即俗所謂「吹牛」。「捧」，即捧場之謂。「恐」，即恐嚇手段。「送」，即致送財貨。苟能如此，則求官必得矣。所謂做官六字真言，爲「空」，「恭」，「糊」，「兇」，「聾」，「弄」六字。「空」即空洞之意，謂批呈文告，均宜空空洞洞，不受其牽掛。「恭」，即卑躬折節脅肩諂笑之謂，對上官非此不可。「糊」，爲恭字反面，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在言談儀表上，儼然腹有經綸，凛不可犯。「兇」，即兇狠，凡能達到自己目的，即不必顧忌他人隳破身亡。「聾」，即耳聾，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是也。「弄」，即弄錢之弄，爲前十一字之結論。做官得此秘訣，則飛黃騰達，可操左券矣。所謂作事二妙法者，一爲條筭法；即辦事敷衍之意。二爲補緝法，即縱容他人之短，而以補救自顯其功。此實道盡昔日官場之醜態，驟讀之，似爲憤世嫉俗之作，然細按之，亦有其探精揭微之妙，洵奇書也。

李宗吾「怕老婆哲學」

李宗吾鑒於中國倫常，日趨乖舛，社會人士，咸以「好貨財私妻子」相競尚，致文化失其重心，心傷之餘，遂提出「怕老婆」口號，著為專論，附以「怕經」，其動機雖出於諷刺，然其用心亦良苦！至其立論詭奇，尤使人讀之妙趣橫生。彼以為世間丈夫，無不知愛其妻也，積愛成怕，積怕成恨，於是「怕老婆」遂成為天經地義事。古今來成名立功，創業開國者，殆無不「怕老婆」，並引史事以相證明。如謂陳季常「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為怕老婆巨擘，然季常之成為高人逸士，正從怕老婆得來。又謂劉先生困處於東吳，每遇危險，輒向孫夫人跪哭，無不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又謂隋文帝最怕獨孤皇后，偶觸怒皇后，竟居山中不敢出，經大臣楊素等勸好皇后，始敢回宮，故能統一南北。開創天下。又謂唐房玄齡雖身為宰相，而最怕老婆，偶訴之唐太宗，太宗召房妻至，欲加申斥，但反為房妻所屈，太宗遂轉語玄齡：「尊夫人我見猶怕，以後善事之可矣。」以開國明君，而亦懼臣妻，可見怕老婆為正理。又謂支持東晉偏安之王導謝安，皆怕老婆，王導好為清談，每聞夫人至，即狼狽而逃，故能獲得天子九錫之寵；謝安夫人，擅改周公制禮，使謝安養成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習慣，用能不勸鑒色，擊敗苻堅。此皆奇談妙論，讀之無不捧腹。

宗吾復歸納歷史事蹟，得一結論，謂官級愈高，怕老婆程度愈深，官級與怕學，殆成正比例，於

是著「怕經」十二章，筆範後長，全文均套用四書語句，趣味雋永，茲錄之如左：

經曰：「夫怕，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怕。」

「其爲人也怕妻，而敢於在外爲非者鮮矣。人人不敢爲非，而謂國之不興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復興中國之本歟！」

「惟大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國本定矣。」

「怕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妻止於嚴，爲人夫止於怕，家人有嚴君焉，妻子之謂也。妻發令於內，夫奔走於外，天地之大義也。」

「大哉妻之爲道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妻則之，蕩蕩乎無能名焉！不識不知，順妻之則。」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怕妻，而不自知爲怕者衆矣。」

「君子見妻之怒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心誠必敬，勿之有觸焉耳矣。」

「妻子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畏，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妻子怒不悅，撻之流血，不敬疾怨，起敬起畏。」

「爲人夫者，朝出而不歸，則妻倚門而望，暮出而不歸，則妻倚閭而望。是以妻子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君子之事妻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入閨門，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

敢退，妻憂亦淺，妾喜亦喜。」

「謀國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戰陣無勇非怕也。一舉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將爲善，思貽妻子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妻子羞辱，必不果。」

「妻子者，丈夫所託而終身者也。身體髮膚，屬諸妻子，不敢毀傷，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妻子，怕之終也。」

李宗吾之慙勁

李宗吾爲四川富順自流井人，生於清光緒五年，清末服務四川教育界，與張列五謝靈生輩共謀革命，辛亥張列五舉義成功，嘗委宗吾爲重慶關監督，宗吾以其猷肥，恐污清白，竟將委狀退回，後改委爲官廳清理處長，至民國二年，自請將此機關裁撤，歸時，至無資斧，乃函同鄉陳健人借銀五十元，陳回信附詩一首云：「五十塊錢不爲多，借了一坡又一坡，我今專人送與你，格外再送一首歌。」宗吾得詩，立和一首云：「厚黑先生手藝多，那怕餓子滾下坡，討口就打蓮花落，放牛我會唱山歌。」詩既成，餘興未已，又作一首云：「大風起兮飢浪坡，收拾行李兮回舊窩，安得猛士兮守沙鍋。」此即其傳誦一時之「去官吟」。

觀此兩事，即知宗吾爲人之慙勁。自民三至十五，宗吾仍服務教育界，曾任中學校長及省視學等

職，在省視學任內，力主各校學生畢業，應由政府委員考試，經省府核准試辦。十四年叙府聯立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宗吾爲主試委員，宗吾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曳宗吾出，痛毆一頓，臨走罵曰：「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宗吾被人挾起，大聲曰：「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此即宗吾之又一靈動也。

張丹斧滿身古玉

我國最著名的一家小報，在報學史上有其地位的，只能數到上海之晶報（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在三十年前已提到它了）。它是上海神州日報的一個附張，每三日一出，後來大受社會人士歡迎，便獨立出版。到一九二六年改爲每日出版，反不如從前了。

晶報的大台柱是「通紅老頭子」張丹斧，他每期給晶報寫一篇怪論、文言、語體、揚州話、蘇白兼收並蓄，讀來非常輕鬆有趣。他每一篇文章的題目都是用怪字寫印的，署名丹翁。除了第一篇大文章之外，有時他還寫些歪詩，莊諧百出，最爲人歡迎。他有「賀孫中山折桂」詩（民國九年孫中山攻下廣西，故曰「折桂」，其時適農曆八月），詠田中玉（山東督軍）親爲吳佩孚捧袂孟詩，皆極有趣。

丹翁的文字體段、濃纖，常常爲人入木三分，被罵者無如之何，只得買囑流氓打他一頓出氣。打後，他仍然照寫可也。他鑒賞骨董的能力頗高，滿身都懸掛古玉，一到晶報，便叮嚀作響，別有風趣。

他最喜談的是甲骨文（他藏有甲骨二百多片），抗戰時期日本軍閥攻入上海，聽說他逃難到鄉間病死了。

王同愈不收壽禮

王同愈字勝之，又字玄若，號樹稼。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吳大澂任廣東巡撫，帶了他和黃穆甫等人到廣州。到光緒十四年七月，吳大澂升任河東河道總督，王勝之跟了去，但不久就入北京，應第二年己丑科會試了。會試果然高中，入了翰林，穆甫在廣州還刻了一對印寄去北京賀他。

關於王勝之高中一事，先輩有傳他是以謔道得之者，據說這一科的總裁是王的同鄉潘祖蔭。諸舉人入場之前，潘在家中宴請同鄉，勝之也有份兒。祖蔭想把素有文名的許鶴巢高中的，這一宴會，內裡大有文章。但到時許氏因病沒有到。席間，祖蔭說：「我新近得到一古鼎，細看文字，是春秋時魯國的眉壽鼎，現在把拓本送給諸君人各一份，可回去慢慢研究。」王同愈很聰明，入場後，見二場的

詩題是「以介眉壽」，他便撇開平時說詩的說法，專從眉壽鼎一方面着筆，果然高中了。

勝之後來兩任湖北學政，昔日國民黨要人如：何成濬、張知本、居正、劉成禹都是他的學生。他晚年在蘇州提倡書畫、自己又會寫幾筆畫，所以他對於吳湖帆寄望最殷。他死時已經八十多了。當他八十生日，何成濬等人送他四千元壽禮，他一個錢都不收。

「馬騮」胡懷琛

胡寄塵是安徽涇縣人，胡樸安的弟弟，他的學問太過什，沒有哥哥的那麼精醇，而且死得又早一點，因此在詩、文、考據上都沒有什麼成績，倒是在上海幾家大學裡，教過一年級國文，栽植了許多學生。

在三十五年前，胡寄塵是上海禮拜六派文人。那時候，他總是給禮拜六派刊物寫短篇小說和什，人斥為「文丐」。但他又在新文化陣營的刊物，用胡懷琛之名寫了不少文字。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滬江大學教國文，學生高為雄（廣東人，高劍父的姪兒，聖約翰大學碩士，一·二八之役在閩北失踪），就打趣問他道：「先生，你在『快活林』報屁股寫小說叫胡寄塵，在大學教書叫胡懷琛，在『覺悟』（民國日報副刊，邵力子主編的）『學燈』（時事新報副刊，比較是學術性的）也用胡懷琛。到底你是『文丐』還是『文豪』？」胡寄塵一點不生氣，呵呵大笑道：「兼而有之！」

他的個子很小，身體不大壯健，但每早必在後花園舞棒，藉作運動。一九二四年葉勁風主編的「小說世界」（商務出版）登過他舞棒的一幅照片，學生們暗地裡又叫他做「馬騮」。

崔百越做糊猴王

崔百越名師質，南海人，死了到現在十幾年了。二十年前他在香港大學教詩詞，從游弟子很多，他的詞很好，但是教授法很差。

宣統初年，崔百越會到汕頭當商業學校校長，動身往汕之日，他的表兄梁鼎芬寫過一首詩送他，不知怎的，他在汕頭爲了校產商業街的事和潮汕人士鬧意見，竟然在汕頭失去了幾年自由，但他却在汕頭認識了一個富商高蘊琴，從此成爲知己。

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高蘊琴在牛山巴丙頓遺養了一所大洋房，聘崔百越在家裡當館師，每年薪水一千元，芙蓉簪任食晤，而教的學生只得一個，還是八九歲的小孩子。其實名爲教書，只是陪主人清談而已。主人雅好碑帖，百越也有同好，百越當了一年老師，寫的字更好了，晚年喜歡寫章草，港澳人士有不少人藏有他寫的字。他爲人和易，就是在高宅做老師時，絕無老師架子，僕人請他寫字，他也欣然揮洒的。

李汝謙招搖

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自爲大元帥，這一天，他委任山東濟寧人潘復（字驪航）做內閣總理，潘的同鄉李汝謙（字一山，日本留學生），以滑稽名於時，長於文學，時張宗昌爲山東督辦，李汝謙正做黃縣知事，不知爲什麼事，張宗昌派人去抓他，他馬上棄官逃走，跑到北京投奔潘復。李汝謙改名潘德，字驪庵，把這些假名字印好了名片，大搖大擺的入京去，沿途拜謁地方官，提到內閣總理潘復就稱「舍弟」。人們見他單名一個「德」字，又叫驪庵，一切與內閣總理排行相同，而且又是一口濟寧話，誰敢說他假冒官親。於是大小官員都竭力招待。計自黃縣到京走了八九天路，他在途中好酒好肉，吃之不盡，連旅費也不花一個。到京之後，他居然以潘復之力，在清史館當了一名協修，但沒有到館任事，拿薪水而已。

汝謙爲人極幽默，喜歡開玩笑。他的一個朋友名萬其誼，有一次李汝謙寫了一對縮脚聯贈給他，暗中隱有他的名姓云：「一十百千，尊姓應屬流水帳；鄉寅年戚，大名常見報喪書。」萬見了爲之吹服。（「一十百千」縮了一個萬字。「鄉寅年戚」縮了一個誼字）。

曾紀芬愛勞動

曾紀芬是曾國藩的季女，二十年前在上海是個有名人物。她廿四歲時和黃緝楓結婚，黃氏後來多少藉此聲光而做到浙江巡撫。她晚年由基督教改信佛教，在上海很努力提倡佛學。前兩年香港某晚報寫了一篇文章稱她爲「國家祥瑞」，享壽九十餘才無疾而終云云，這是不可靠的，她只活到九十歲，病了好幾個月才死，但她的身體強健却是事實。爲什麼她一生少病，身體強壯呢？那就不能不歸功於她平日愛勞動了。

曾國藩治家勤儉，督勵子女讀書操作。曾紀芬少時，曾國藩已是侯爵、大學士兩江總督了，她在家中還要紡紗，後來嫁到黃家也規定日紡紗二兩，以爲日課。

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她的哥哥曾紀澤從英函卸公使任回到上海，嫂子帶有絨織衣物回來，便教她編織。後來哥嫂去北京，她又請英國人傅蘭雅（教士，在上海製造局編譯過很多書）的夫人教她，她又傳授給上海、湖南各女同胞學習，一時學編絨衣之風極盛，編織絨線在中國有六十多年歷史，最初流行日本，而漸及於中國。

齊白石的三知己

齊白石自己說過：「知白石畫者郭葆生，知刻者夏午詒。知詩者樊樊山。」這三人可說是他成名前後的知己。郭、夏是湖北人，此三人者，今皆去世，獨剩下齊白石享大年，得見中國太平強盛，比他們厚福得多了。

樊樊山不止是白石老人詩的知己，也可說是畫的知己呢。記得一九一七年齊白石避兵禍入北京，租法源寺居住，以賣畫及篆刻爲活。那時候大名鼎鼎的畫家有陳師曾、陳半丁、林琴南等人，一個無名小卒在畫壇上想佔一角是不容易的。然而有爵自然香，郭葆生介紹他的畫給人了，由此聲譽鵲起，求畫的人日多。有一次樊樊山見了他，便對他說，他近日不寫工筆草蟲，人們傳他目力腕力都差了。第二天，齊白石便寫了一個工筆的蝴蝶扇面送給老詩人。樊山一見大喜，爲題詩云：

一雙蝴蝶還還全，猶恐相逢是夢中。知我生平非酷吏，故人相贈只清風。

慈禧供奉紅顏老，湘綺門牆白髮新。珍重前朝雙電手，齊山人與繆夫人。

樊山此詩一出，外間謠言便止了。由此看來，樊山又是他的畫中知己呢。

「哲人其萎」爲女人

——李石岑童曼恬之戀——

中國哲學家李石岑是湖南醴陵縣人，先後留學日本英德數國，返國後，歷任國內大學教授，主編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誌，有李石岑演講集，論文集等書行世，而他在學術界最有價值的著作是「人生哲學」一書。由於他學問淵博，擅長詞令，講學時非常動聽，爲當時海上名教授之一。

他是在「一二八」上海之戰前認識童女士的，童女士明知他有妻，據他自己說：當時她向他表示「只談戀愛，不談婚姻」，他則願意作她「一個永遠的好朋友」，兩人情投意合，於是同遊杭州西湖同遊江西廬山，後來更相偕返故鄉湖南暢遊，過着非常甜蜜的戀愛生活，回到上海之後，兩人同居於興業坊，達到了熱戀的最高潮。

同居後的生活，有一段時期是十分美滿的，李氏對她，萬般憐惜。她曾染過肺病，李氏在後來給她的信裡說：「這回聽說你的肺病完全好了，我比什麼還快樂；然而看到你的面容憔悴，我又不能自己的見諸夢囈之中。我常是這樣想：只要可愛的恬兒能够快活的過日子，我願意歷盡苦楚，用苦楚來做快活的代價。」李氏又追憶當他們的愛情結晶品出世時的心情說：「當我們的孩子墮地後，我切感到我的恬兒連日所受的苦痛，如同自己剝去心臟一般，因此不禁就啼大哭一場。我自問在我父親去世之日，我並沒有這回的傷感。」這種如痴如醉的愛戀生活，來得多麼動人。

然而，好景不常，大概有了妻子而同時又有了戀人的男子，誰都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吧！起初，童女士對於他不能擺脫居住在蘇州的妻子表示不滿，每當他回去蘇州的前後，總有一場囉囉，甚至彼此發生口角。漸漸地蘇州方面也知道他的秘密，同樣地湧起了暗潮。他知道事情總要爆發的，於是率直地把和童女士相戀的經過告訴妻子，打算想出一個分居共處的法子，可是像這樣的瓜葛，終究是難以圓滿解決的。

不久，滬戰發生，李氏那時任教的暨南大學位於真茹，適當軍事要衝，十九路軍在那裡設立了總指揮部，學校搬到租界裡去了。當時京滬一帶，情勢緊張，暨大當局爲了收容一部份南下的學生，和廣州中大商量好，在中大設立臨時辦事處，讓他們暫在那兒借讀，一部份教授也轉到中大任教，李氏因此到了廣州，童女士則仍留在上海，沒有南行。這時家庭間的糾紛，越來越激烈，童女士大概認爲長此非計，於是突然跑到廣州，找着李氏尋求根本的解決。可憐李氏終不忍眼見整個家庭的破滅，結果和童女士發生決裂。

但是，這時的決裂，兩人還不至於完全分手，李氏答應每月寄給她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費，她便返回上海，最初幾個月，李氏寄給的錢是并不少欠的，後來因爲欠下別人的舊債促得緊，經濟狀況非常困乏，學校雖有薪水可拿，書局的版稅却因時局關係，延宕未付，不得不托朋友向嶺南大學找些鐘點兼任，甚至廣州民國日報副刊每千字一二塊錢的稿費，也在動腦筋，所以寄給她的錢，也就不足一百

五十元之數，童女士因此寫了一封訣絕的信給他，叫他以後不要再寫信給她，憤怒他對她的「欺騙」。

李氏在廣州收到童女士的信後，深受刺激，寫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信回給她，這封情書後來在報上公開了出來，真是一字一淚，纏綿盡緻，開頭所說的：「我永遠熱愛着信賴着的恬兒；好容易等到六月五日，纔接到你一封訣絕的信。我把這信從頭至尾看完之後，兩眼昏黑，血全部上湧；加以酷熱的太陽薰蒸了許久，就倒在「明恥立信」校門旁邊。」（按：廣州文明路中山大學舊校校門有「明恥立信」四個大字镌在牆上）一小段，和信末「恬兒，別了！我們永別了！好悲慘的天地啊！」幾句，更成為當時的「警句」，常常掛在幾間大學學生的口唇邊。

李氏在這封信裡，除了憶述他們兩不少的往事以外，對於童女士的前途，備極關心。他以為她最好趁青年青（按：童女士那時只有二十多歲）下大決心做學問工夫，到日本去留學，研究文學。他說：「你到日本之後，你要特別重視近代文學作家的作品。日本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日本沒有哲學，可是文學的造就却是很高。她的文學另具有一種題材與風格，有時候幾行文字可以使你全身發抖。」其次，他對於童女士的思想沒有體系，也認為是要加注意的地方，信裡說：「你近來似乎看了一些書，從你的信中，知道你對尼采杜威一流人，都頗注意。不過你要知道，徵引人家的著述，最怕斷章取義；因為一個思想家總有他的思想系統，如果不明白他的思想系統，貿然引幾句話，可以演出完全相反對的理論。譬如杜威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尼采却是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你

現在做學問，須得有個指導的人，不然，你就令看書看得多，如果瞎看倒反有害，我總覺得你的思想太不成體系……」在那時候他對董女士愛護之情，還是這麼真摯的。

在這封信裡，有些沉痛的話，竟成爲他死前的讖語。例如：「以後如果你不允許我寫信與你，我就只得向老天揮淚，對夜月寄懷而已。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望你不要把這信看作情書，這只不過是我的孤誠而已。」又如：「我自問這封書，全是我赤心之赤裸裸的流露，因爲在永訣的當兒，片語都成了遺囑……」

民國二十一年夏天，豐大移回上海，秋間董在真茹原校復課，李氏也隨着回到滬上，這時他還極力設法彌縫和董女士的裂痕，親友也極力代爲奔走，可是這位教授經濟情形越來越劣，妻兒的生活，也靠典當來維持。經濟越困難，事情也就越不易解決，這樣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董女士卒訴諸法律，於是他們兩人的桃色糾紛，遂騰載報章，哄動一時。

哲學也吧，文學也吧，這些全然不能填補這位名教授底空虛的心，失去了愛情，往事如烟如夢，他好像是一頭受傷的小鹿，在悲鳴，在喘息。有一個時期，我們看不到他授課，偶而在暮色蒼茫的真茹郊野，見他獨自個兒低頭蹣跚，聽到他那瘦削的臉孔，便可想見他心頭上的哀痛。

不久以後，李氏竟抱恨而死。逃不過女人的糾纏，「哲人其萎」。

胡適趣事

一九二〇年，北京留美官費生發榜，「正取」的榜上胡適之前有一個「胡達」。許多人都爲「胡」一定是兄弟，即使胡適本人，在看榜之後，心裡也在想：「那個胡達不知是誰，幾乎害我空高興一場。」

後來，「兩胡」同入康南耳大學。胡達研究數學與物理，是科學社發起人；胡適研究哲學，却開始做白話詩了。

胡達反對胡適的「白話詩」。因而作了兩首「打油詩」。其一云：「紐約城裡，有個胡適，白話連篇，成何樣式？」另一係寶塔詩：「痴，適之，勿讀書，香烟一支，單做白話詩，說時快做時遲，一做就是三小時！」

胡適也答以一首寶塔詩：「呷，希奇，胡格哩，要我做詩，白話不須提，我做詩快得奇，從來不用三小時。提起筆何用費心思，筆尖總是噉噉地飛，也不管寶塔詩有幾層兒！」

現在，胡達早已逝世，胡適在美，正在研究中國哲學史，追思往事，也許要感慨繫之吧！

胡氏在北大講學時，曾與黃季剛同宴會，席次，胡氏偶談墨學，季剛遽罵曰：「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忘八」。胡氏嘿然。有聞，季剛復曰：「即胡適之尊翁，亦混賬忘八。」胡氏大怒，謂其辱及

先人。季剛始大笑曰：「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足以言墨學？余非譽君，聊試之耳。」合座嘩然懷笑。

楊杏佛，鼻最大，胡適嘗爲詩嘲之曰：「人人有鼻子，獨君大得兜，直懸一座塔，倒掛兩烟窗，親嘴全無分，聞香大有功，江南醒鼻涕，江北雨濛濛。」此形容大鼻，可謂盡致。胡氏作詩，向爲白話，惟此係五言律句，雖類似打油，而韻味甚佳，從知胡氏擅善調侃人也。昔宋劉貢父，遂於史學，與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其爲人疏爽，不修威儀，鼻踏，眉脫，爲狀甚醜。蘇東坡素與善，嘗贈以詩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樑？」此亦諷諧有趣。

一九三五年一月，胡氏曾因接受港大名譽學位，在港逗留五日，除每日均須參加各方招待，觀光宴敘，耗去不鮮時間，復曾作演講五回，三次用英文，二次用國語。厥後報章紀載，頗有微詞，因胡氏演講詞中，有謂：「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爲新文化中心……。」因此，頗爲國人所不諒解，以國人之眼光，無不知香港不能成爲新文化中心，而香港教育當局亦不足以改進中國新文化。因而對胡氏之演詞，甚有認爲此殆由於胡氏接受名譽學位之餘，而又飽饜口腹，不免作過份阿諛之連珠好句。後胡氏獲悉批評，亦亟作辯解，謂原演詞爲記錄者錯漏致有此誤，因上一句原詞爲：「使香港成爲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漏去「一個」兩字，遂致詞意頗有出入。而另一句則爲：「香港最高教育當局現在也想改善爲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的教學了。」而非

爲：「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然胡氏雖再作辯解。顧先入人心，胡氏仍未能移易視線，尤其衛道之士，更大聲疾呼，痛予攻擊。治胡氏至廣州，更爲主政者所嫉視，時鄒海濱長中大，初本擬請胡氏蒞校演講，并佈告全校放假二日，齊集聆聽。旋則再度佈告，取消前議，其佈告中有云：「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爲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爲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胡適竟以吾粵爲生番蠻族，實太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等語。如此小題大做，誠爲別開生面。蓋胡氏即有錯言，顧不能據一二紀載，卽爲罪證，必須由其本人著作，或承認爲可之紀載始能入之以罪，不此之求，而但搬指一二詞句，卽憤責狂詞，不留餘地，是亦未免失學者態度矣。尤其可笑者，則胡氏離廣州之翌日，中大文學系教授古直，鍾應梅二君更有所謂專電，分送各機關，請求將胡氏「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繼且曰：「今聞胡適尙未出境，請卽電令截回，還付執憲，幾亂匪賊子，稍知警悚，否則老口北返將笑廣東省無人也。詞句鏗鏘可誦，惟以一二文句之失言，竟惹如許大事。」

北平市長何思源東請文化界人士開座談會。座談會之先，大家閒談，李書華院長談起了人名對，有人對胡校長（當時他正任北大校長）說：「胡適之可對孫行者」。胡先生說：還是老對子了。「胡適胡適？」已對過「方遠方遠」。十餘年前，到了上海，王曉籟招待電影明星作陪，徐來最後到，我

說：「對到了：『徐來徐來』。」得了一陣笑聲。

蔣夢麟閒話「教育出產品」

戰前曾任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至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到昆明合組爲西南聯大，他還是西南聯大三個校務委員中的一個。

在他的著作中談論我國的「教育出產品」一問題，倒說得正確、淺近，而且十分風趣。

他以爲國人熱心辦理小學，是受到德國和日本的影响，因爲德日兩國的強盛（這是戰前的話）都是小學教育的功勞，但我國創辦了許多小學之後，社會一樣腐敗，國勢一樣的衰弱，原因究竟在那裡呢？他說：因爲我國的教育出產品標準不對！

第一，先說遠一點，神童「詩」說：「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們又常說：「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近來的人變了調子說：「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由此可見我國向來的教育宗旨，本來是養成「主人翁」的。可是，倘若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誰是中國的奴隸？個個秀才都要做宰相，個個田舍郎都想登天子堂，那裡有這許多位置？這是中國教育產品一個錯誤的標準。

第二，科舉制度，把讀書人變成書獃子，置且不說。現在的人，認爲教育是救國的方法，所以要小學生知道中國的危險，激發他們的愛國心，痛哭流涕的對他們說：中國要亡了，這班天真爛漫的小

學生，也不知中國是什麼東西，只聽了老師的話，也就悲哀起來，弄得正在萌芽，生氣勃勃的小孩子，變成「枯落的秋草」。這是中國教育產品另一個錯誤標準。

以上是他對於我國教育舊觀念的批評。他所舉出的話，是我們常常可以聽到甚至自己也常說的，可是我們不容易發覺它的錯處，經蔣氏道破後，方纔豁然而悟。

那末，我國教育要生產的物品，是怎麼樣的呢？蔣氏認為標準只是：「活潑潑的，能改良社會、能生產的人」。

「活潑潑的人」是針對「枯落的秋草」而言的，小孩子本來是活潑潑，但可惜「我們辦學校的，偏要把他捉將起來，關在無山、無水、無虫、無花、無鳥的學校裡；把他的手腳綁起來，使他坐在椅上不能動；把他的眼遮起來，使他看不出四面圍住的一個課室以外；要他的口來念『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種種沒意義的句；現在改了『一隻猪』『一隻狗』『哥哥讀書，妹妹寫字。』這些話，就算是新式教科書了。」他對於限制學生體力腦力，官覺，感情自然發展的教育方法，極表反對。

「能改良社會，能生產的人，」是代替陳腐的「國家主人翁」觀念的。無論那一階層的人，只要在社會生存，便離不掉社會上的種種關係；而社會的惡習，又往往帶進學校裡來，所以改良社會「能力可以在學校教育開始。他說得好：『他們是以社會分子的資格來改良社會，大家互助，來求社會的進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務。』至於『能生產的人』，則更是增高社會分子能力

的基本方法，他把從來統治者的「仁政主義」看作是「牧民政策」。用個笑話來做譬喻說：「你看中國幾千年的一治一亂，不是羊瘦牧羊，羊肥吃羊的結果麼？現在我們假設百姓是羊，我們要羊自己有能力來尋草吃，不要人來牧，那麼，羊雖肥，不怕人來吃它的肉。」所謂「能生產」，原是廣義的解釋，他舉出美國教員聯合會已加入勞動聯合會為例，說明勞心勞力，都是勞工。勞工，便是能生產的人。這自然又是很切合現代教育原則的一個意見。

蔣氏早年留美，在讀書時期，即兼任中山先生在舊金山創辦的大同日報記者，寫了許多文章，文名甚著。

他第一次跟北京大學發生關係，是在民國八年七月。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發生不久，北大校長蔡元培因病離校，在杭州養病，校務不能無人主持，於是請他到北大代理執行校務，所有印信都交給他，但蔡氏聲明仍然由自己負責，可見兩人相知之深。現在人們談起北大，除了蔡先生之外，誰都忘不掉他。

徐柏園「笑煞日本小學生」

徐柏園，浙江蘭溪人，以農家出身。蘭溪盛產火腿、蜜棗，因此，他對於這兩樣家鄉土產，也極為愛好。

民國十七年，徐任浙江民國日報社長。民國日報是國民黨黨報，隸屬於省黨部。不久，省黨部改組，一朝天子一朝臣，他的社長職務，也被迫交出。徐憤恨之餘，遂自己籌辦浙江民聲日報，要和民國日報對抗。民國日報那位新上任的社長，新官上任三把火，爲了表現自己的幹練起見，吩咐下屬繪製江浙兩省交通地圖，佈滿杭州各衙門街道，以通民智。但那位繪圖員地理常識太差，主腦人也不詳細核閱，竟將南京的位置，放在長江的北岸去。徐柏園認爲有機可乘，便寫一篇文章，題爲「笑煞日本小學生」，刊在民聲日報，指責這幅地圖的荒謬，謂即使日本的小學生，都知道南京的位置是在江南的，堂堂皇皇的浙江省黨部宣傳機關，却將南京繪到江北去，豈不笑煞日本小學生嗎？冷嘲熱諷，全市嘩然。省黨部老羞成怒，一方面責成民國日報更正地圖，一方面派遣憲兵到民聲日報去捉人，說民聲日報藏有「匪人」，圖謀煽動人心，擾亂治安。徐知機早已避開，祇捉去兩個校對。這風波鬧出以後，南京中央黨部認爲徐氏留在杭州總有不便，便設法將他調到南京去工作。不久，選拔黨員赴美國留學深造，徐柏園極力贊成，得保送赴美攻讀經濟，便成爲他以前在大陸財政界「得意」的張本。回國後走宋子文路線，入中央銀行任職。因緣時會，步步高升。日本投降後，即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兼中國銀行董事長。之後到台灣仍任原職。後又到美國考察，回台即任財政部長。

徐柏園的夫人陸瀚波，係他任民國日報社長及民聲日報社長時的老搭檔，那時她也在報館任副刊編輯。雖然她外貌平庸，徐氏却和她搞得一團火熱。工餘之暇，兩人常泛舟西子湖中，近水樓台，

兩人遂結爲夫婦。

徐柏園辦事倒有點本事。「笑煞日本小學生」這一篇文章，可以說是他一生事業的轉捩點。若不是這一篇文章觸怒 浙江省黨部，他不會被調去南京工作，便不會被保送赴美習經濟，更不能混入財政界了。

張自忠偽裝孝子脫險

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發生時，張自忠方任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兼天津市長。迨事變擴大，北平危急，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率軍離平，張奉命掩護，並維持一切。及日軍入城，張已無法出走，初易名匿居美國同仁醫院，旋爲院方所悉，遂遷入東交民巷德國醫院。時漢奸江朝宗已成立治安維持會，索張甚急，張恐爲敵所得，乃偽裝孝子，身著麻衣，首繫白布，携錢紙香燭一包，騎腳踏車出朝陽門，守城日軍初不識其人，檢查時，張告以出城掃墓，竟獲放行。張出城後，乃騎腳踏車急馳，途中車數數壞，皆張親自修復，傍晚始抵天津，與所部李文田部會合，撤退後方。後日方聞張脫走，大爲懊喪！張抵滬後，中樞慰勉有加，旋奉命鏖戰鄂北，隨聚一役，殲敵一師團，敵爲之寒胆。時張原可退回河西，可以不死，然張決心許國，不失寸土，竟以身殉焉！

鄒容死後嚇倒徐世昌

烈士鄒容，於清光緒三十年因蘇報案與章太炎同禁上海西牢，章判三年，鄒判二年。至次年正月，鄒患病甚劇，於二月二十九日卒於獄，由劉三收其骨密葬滬西華涇鄉，外間鮮有知者。迄光緒三十二年夏，天津探訪局總辦楊以德忽密報巡警部尙書徐世昌，謂鄒容秘密入京，圖謀革命，徐聞訊，大爲驚駭，飛飭內外警廳戒嚴，並搜查各客棧及廟宇寺院，凡青年旅客，俱遭還問，時距鄒容謝世，已一年又半矣。清吏之慌張，殊使人失笑。按楊以德在庚子前，原爲火車剪票員，拳亂時頗獲橫財，遂捐一雜職，資緜入探訪隊，工韶媚，善迎合，經其逮捕羅織成獄者，不勝枚舉。泊袁世凱任直隸總督，遂報捐知府，旋保道員，袁於天津設探訪局，楊遂得充總辦矣。楊知袁之注意革命黨，遂收羅孫中山及康有爲、梁啟超、章太炎、鄒容諸人肖像，陳列室中，日夕諦觀，自謂能捕得其一，則京堂可操左券矣。如上述密報鄒容入京，卽其京堂夢中詭妄事類之一。

陳雷以冀治流氓

抗戰時，九江有平民化鎮守使二，一爲吳金彪，一爲陳雷。吳乃基督教徒，毫無官氣，往來商民間，如家長然，故守潯十餘年，人咸愛戴之。吳去後，由陳接任，陳亦簡樸，日常着西裝，持手杖，

閒步街市，出入商店，幾無人知其爲顯赫之鎮守使也。

陳爲人較鋒厲，執法亦嚴，如遇流氓滋事，常當場懲治，以故人多畏之。九江鮮魚，多半由江北運來，地方流氓，遂以魚販爲利藪，敲詐欺侮，無所不爲。一日，有流氓帶索魚販未遂，因而鬥毆，流氓忽僵臥江邊詐死，同夥則圍住魚販，索償命錢，正糾纏間，陳雷散步至此，知爲流氓詐財，忽大呼曰：「青天白日，毆斃人命，速逮捕兇手。」當令警察縛住魚販，旋又曰：「兇手既拿獲，現救人要緊，問被毆閉氣者，惟大藥可治，速以藥來。」適有一担藥者，歇肩江干，陳命其挑至，語警察曰：「速將傷者牙齒撬開，以藥灌之。」流氓故裝死，聞將灌藥，霍然而起，冀圖竄逃，陳令警察執之，曰：「我固知爾裝死詐財也，當重懲之。」復溫語魚販曰：「爾無罪，速歸，以後有流氓欺爾，速告我。」一時觀者稱快！

軍長放屁失妻

放屁，爲人身生理作用，本無足怪，中國人對此，向無拘束，欲放則放。歐美則以人前放屁爲恥，而以紳士風度自許之英國人尤甚。顧此生理活動，往往無法克制，壓抑愈力，其弊愈甚，因是常引起笑談。

第二次大戰後，英國有一次大宴會，與宴多國際聞人及名媛閨秀，入席後，有一少女，突放出一

響屁，衆皆以此女有失禮貌，羞之，此女正惶窘無以爲地！忽其鄰座一美國軍官起立曰：「頃聞一屁，爲某所放，蓋某在前線受傷，致生理發生變化，無法控制，甚爲抱歉！」衆知此軍官原爲李代桃僵，藉替少女解圍，皆竊竊讀其勇敢，少女亦心滋感焉！但未久，此女又放一屁，合座征駭，各怒目視少女，於是有一法國軍官起立曰：「法國軍人勇敢，並不下於美國，這一個屁算我放的好了。」衆聞語，開然大笑，此女再不能忍，退席而逃。

川軍軍長范紹曾，最善放屁，無論家居或議集，恒聞其卜卜之聲，臭不可聞，其夫人惡之，竟以此與之離異，於是「放屁失妻」，當時傳遍川中。

熊希齡與張敬堯算賬

熊希齡脫離政海後，以湘紳資格居京，謠言慎行，人以溫和派稱之。民國七八年間，張敬堯任湖南督軍，橫征暴斂，湘人恨之刺骨。旅京湘紳，羣起請願驅張，熊亦加入，通電中謂張貪贓枉法，無所不爲，張竟電熊質問貪贓枉法證據，熊得電甚怒，立復電張歷數其貪贓數字，有：「以供所聞，執事一年來在湘所收入者，計扣留中央鹽稅二百數十萬，附加鹽稅三十餘萬，鹽票私加保護照費一百五十餘萬，錢糧一百餘萬，銅元餘利一百二十餘萬，盤金數十萬，拍賣公產百餘萬，合計八百餘萬；加以中央籌濟軍餉將及千萬，其以勒價收入定爲每元四十餘串之錢票，而發出定爲每元十五串之錢票，

利尤倍蓰。執事之軍不過四萬餘，以收入二千餘萬充支出，僅抵一半，何至尙欠三個月之軍餉。殘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斬，錢多爲害，非爲福也。……」等語。張以證據俱確，無可置辯，乃電控熊私通譚延闓，背叛國家，爲段祺瑞申斥而罷。張以一年督軍，而搜刮二千萬元之鉅，誠駭人聽聞。然張於北伐時被殺，家產籍沒，熊所謂「殘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斬。」竟一應驗，是可爲世鑑矣。

熊希齡在此「一舉」

一九三五年二月，熊希齡以六十六歲老人和三十三歲的毛彥文女士在上海結婚。新郎比新娘剛剛大一倍。婚後，熊秉三高興到了不得，一共填了兩首詞來誌蜜月之喜。他們結婚到今年恰二十二年，婚後五年，熊希齡在香港病死了。

熊希齡是湖南鳳凰廳（入民國後改縣）人。十七八歲時，有湖南才子之目。鳳凰廳知州朱其懿見他聰明，便以胞妹其懿配給他。後來希齡考到進士，入翰林（但沒有應畢業試），因此有名於時。梁啟超在長沙辦學時，希齡以在鄉紳士資格，很是幫忙，不久後發生戊戌一案，熊希齡也受了累，從此銷聲匿跡了一個時期。直到光緒三十年後才再出來活動，走上戰澤的門路，以後一帆風順，入民國做到內閣總理（人稱鳳凰總理），網羅梁啟超、張謇等一班名流入閣，下野後，一直在北京辦慈善事

業。爲北京大老之一。

當他追求毛女士到手後，毛女士要求他剃鬚，他答應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長鬚割去。有個老朋友對他說：「秉三，你已經六十六歲，年紀不少了，何必多此一舉呢。」他笑着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舉』呀！」

樊樊山撞板

樊樊山入民國後，做了一年遺老，袁世凱、黎元洪力捧他出來做參政，於是遺老們便把他的「遺老」資格取消，溥儀的小朝廷更對他沒好感。

樊山死前一年，溥儀在天津的「內務府」就向他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使他下不得台。他本來是長住南方的，一九三〇年他入北京天津一行，他的朋友夏午詒就替他在天津某大報登了一段賣文的啓事，開頭一句有「樊山尙書」字樣，樊山在滿清的官階只做到江寧布政使，未做到總督，當然不能稱尙書（因總督加尙書銜），但他在辛亥革命時，曾護理督篆數日，過總督癮，稱爲尙書，也不能說不通，但此事外間知者極少。怎知道溥儀的「內務府」竟出來干涉，同在那張大報上登了一段煞風景的啓事，畧言：查已革江寧藩司樊增祥什麼什麼，現在他居然稱爲尙書什麼什麼，大大擺景一番。樊山和他的朋友見了大爲掃興，過了兩天，就回上海了。

溥儀說他是「已革江寧藩司」是有根據的，但外間沒有多少人留意到。原來南京被革命軍攻下後，清廷下令把全城文武革職，樊也在其內。不過這一革職令不是用電旨公佈，而以廷寄行之，廷寄寄到南京，滿清已經垮台了。

鹿鍾麟驅逐溥儀

鹿鍾麟是馮玉祥舊部，他仍在大陸活着。近十年久已不聞其名了。他是河北省定縣人，一九二二年馮玉祥在河南做督軍時，鹿氏已在他的麾下了。

提起鹿鍾麟，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三十一年前他執行驅逐溥儀出宮的一件事，他因此而受到那班遺老遺少造謠，說他和馮玉祥都發了財。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回師北京把曹錕拘禁了，曹的嬖人李彥青之槍斃，就是鹿氏以京師警衛司令名義，奉命執行的。此舉大快人心，固然不在話下，尤令人稱快的，無如他奉命去叫溥儀出宮了。當日他和北京一班士紳名流到故宮，限溥儀即日遷出，由北京各界組織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

譚延闓發還余誠格財物

辛亥武昌起義後，湖南尚未響應，湘撫余誠格，到任僅月餘，其人尙屬明達，不似滿大員之昏瞶

也。時譚延闓方自京歸，往謁誠格，誠格乍見，即拱手稱譚大都督，延闓愕然，誠格曰：「武昌既起事，湖南將必響應，君爲衆望所歸，大都督舍君其誰？」迄九月一日湖南光復，誠格挈老父遁出，家財頗有損失。初任都督焦循，又懸賞千金購其頭，誠格頗恚。旋逃至安慶，謁朱家寶代奏，乃之滬居焉。及延闓任都督，誠格寓甯延闓，有：「我到湘月餘，自問無罪湘人之處，家中財物均多遺失，民軍舉動固應如是乎？」等語，函面書「中華民國湘軍都督翰林院譚大人啓」，延闓見此稱呼，大爲失笑，然不願直接回信，僅於長沙日報登一廣告云：「余竊屏君鑒：財物悉封存府中，毫無遺失，請派員來領。湘都督譚延闓白。」誠格見報，即派人赴湘，延闓盡將其財物發還，誠格大爲感慰！

蔣百里廁所逃生

蔣百里是我國近代一個很傑出的軍事家，可惜他生在北洋軍閥和「封建軍閥」（羅斯福語）時代，一點都不能有所展佈。他不只是軍事學識豐富，就是文學也很有修養。一九二一年，他和鄭振鐸、耿濟之、沈雁冰、王統照等十二人發起那個著名的文學研究會，還寫過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

光緒末年，陳叔通的哥哥仲恕主持杭州的求是書院，蔣百里和馬叙倫都是其中的高材生。陳仲恕本來是跟着趙爾巽的，趙爾巽再任東三省總督，陳仲恕便主張把蔣百里奏調到東三省當督辦公所總參

議。

綠林出身的張作霖的隊伍太過沒紀律了，百里對他有點不客氣。張作霖恨他刺骨。

辛亥革命時，東三省的情形不穩，趙爾巽知道張作霖要利用兵變時乘機把他殺掉，就勸蔣百里早日離開東三省。他上了京奉火車後，不久，張作霖帶了二十名衛士趕到火車，問車中的服務人員蔣百里到了未。他們都說未到。張作霖不信，從頭到尾搜查一遍，果然車中沒有蔣百里，便以爲他不是搭這一班車，帶齊兵馬走了。其實百里的的確確在車上。原來他一上車，忽然要大便，叫服務員開了廁所的門讓他進去。火車的規則，在未開行時是不開廁所門的。但那個服務員見是蔣總參議，不敢違命，開門讓他進去，又怕別人跟着會進去，索性下了鎖。張作霖登車時，恰值那個服務員走開了，其他諸人不知蔣百里在廁所裡，否則張作霖一定把他抓去槍斃的。

康同璧印度尋父

康同璧女士，她是康有爲的女公子，今年也七十多歲了，住在大陸，她是中國第一個到美國留學的女子。

康同璧女士的丈夫是羅昌（中國第一個在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留學生，他畢業的時間是一九〇七年。回國後一向在北京大學教拉丁文，一九五五年三月逝世），他們是自由戀愛而結婚的。

五十年前，康有為在海外亡命，康同璧曾隻身到印度探問父親。那時候中國的女子很少出門，休說是到外國去了。所以她很自豪的寫了一首詩，最後兩句是「若論女子西來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這是當時共傳的名句。

三十年前，西湖康有為的一天國（本地人叫康莊），見康女士和她的庶母阿翠（她是西湖艇家女）合攝的照片，庶母年才十八九，而女兒則四十開外；庶母立，女兒坐，不知者以為阿翠是女兒也。這是一張很有趣的相片。

模型李泥人張倒鈎簷

民國初年的平津一帶，流傳了幾句近乎重諷的話，說是：「北京有個模型李，天津有個泥人張，當不得南海一個掛鈎簷。」原來這三位人物，在清末，曾享譽國際間，所以他們的名譽，差不多婦孺皆知，成為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究竟這三位小人物是怎樣的人呢？先來談一談模型李。根據當時北京時報記載的一段新聞，標題是「模型李死後發家」，中國舊時的建築設計，是用模型來替代現在的劃則，也可以說昔時的模型匠，就等於現在的劃則師。模型李是清末最傑出的模型匠，北京最著名的頤和園，其模型設計就是他的傑作，其他如清朝的宮殿建築，顯官巨賈的宅第園林，他都設計非常精巧，當時富貴中人所興建，

都爭相延攬，所以生涯也自不惡，而模型李三個字也常爲人所稱道，甚至遂致連他的本名反被人家疏忽。照道理講，他具有這樣的卓越技藝，一定有所居積，但當時模型匠工薪，僅較普通工匠的工薪高出少許，所以他一生孜孜兀兀，除仰事俯蓄外，僅遺某胡同裡的幾間平房給他年老的母親和幼小的兒子。那幾間房子裡也別無長物，祇堆滿了他平日認爲心血結晶的若干模型，而在當時是被看作一文不值的東西。大概是模型李死後的幾年吧！他的兒子拿了一盤模型在街頭玩耍，被一個過路的法國人看到，不禁脫口喊道：「這纔是真正的東方藝術作品，於是跟着那孩子到模型李的家裡，見到屋子裡放滿了各種模型，都是畫棟彫樑，亭臺樓閣，充滿了東方藝術氣氛，欣賞了半天，就向孩子的祖母道明來意，準備收買這全部模型，問他須要多少錢。這位老太太倒也機警，叫這位法國人明天來和她的弟弟講價，法國人走後，就叫孫兒將她的弟弟請來商量；她的弟弟是一個古玩經紀，知道洋人要這些模型，一定能出高價，但也無法估價，最後在漫無標準的情況之下，決定先開價五萬大元。第二天那位法國人準時來到，聽說索價五萬元，竟連說好極好極，除如數成交之外，另給老太的弟弟三千元的佣金。當時物價便宜，五萬元這個數字簡直非同小可，所以模型李死後發家的這則新聞，迅速的傳遞了當時的平津。後來這位法國人將這批模型全部運往歐洲，單是頤和園那具模型就取回了全部成本，其餘的模型都由高價賣出。據說此後歐洲各國的東方方式建築，泰半是根據了模型李的模型建造的。

張光甫是清末的一個彫塑匠，彫塑人像在北方人叫做彫泥人，所以大家都叫他泥人張。他具有非

常的彫塑天才，對於人像彫塑，不獨形狀畢肖，栩栩如生，且能塑出其人之內在性格。曾為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造像，因而身價十倍。每塑一像，索銀元三百，而顧客却依舊不少，當時駐北京的各國使節，都很喜歡泥人張的塑像，有些標奇的外國人還穿著清朝的朝服請他塑像，今日在巴黎，倫敦，以內瓦，斯德哥爾摩等處博物館陳列的若干穿著清朝的洋人造像，也就是泥人張的傑作呢！

雖然現在已進入了原子時代，但火車在陸上仍然是主要交通工具。現在我們看的火車，一個車卡接著另一個車卡的掛鉤，從前是要用人掛了才能鉤上的，曠時費事，一直到詹天佑發明了自動掛鉤以後，才改變了這種情形。祇要兩個車卡輕輕相撞，掛鉤就自動地掛上了，便大大的增進了鐵路運輸效力。因此世界各國都改用這種掛鉤。為酬答詹的功績起見，在當時的國際鐵路工程會議中有兩項決議，一項是規定發明人的名字「詹天佑」成為這種掛鉤的專門名詞，還有一項是由與會各國的代表轉請各國的政府發給詹天佑一筆獎金。因此，詹天佑確實發了一點橫財，同時也替我們中國人爭回了很大的面子。

詹天佑原籍南海，父兄是旅美華僑，所以他有機會到美國去求學，當他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土木工程和鐵路方面的專門學業回國的時候，也正是滿清政府最腐敗的時候，使他學識無由使用，胸中抱負無法實現。祇好到廣東博學館和福建水師學堂去教書，一直到光緒二十年後，天津到山海關的津榆段鐵路開築，他才開始有機會獻身於中國鐵路事業，担任鐵路工程師的職務。

詹天佑在我國鐵路史上，曾寫下光輝的一頁。如滬嘉、洛潼、粵漢、京張等鐵路的修建，他都付出了心血和勤勞，特別是京張鐵路的建築，更是他獨當一面的最大貢獻。由北平到張家口，全長雖只有二百公里，但沿線有八達嶺居庸關等處，形勢險峻而工程艱鉅，在當時政府所聘的英俄德法等國的鐵路專家勘测和估計，預算要九百多萬兩白銀，需時七年，方能完成全線工程。而詹天佑力排衆議，僅有四年時間，用了五百多萬兩白銀，就完成了全部的工程，當時的各國專家們，都認為是一個奇蹟。模型李和泥人張被外國人譽爲東方藝術的一代宗匠，至今還珍藏着他們的作品，詹天佑則更成爲世界各國字彙中的專門名詞。

黑景寫「腐化記」

舊日國民黨裡有個綽號「雅黨人」的景定成，在抗日戰爭初期，他得了半身不遂症，臥病西安，不知現時仍生存否。

定成字枚九，山西河東人。他長得相貌壯黑，自署「黑景」，所謂雅黨人，蓋反言之也。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他在北京做國會議員，袁世凱搞帝制，枚九取他的「袁」字來測字曰：「土頭衰尾」必不能成功，因在陝西反對極力，與李岐山定下了討袁計劃，但給袁世凱知道了，派兵先把他抓到了，送入北京，監禁起來。他在監裡多得袁世凱之賜，整天都吸鴉片消遣，後來出獄，已成深癮。

戒不掉了。

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定都金陵，黑景以老黨員資格，到南京想混個黨官過過癮。當時一班新貴認為他腐化，不肯和他見面，即見時，也加以白眼，黑景很生氣，閉門窮二日夜之力，寫成一本小冊子名「腐化記」，解釋腐化二字的涵義，並將國民黨那班新貴的種種醜態直言書之。書出之後，寧滬一帶人士，爭着購買，資為談笑，國民黨人亦無如之何，只有恨他入骨而已。

枚九在北京曾辦「國風報」，著有「入獄始末記」、「洪憲雜詠十首」等書。

天台山農賣蜜橘

「天台山農」的字是寫南北朝碑體，與同時在上海賣字的清道人，曾農髯（此二人皆張大千之師）的作風差不多，但不及他們寫得好，所以名氣不大，只能在上海附近有點名。

天台山農最喜歡給戰前上海那些禮拜六派雜誌或小報題字，有時還投投稿，所以和上海的報界甚有來往。全靠賣字為活，以出賣天台蜜橘為主要的收入，原來他是浙江黃巖縣人，故鄉與天台山相近，天台山的蜜橘向來是有名的，他在上海賣字的生涯不算好，便回故鄉種橘。他因為和上海的報界有交情，就託他們在報紙宣傳，於是天台蜜橘之名大著。

山農是洋場上的「農夫」，姓劉，名青，字照藝，個子很高大，還有點麻皮，但他寫的字頗

爲娟秀，不像其人，原來他早年的字是學趙孟頫的，根底差一點，後來才努力寫北碑，已經不可救藥了，因此他的字不能成家，就是寫招牌的生意還不及唐駝。他改行國畫，正是他聰明之處，可惜不久後就死了。

洋博士柯鳳蓀

從前日本帝國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是不肯隨便給人的。我國人能得到帝大文學博士學位的，照我所知，只有柯鳳蓀一人。（柯氏名劭齋，山東膠縣人）。

柯鳳蓀是史學家，他的「新元史」誠然有很多可議之處，但總比明人所修的「元史」好得多，日本人因他的「新元史」而贈予博士學位，他是受之無愧的（二十年前，武昌華中大學校長章卓民在倫敦告我，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授給狗，狗都不要！此言雖然有點過火，但亦可見美國一些大學濫給博士學位與中國留學生）。「新元史」殺青後，其時柯鳳蓀的翰林同年徐世昌正做著民國的總統，便以政府明令，列「新元史」爲正史，於是一九三四年上海開明書店排印的廿五史，也有「新元史」在內了。

徐世昌與柯氏同是光緒十二年翰林，這一榜中，居然出了兩個洋博士，一個是徐世昌得之法國，柯鳳蓀得之日本。但徐的學問遠不及柯。

盧寧少有文名，善詩文，元配于氏死後，娶桐城古文家吳汝綸之女。吳夫人也擅文事，結婚後她請求新郎帶她去野寺的靈堂叩拜前任夫人。靈堂懸有柯氏所製的輓聯，她當面指出夫君那些不通的語句，柯氏也爲之拜服。

楊增榮精內功

楊增榮，江西新建人。他在十二三歲時，拜一個和尚練習武術。學成後，他生怕人家知道他有功夫，反而深藏起來，弓着背好像病夫一樣走路。他中了進士後，宣統二年，以候補知府分發四川，將啓程入川，爲兩廣總督張鳴岐邀入粵。

黃花崗一役，衆烈士圍攻總督署，天明，大門不開，增榮在署內悶得慌，從後花園二丈左右高的圍牆跳下來，去找他的朋友唐天如（天如先生現隱居香港銅鑼灣，今年七十六歲了）喝茶聊天。唐先生覺得奇怪，問他怎樣能走出來的。起初他不肯說，只是飾詞以對。後來唐先生追得緊，他才說跳下來的。

民國八九年間，他住在北京郊外野寺，每二三個月就換一個地方，怕人知道他的行踪。有一次他住在極樂寺，看海棠。盜匪以爲他是富翁，晚上糾集了六七人去打劫他，用麻繩綁了他，他動也不動。等綁好後，他振臂一揮，繩皆寸斷，眾盜見了大驚失色，連忙鬆人了。

天如先生曾親見過他拿十幾塊磚頭，放在桌下，他在桌上輕輕一擊，只有底下那一塊裂為碎片。他死於一九三九年，年七十四。王揖唐刊行他的遺詩。

喬大壯刻印葬妻

一九四八年在蘇州投河自殺的喬大壯，是台灣大學文學系教授、文學系主任，（當時院長為許壽裳），他是四川華陽人，父親是清末的名御史，聽說他們三代都是自殺的。

大壯名會劬，留學法國，民國初年譯過一部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以後絕不彈此調，專用功於詩詞駢體文和篆刻了。

大壯的篆刻，阿私者稱為當今第一流，其實他對於篆刻工夫和金石文字用力不深，不過以詩人而能刻印，為人所重罷了。

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的監察院做參事，薪水薄到「餓死老婆薰臭屋」，他的太太死了。大壯刻印定有潤例，但老是不肯奏刀，因為要葬太太，只得搬出幾天工夫將積存之印全部刻成，以兼潤來葬愛妻，這是多麼動人的事啊！他送太太靈柩回故鄉時，有「生亦子」詞一闕，末後二句有云：「君去骨成塵，我駐頭如雪」，甚沈痛也。

天如先生曾親見過他拿十幾塊磚頭，放在桌下，他在桌上輕輕一擊，只有底下那一塊裂為碎片。他死於一九三九年，年七十四。王揖唐刊行他的遺詩。

喬大壯刻印葬妻

一九四八年在蘇州投河自殺的喬大壯，是台灣大學文學系教授、文學系主任，（當時院長為許壽裳），他是四川華陽人，父親是清末的名御史，聽說他們三代都是自殺的。

大壯名會劬，留學法國，民國初年譯過一部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以後絕不彈此調，專用功於詩詞駢體文和篆刻了。

大壯的篆刻，阿私者稱為當今第一流，其實他對於篆刻工夫和金石文字用力不深，不過以詩人而能刻印，為人所重罷了。

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的監察院做參事，薪水薄到「餓死老婆薰臭屋」，他的太太死了。大壯刻印定有潤例，但老是不肯奏刀，因為要葬太太，只得搬出幾天工夫將積存之印全部刻成，以兼潤來葬愛妻，這是多麼動人的事啊！他送太太靈柩回故鄉時，有「生亦子」詞一闕，末後二句有云：「君去骨成塵，我駐頭如雪」，甚沈痛也。